

# 新视界

## NEW VISION

No.1 (阅读 740)

中国的非洲观、非洲战略与非洲研究 (上) .....P087

No.2 (阅读 679)

新视界微信上线啦.....P005

No.3 (阅读 467)

那些年，一起上过的国关.....P119

No.4 (阅读 466)

一碗给出国党的鸡杂汤.....P135

No.5 (阅读 430)

中国的非洲观、非洲战略与非洲研究 (下) .....P096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 编者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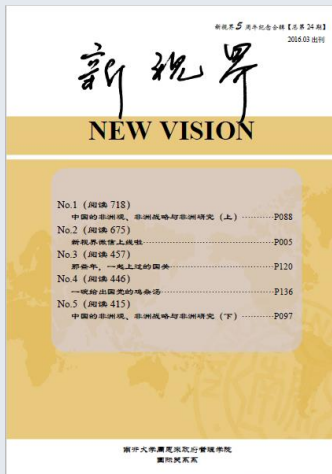
匆匆那年，光阴五度。自2010年6月创刊以来，新视界已累计推出了23期纸刊。而即将面世的第24期——新视界5周年精选合辑，将会是新视界纸刊的告别仪式。告别纸媒，并不意味着新视界从此落幕。实际上，与众多转型新媒体（APP客户端、微信等）的传统媒体经历类似，新视界作为以推介国关学科知识为特色的纸媒，同样必须顺应当前移动互联网的大趋势。这里的大趋势，不光是说传媒载体的变迁，从纸到电子屏幕；更重要的还在于用户习惯的改变，也即“个性化、快餐化、碎片化”。质而言之，微信公众号不过是大趋势下，邮件订阅模式、网页订阅模式（RSS）在移动智能终端上的自然进化，其本质仍然是信息聚合。如果在Personal Computer时代，电商书店淘汰了实体书店，那么在Mobile Internet时代，新媒体也注定要淘汰纸媒。当然，新视界拥抱移动互联网，其学科类媒体的本质没有改变。无论是以前主营线下，还是现在专攻线上，“内容为王”都可以说是公理、定理。万变不离其宗，如果解决不了“内容从哪里来”的问题，其他任何辅助性的“文案”、“设计”都会是多余。而破解之道在于实施这样一个运营模式：建立起一个覆盖南开国关的立体作者网络，形成可循环的内容生产机制，同时辅以一个有战斗力的新媒体团队，最终实现持续输出学科类产品的根本目标。

目前，新视界通过总结上线以来的经验得失，已基本摸索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新媒体运营方案。在价值方向上，新视界以“连接国关我和你”为理念，专注于做南开国关系的连接器，旨在建立起南开国关系师生的立体联系网络，并为广大同学提供有关学科、学习和学生的多方位信息。在组织结构上，我们继承纸刊时期“主编+执行主编+责任编辑”模式的同时，砍掉了组织的中层，以做得更为扁平化，从而更好地发挥新视界“小团队/快速文化创新”的天然优势。在人才选拔上，新视界制定了全新的办法，破除潜规则，不搞论资排辈，崇尚唯才是举，真正做到“制度、透明、团队”。并且，在国关系校友和老师的支持下，新视界已成功聚集起相当数量的优质作者资源。相信经过科学运作、长期耕耘，新视界的作者群体会不断壮大。

光阴荏苒，初心不改。回望新视界的创业历程，我们看到一个元素始终贯穿其间，那就是热爱——简单纯粹，用心做事，白首不回。应该说，新视界的此番转型，称得上是“再创业、再出发”。但现在只是开了个头，我们的征途依然是星辰大海！在此，我们要感谢所有曾经为新视界的发展贡献力量的前辈。因为没有你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和良好口碑，新视界的转型不会如此顺利。未来，我们希望新视界不但能成为南开国关系的连接器，而且能做成中国高校领先的学科类新媒体——我们新的梦想！

胡阳阳

2016年4月11日



## 新视界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主管  
《新视界》事业部主办



新视界 5 周年精选合集  
【总第 24 期】  
2016.03 出刊

主编：胡阳阳

合辑整理：宁鹏举 江昊宇

作者团队：

韩召颖 王翠文 刘 丰  
杨 雷 徐振伟 黄海涛  
刁大明 左希迎 顾 炜  
游腾飞 李金潼 李家胜  
陈一一 董柞壮

事业部成员：

刘 志 万梦琪 宁鹏举  
李 萌 丁敏潇 江昊宇  
李天翼 彭宁楠 石悦人  
周 扬 张路瑜 吴海丽  
封面设计：胡阳阳

## 目录

### 序言

- 003 | 张睿壮：发刊词
- 005 | 「新视界」微信上线啦
- 007 | 新视界新媒体运营方案

### 学科

- 013 | 南开国关“五大新秀”访谈录
- 021 | 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一）
- 026 | 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二）
- 035 | 罗伯特·吉尔平
- 039 | 全球化对于中国企业意味着什么
- 042 | 重读摩根索——聆听现实主义大师的智慧
- 048 | 国际法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发展
- 052 | 拉丁美洲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
- 058 | 新千年的全球失序
- 070 | 国际经济新环境下对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思考
- 079 | 霸权的印象管理
- 087 | 中国的非洲观、非洲战略与非洲研究（上）
- 096 | 中国的非洲观、非洲战略与非洲研究（下）

# 目录

## 学生

- 105 | 多伦多漫笔
- 108 | 此间的少女
- 115 | 伯克利旅读
- 117 | 踏上环球之旅
- 119 | 那些年，一起上过的国关
- 126 | 拿什么致你的青春
- 130 | 关于赴美留学申请几个主要文件的一些观点
- 132 | 赴美留学经验分享
- 135 | 一碗给出国党的鸡杂汤

## 学习

- 141 | 如何写作国际关系类书评
- 143 | 如何写作研究论文

## 读编往来

- 151 | 我学物理但我爱国关

### 刊物简介

《新视界》的前身为南开大学2007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班的班级刊物，始创于2009年10月。在南开国关系张睿壮、王翠文等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新视界》正式由班刊升级为国际关系系的系刊。

之后，《新视界》确立了“我的视界我做主”的理念，并旨在以此为平台，活跃学术氛围、引导学术思辨、推动学术争鸣，为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者、学习者、关注者开启“新的视界”。在这个价值观的引领下，《新视界》走过了5年漫漫出刊路，也积淀下相当数量的优质信息和数据库，详见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新视界主页。

2015年11月，新视界全面转型微信新媒体。新视界新媒体文化传播事业部以“连接国关我和你”为理念，专注于做南开国关系的连接器，旨在建立起南开国关系师生的立体联系网络，并为广大同学提供有关学科、学习和学生的多方位信息。

#### 通讯地址：

天津市津南区海河教育园区同砚路38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新视界》新媒体文化传播事业部（300071）

微信公众号：nkunewvision

注：未获本刊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本刊原创内容。

# 序言

愿同学们把这份对国关的热情保持下去。

——张睿壮



## 发刊词\*

2015年11月10日 文/张睿壮\*\* 阅读/207 点赞/7

**【编者按】**2010年6月，新视界改组创刊，张睿壮老师欣然为之写作发刊词。他以老辣的文风，指出《新视界》发展中可能面临的四个问题。一是如何给低年级本科生以施展才华的舞台；二是如何保证《新视界》所发文章之质量；三是如何调动国关系老师和各年级同学的积极性；四是如何做一个有态度的媒体和一个负责任的人。文章虽然是应景之作，但饱蘸一个知识分子的态度、见识与情怀，颇值细品。

准确地说，这一期应当是这本刊物的“改组创刊号”，因为它的真正“创刊”是一年前由罗霞、史英男、徐芳宇等几位国政07级的同学热心促成的，后来出过好几期，质量渐有改进。原本是一个班的班刊，现在扩大到整个系的系刊，说明它的兴旺发达，值得祝贺。但是，饮水不忘掘井人，尊重别人的劳动，铭记别人的好处，是做人的基本品德。所以，我们这本改组后的刊物，开门第一件事，就是要在过去发起并维持这本小小刊物中发挥作用的同学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班刊升级到系刊，读者群和作者群都有了很大的扩展，本来都是本科生，现在把硕士生乃至博士生也都包括进去了。这一升级的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刊发的文章质量有了显著提高，正如这一期的内容所见证的。**然而与此同时却也存在一种需要防范的倾向，就是把本科学子特别是低年级的本科生挤出这一舞台。**不是有人故意要这么做，而是本科生看到有那么多“资深”学长们上面表演，先自就胆怯了，退缩了。这里我要对本科生说两句话，第一是别服软，资历虽然起作用，但也不是绝对的；第二就是用实力说话，**你的道理足，文章好，譬如像韩寒那样，不要说博士生，就是教授也只能甘拜下风。**

世间刊物真不少，可真让你惦着想读的却真少。我对本刊的奢望就是，能不能把它办成一份大家都引颈期盼、先睹为快的杂志，尽管它不连载小说。要做到这点，“三性”是必不可缺的：第一，是知识性。知识性的含义，学术论文当然在内，但那不是重点，因为学术期刊很多，写得好自然可以找到发表的地方（**我们绝不能把这份刊物办成在别处发不了的“残次”论文的倾倒地，那样的话就没人读了**）。我更看重的，是一些对我们同学学习国关切实有用的资料评介或学习心得，如本期“书山有路”栏目下两篇评介新书的文章以及刘丰透露他在文献宝库中觅宝的秘笈，此外像新书介绍（“新书架”）、学界动态（中、外）、重大事件背景介绍（如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等，相信也都是读者感兴趣的内容。

第二，是交流性，要把它办成一个可供全系师生对话沟通的平台，可以在“院系新闻”的基础上增加对教师的学术活动和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情况的报道，特别可以增加一些栏目让学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0年6月创刊号。

\*\* 张睿壮，南开大学教授，著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



生与教师对话，提出对系里各方面工作以及学生状况的批评、表扬、期待、建议并作出回应，让学生们能够实话实说、畅所欲言。此外，考研信息、求职信息等等相信也是同学们关心的热点。

最后，是原创性。这是一份学生们自办的“民间刊物”，一定要把这个性质保持下去，为此，教师和学生干部要自觉保持节制，切勿对其横加干涉。否则，很快就会沦为官办（哪怕是系一级的官办），而经验表明只要一成官办，原创性就立刻消失。最近，温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要让大学自主办学，让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我希望在我们这份刊物上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这一精神。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首先要不说套话、空话、废话，但有些人说惯了，你让他不说他还适应不了，这就需要我们的编辑严格把关。同时，与自由表达同时产生的，是对自己言论负责的义务。要享受自由表达的权利，就必须学会区分言之有据的原创思想和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如果我们在开口说话前都事先做好“家庭作业”，经过深思熟虑，就不会荒腔走板、信口开河。

总之，这是一份我们自己的刊物，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一定要珍惜它。





## 新视界微信上线啦

2015年11月8日 文/胡阳阳\* 阅读/679 点赞/18

**【编者按】**11.8是一个好日子，不仅因为它谐音很喜庆，更在于从今天起《新视界》就将全面微信上线啦。《新视界》的老读者可以通过一个新的方式阅读，相信这会给大家带来全新的体验。对今天第一次接触到《新视界》的“用户”而言，您的生活则又多了一个思想观点和经验情感的交流平台。

### 《新视界》的“前世今生”

《新视界》的前身是南开大学 2007 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班的班级刊物，始创于 2009 年 10 月。当时的“创业者”们抱着非常朴素的愿望创立了最早的《新视界》——**要给相对平淡的大学生活留下点什么**。“创业”一年之后，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在国关系的师友圈中反响还不错。在南开国关系王翠文、张睿壮等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新视界》正式由班刊升级为国际关系系的系刊，也算是完成了由“草根创业者”到正规学生组织的转型。之后，《新视界》确立了“我的视界我做主”的理念，并旨在以此为平台，活跃学术氛围、引导学术思辨、推动学术争鸣，为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者、学习者、关注者开启“新的视界”。在这个价值观的引领下，《新视界》走过了**5年漫漫出刊路，至今已累计推出 23 期刊物，也积淀下相当数量的优质信息和数据库**，详见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团学活动新视界主页。

2015 年 5 月，为适应新形势，《新视界》全面深化改革，制定了新媒体时代的业务纲领，重组了组织架构，确立了“专注做国关系连接器”的核心价值观。按照职能专业化的原则，《新视界》被划分为学术组、宣传组、联络组、后勤组四个部门。同时，《新视界》做出了 2015 年下半年启动微信公众平台新业务的承诺。

### 《新视界》的价值

当大家在谈《新视界》的时候，会联想起哪些关键词？“系刊”、“编辑”、“word”、“国际关系研究生论坛”、“班上谁谁谁给我送过系刊”，还是“哎唷，今儿头一次听哦”。其实，《新视界》具体是哪个关键词都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新视界》原本就是一个多元化的发展平台，它既可以说是一个从事刊物编辑的学生组织，又可以说是南开国关系各年级同学相互学习、交流与经验分享的平台。**实际上，年级串联、经验分享和信息生产创造了《新视界》的全部价值**。通过这个平台，你能够接触到相对更为前沿的国际关系学科知识，能够和高、低年级的同学互相合作，能够亲自向在某些方面做得更好的学长学姐请教，抑或换个方向能够指导“有潜质”的学弟学妹从而收获“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精神愉悦。有时，朋辈的影响是惊人的。以《新视界》的历任主编为例，本科毕业后无一例外都保研清北、本

\* 胡阳阳，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012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新视界》现任主编。



校或者申请到美国排名前列的名校。

### 《新视界》的发展方向

总体原则：《新视界》微信上线后，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将逐渐作出调整，力争能在原有的纸媒编辑部模式和新媒体模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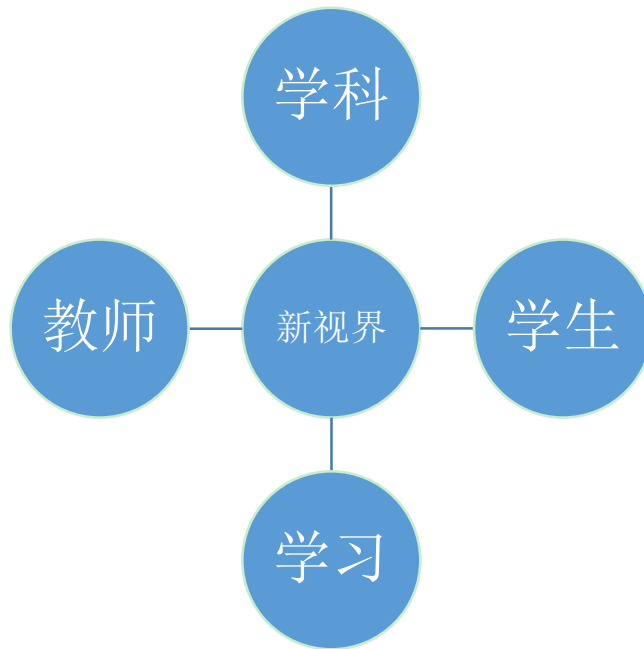
- 《新视界》的新媒体宣言为“连接国关我和你”。
- 《新视界》的组织架构拟调整为：**1位全权总监（P级）+1位视觉设计副总监（VP级）+1位内容策划副总监（VP级）+1位推广营销副总监（VP级）**的“1+3”模式，每一个功能板块下设成员若干名。其中，P级和VP级负责同志不设资质限制，只要你具备相应能力，并且认同我们的价值观“专注做国关系的连接器”，经适当的考核、选举程序即可“能者居位”。也就是说，**只要你能力足够，现在可直升VP，并可参加明年的P级选举**。当然，你必须为南开国关系的学生（不限年级）或至少对国际关系学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且能履职一届任期。
- 《新视界》的内容模块拟调整为：学科类文章+师生类文章+【自营栏目】。其中，学科层面，凡与国际时事、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方法、南开国际关系的本硕博课程、高校国关学科实力或科研动态分析等相关的文章；师生层面，凡与南开国关系的师生情、同学情、毕业季、海外生活、传经验等相关的文章；文章不限篇幅，一经审核通过（无知识产权争议），即予发表。南开、全国各大高校师生均可来函来稿。【自营栏目】为《新视界》内部的特别策划栏目。**热烈欢迎国际关系学术素养高的硕、博研究生同学在《新视界》开设专栏！**
- 《新视界》的管理分工拟调整为：（1）P级全权总监的职责为总揽「新视界」的全局事务，对《新视界》的运营发展负总责；（2）视觉设计VP（要求：熟练掌握Photoshop设计和微信公号编辑，有良好的审美素养；职责：承担相应的视觉设计任务，并负责培训《新视界》成员）；（3）内容策划VP（要求：良好的文笔写作能力，能够较为熟练地驾驭语言文字；职责：写作推文宣传文案，策划《新视界》的自营栏目）；（4）推广营销VP（要求：性格外向活泼，人际关系广；职责：转发推送文章至目标读者群，发放、回收、分析微信问卷，为《新视界》扩大推文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 新视界·新媒体运营方案

2016年1月23日 文/胡阳阳\*

### ● 我们的价值观

新视界以“连接国关我和你”为理念，专注于做南开国关系的连接器，旨在建立起南开国关系师生的立体联系网络，并为广大同学提供有关学科、学习和学生的多方位信息。



### ● 我们的业务

1. 新媒体推送：各模块每月至少 1 篇文章，多多益善！
  - ◇ 学科模块：学术讲座、学人访谈、学人故事、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科研简报、时事观察、书评写作等。
  - ◇ 学习模块：学术讲座预告、课程学习方法、期末论文写作、课堂展示成果、双辅修经验、保研出国经验等。
  - ◇ 学生模块：海外国关人（留学/交流/旅游）、毕业生（感言/总结）、班级情谊等。
2. 季度合辑：每 3 个月整理一期/上传学院官网
3. 内部会议/培训：每学期 1~2 次

### ● 我们的组织

1. 主编（1~2 人）

\* 胡阳阳，男，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 2012 级本科生，《新视界》现任主编。



- ◇ 统筹事业部的全局事务，尤其是用户体验、联络沟通，对组织的运营管理、业务发展和成员发展总负责
  - ◇ 一般由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担任/限国关系同学
  - ◇ 基本要求：毕业去向为保研/出国，可履职一届任期，有一定班级或学生组织任职经验
2. 执行主编（轮流担任）
- ◇ 做好内部协调沟通，确定各栏目模块的责编、责编的交稿日期以及文章的推送日期/做好推文的文案写作、排版设计工作
  - ◇ 整理季度合辑（逢 3/6/9/12 月）
  - ◇ 任职周期为 1 个月，考试周期间暂停
3. 栏目责编（每模块 1 人/轮流担任）
- ◇ 负责所在栏目模块推文的约稿/写作工作
  - ◇ 以各年级同学合作的方式完成任务
4. 换届办法
- ◇ 每年 4 月份的第 3 个周末
  - ◇ 一般为差额选举
  - ◇ 无记名线下/线上投票

● 我们的资源

1. 国关系的老师们  
最新的科研动态、学术讲座信息，以及相关课程的学习和研究方法等
2. 国关系的各年级在读同学  
“一切从班级中来到班级中去”
3. 国关系的毕业生  
海外国关人、职业生涯访谈等



## 新视界上线大事记

2016年1月23日

### 用户情况

- 2015年5月，新视界召开会议宣布将于下半年启动微信公众平台新业务
- 2015年11月8日，新视界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单日用户数净增加54
- 2015年11月9日，单日用户数净增加58
- 2015年11月30日，单日用户数净增加11
- 2015年12月6日，单日用户数净增加12
- 2015年12月7日，单日用户数净增加13
- 2016年1月2日，单日用户数净增加13
- 2016年1月3日，单日用户数净增加11
- 2016年1月4日，单日用户数净增加11

### 阅读情况

- NO.1 中国的非洲观、非洲战略与非洲研究（上） 阅读 709 点赞 6
- NO.2 「新视界」微信上线啦！ 阅读 670 点赞 18
- NO.3 新视界创始人 | 那些年，一起上过的国关 阅读 454 点赞 9
- NO.4 新视界特别策划 | 学长很帅，学妹速来！ 阅读 439 点赞 11
- NO.5 中国的非洲观、非洲战略与非洲研究（下） 阅读 410 点赞 5
- NO.6 学人访谈 | “五大新秀”访谈录 阅读 342 点赞 4



## 新视界上线大事记（续）

2016年4月12日

### 用户情况

- 2016年3月1日，单日用户数净增加96【破纪录】
- 2016年3月11日，单日用户数净增加10
- 2016年3月29日，单日用户数净增加15
- 2016年3月31日，单日用户数净增加15

### 阅读情况

- NO.1 中国社交媒体与公众舆论 阅读 1532 点赞 7 【破纪录】
- NO.2 学好国关，为国争光 阅读 529 点赞 45 【破纪录】
- NO.3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阅读 421 点赞 29
- NO.4 孔子学院与公共外交 阅读 191 点赞 2
- NO.5 美国大选，我们要不要如此关注 阅读 189 点赞 8
- NO.6 12国政毕业感言选登(一) 阅读 146 点赞 10

学科

愿爱好国关的同学们勤读、多思、常写，办好这份刊物。

——刘丰





## 南开国关“五大新秀”访谈录\*

2015年11月13日 阅读/350 点赞/4

**【编者按】**一段旅行，邂逅几个或许全然陌生却又相见恨晚的朋友，遇见几道或是闻所未闻或是似曾相识的风景，是一件幸事。与这五位国关“新秀”老师们的交谈，犹如经历这样的一段旅行，这样一件幸事。在他们曾经青涩的故事中遇见熟悉的彷徨，在他们平和的言语中见识成熟的韵味，在他们智慧的火花中领悟思想的力量。

### 【人物档案】

杨娜，女，2010年起任教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0年在南开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刘丰，男，2009年起任教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09年在南开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黄海涛，男，2009年起任教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0年在南开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阎梁，男，2009年起任教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09年在清华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刘兴华，男，2009年起任教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09年在南开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 PART I 南开与国关

**《新视界》：**您当初缘何走上“国关之路”？从本科到博士，您是一直坚定地进行国关研究，还是有过挣扎？

**杨娜：**最早选择这个专业是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当初对国际政治这个专业还是挺感兴趣的，因为我最初的理想是做一名国际新闻记者。但是我想提醒新生的是，国际关系这个专业跟报纸上的时事评论确实完全不同。真正学习这个专业才发现，它不仅深奥难学，而且有的时候还有些枯燥、单调。但我的性格就是既然我选择了就要坚持做下来而且尽量做好，如果自己能做出成果并得到大家认可的话，那种认可所带来的成就感就是不断地支持我前进的动力。

**刘丰：**我高考报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与贸易。我自身高中的时候对国际关系是很感兴趣的，也喜欢跟大家“高谈阔论”国际形势、政治、军事等等；高中时也订阅了《世界军事》等军事类的杂志，对这些比较感兴趣。但是报高考专业跟很多新生是一样的，家长、老师给参考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0年第2期。



意见的过程，我高考报的专业第一志愿是国经贸，第二专业是国际政治，我很幸运地被调剂到了国际关系专业，也算是比较喜欢的一个专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黄海涛：**这个还是挺有代表性的，我本科不是学国关的，我学的是英语，要考研了面临选专业。我就代表了那些曾经转专业，经历过在人生转折点重新做出选择的人。对我而言，考研选择国际关系还没有这么深层次的认识，国际关系是什么？国际政治是什么？但是我对于国际时事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特别是当时有一些同学也是在相关院校，给我提供一些相关资料。你也知道考研的时候，所在院校的一手资料还是挺重要的，所以说在经过多方选择之后做出了这个决定。学了这么多年，我并没有后悔，这就是我喜欢的领域，同时在学习过程中，我还是体会到很多乐趣的。

**阎梁：**国际关系或国际事务属于公共事务的范畴。由于我个人比较喜欢思考与研究国际事务，从博士开始转入到国际关系的学习与研究之中。只要同学们从中发现了兴趣，应该不会有什么“挣扎”的感受吧。

**刘兴华：**上本科的时候，我其实对国际关系这个专业的理解并不深刻，但本科阶段的学习确实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刚上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是最迷茫的时期，不知道未来将要走哪条路，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找其他工作？硕士阶段的学习，对我而言收获极大，应当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阅读量很大，与老师同学之间也多有切磋，从事学术研究的热情也与日俱增。到了博士阶段，就没有发展方向上的困惑，专心从事研究了。国际关系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政治说教，而是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探究国际问题的规律和逻辑，是一个苦尽甘来的有趣的思维旅程。苦，在于总是要面对各种否定原有假设的反例和逻辑漏洞，然后，不停地修复这个堡垒，以使之不被外面的攻击和反驳所击垮。甘，在于经过努力之后一个较为精致和坚实的堡垒的呈现。尽管依然会有很多缺陷，但面对自己搭建的逻辑架构，总会有一份特殊的喜悦。如果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么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自己创见的才是最美的。有些人会问，这样做研究有什么用处呢？人需要不断探求真理，学术在争论中进步，新知识和新思想会影响许多人，包括未来可能成为走上政治舞台和在各个领域进行决策的人。

**《新视界》：**为什么选择留在南开？从在南开接受教育到教书育人，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留在南开？

**杨娜：**其实这个原因特别简单，因为我喜欢这儿所以就留在这儿了。我从本科18岁读大学至今9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个人生活已经融入到这个校园里，这里的老师、周围的环境对我而言再熟悉不过了。可以说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南开也是我的首选，当然南开也不是很容易留的，留下来的都是很有实力的老师。还有就是我觉得尤其在现在的社会中，如果想在一个不浮躁的环境下做学术的话，南开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大家都知道，南开的学术环境非常好，而且学生都特别踏实好学，这个是有口皆碑的，还有就是这里的老师，都很尽职尽责。就我个人来说，从学生到老师，有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还要不断适应这个角色的转变，我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在学习中的经验教训，跟大家一起进步。



**刘 丰：** 我的感受跟杨娜有很多相似性，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学校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读上来的。从我自己的性格来讲，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一直都呆在一个地方，为什么不出国，为什么不去其他地方看看。从我自己的心态上来说，我更愿意使自己处在一个比较确定的轨迹上，这样自己会过得比较踏实舒服一些；第二个方面，我在这里呆了很多年，这是个很好的平台，能够给我提供很多软的环境，这是其他地方无法提供的，包括你的关系，你跟院里、系里老师的关系，长期的相处使大家都很熟悉、了解彼此。如果你去一个陌生的环境，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要熟悉一个新的环境，与那里的人和环境进行磨合，有时候会是成功的，但有的时候也会感到不舒服。至少在我留在南开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里会给我提供一个比较愉快的工作环境。再有就是，当时我们国关系非常缺乏年轻的师资。所以我最终的决定就是基于这样一个综合的考虑

**黄海涛：** 我就想说一点，我留在这个地方出了理性考虑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我不是南开本科读上来的，但是这个地方深深地吸引了我。它不是给了你多少回报的地方，但它是一种感情上的寄托，为了这个地方我也愿意留下来。

**阎 梁：** 南开是自创立以来具有一定私立大学传统的知名学府，学校规模小但学术水平精湛。我很喜欢南开沉稳和低调的风格。南开的国际关系学系同样规模不大但水平位居国内前列，能在这里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刘兴华：** 从本科至今，在南开已经有 11 年了，南开给了我太多太多。南开是一个厚重的名字，笔画并不多，但写起来、说出来都有沉甸甸的感觉。所以这 11 年来，我一直在体会这种厚重，这是一种南开独特的品格，不事张扬、踏实沉稳。南开有造诣高深的教师，有出类拔萃的学生，也有古朴宁静的校园。能继续为母校添砖加瓦，是我最荣幸的事。

**《新视界》：** 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之路上，您个人的学术兴趣点是什么？同时，在教学方面，您有什么构想？

**杨 娜：** 我的个人兴趣、研究方向，从硕士到博士一直都是关于欧洲治理与欧洲一体化的，我的博士论文也是做的这方面的研究。现在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全球治理，其实这两个领域是有相关性的，欧洲治理属于特殊的全球治理方式，也是全球治理的典范，而全球治理的内涵、外延也是欧洲治理的眼神。至于开课方面，就像我开始说的，现在的同学比我们那时候幸运多了，我们专业现在从国际关系到外交学，从理论到政策都有非常出色的老师为大家讲授知识，而作为新老师来说，我倾向于我的开课方向是与研究方向相关的，同时我也想促进本科生对研究的兴趣。

**刘 丰：** 刚才问了我们是怎么样走上国关这条路的，我还想补充一点，每个人走上科研和教学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一个跟你自己以前学习、爱好、兴趣相关，但是进入大学阶段真正学习这个东西之后，很多因素回来引导你的学习，比如你遇到的老师，比如你接触到的朋友、圈子，或者你看到的一些信息，这些因素会引导你走上不一样的研究道路。比如说一个人一开始立志要做一个科学家，或者说他要做一个学者，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社会有不一样的科学



行业，有不一样的学术道路，比如说有人一开始对理论感兴趣，有人对科学方法感兴趣，但是我们知道有人文和科学两种不一样的学术路径和道路，你可能走向人文道路也可能走向科学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个人的选择，另一方面是你遇到的老师、环境、信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为自我的本科阶段系里就很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这样的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选择。各个学校都有它的研究特色，但我自己的选择都跟我在南开接受的教育以及我所遇到的老师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关于未来的学术教学，我自己的研究兴趣还是侧重于国际关系理论范围，特别是一些需要抽象思维的宏大议题，在这里面你可以获得很强大的乐趣，有的老师或者同学喜欢和国际关系现实打交道，但是理论和现实是不可分的，在研究和教学的工作中，要补充经验的东西，因为我们以前的学习经历很少接触、关注一些现实层面的东西，包括大家在初级阶段的学习，接受理论思维的锻炼是一方面，更多还是应该去关心身边发生的一些现实问题，并佐证你的思考，这是我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强调的。因为我教国际关系理论这门课，更多的也是要想办法调整，怎样把理论这种比较侧重于思维层面锻炼的课程与现实更好地融合，让学生更容易接受。

**黄海涛：**我现在主要的兴趣点还是放在外交政策研究方面。其实外交政策研究很宏大，它的内容非常杂，它所涉及到的方面也非常多，既要对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体制、政策有深入的了解，同时还要做出一个相对比较独立合理的判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很多研究角度。而在教学里面，我下学期要开设美国外交政策这门课，它在国际关系中该算是一门很重要的课了，我希望一方面尽力去吸收以前老师教学的精华并加以传承，另一方面对本科生教学来说调动本科生的积极性也是很重要的，不光是我去教，还要引导他们发展综合能力，比如表达与思维能力。这是教任何一门课都需要涉及到的。

**阎梁：**我未来的学术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国际经济与安全等领域。在教学方面，除了已经开设的《国际关系概论》、《当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国际经济与国际安全》（本学期开始开设的全校公选课）三门课程之外，2009-2010学年的春季学期还拟开设《政治学博弈论》的课程，供政府学院各专业的同学选修。

**刘兴华：**我主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在教学方面，我希望能把我的课堂变得更活跃一些，把授课、发言、讨论，甚至辩论进行有机融合，把更生动的声像资料和理论或案例分析结合起来。通过教学，让同学们学会学术思考和学术批评。

## PART II 如何进行国关学习

**《新视界》：**对刚入学的本科新生来说，国关是一门相当陌生的专业，您可否回想一下当初您对国关的感受，以及如何对国关产生兴趣的呢？国际关系专业有自身的特点，那么对本科生而言如何学习国关？对研究生而言又该如何进行国关研究呢？

**杨娜：**对于新生而言，首先就是要了解这个专业到底是什么。首先要多读书，国关学、国关理论、国关史。这些方面的书都要多读，打好基础，不管是学习还是其他方面，只有增进了对事物的了解，才有可能产生兴趣，而且你只有把基础打好了，才能对国际关系有比较深



刻的见解。学生平时也应该课上课下多跟老师交流，多向老师请教，同学间相互激励。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专业有一定的特色，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也比较鼓励学生多跟校外、国外的学生、学者联系、交流，这样能够开拓视野，增加兴趣。就我个人而言，非常感谢我的导师在我读书期间给我提供的各种机会，让我参加了很多次的国内外学术会议。这些会议，使我得到了各方面的锻炼，也使我对这个专业越来越有兴趣。

**刘丰：**对于刚入学的新生而言，因为他们第一年在校区，与本部相比很多方面不太方便，有很多信息、活动都不太清楚。由于大学跟高中的学习存在很大的差别，新生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我特别强调作为新生要想获取专业信息、培养对专业的兴趣，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读书，看东西。幸运的是在校区有一个很不错的读书馆，大家可以从中获取到许多信息。当然不一定要看很专业、很精深的理论分析，可以读一些国关类的杂志，甚至你对经济、历史、文化、人文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杂志架上找寻自己所感兴趣的，多看看，而且杂志的信息相对而言比较新也会及时更新。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进行回溯性质的阅读，获取信息。通过看书培养兴趣充实自己，对以后继续深造或工作都有好处。

**黄海涛：**两位都讲了本科新生，那么我们来聊聊研究生新生。研究生现在是两年，这就牵涉到如何更快地进入研究状态的问题。如果你本科四年学的国关，然后考研就有惯性坚持在里面，那么问题不是太大的。但是如果你是转专业或是从外面进来的，首先你得适应新环境，然后迅速地确定你的兴趣所在，或者说一个大的方向。在这个基础上有选择性、针对性的进行阅读学习，树立一种研究意识，多与导师交流沟通，都会起到一种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你才能在两年之后有比较大的收获。

**阎梁：**学习国际关系的同学应该是特别关心公共事务（从社会事务，到地方事务和国家事务，最后大到国际事务）的人，而不是仅仅关注私人事务（如个人、家庭、公司等，当然公司也有社会责任但主要是私人事务）的人。在发达国家，国际关系应属于贵族专业，是少数政府公职人员与外交官（及其家属）学习并以此为职业取向的专业。

我国当代的本科教育已经由“专才教育”转向“通识教育”。本专业的本科同学特别需要打好外语基础，应该以外语学院同学的程度要求自己学好外语。此外，掌握政治学理论、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及其相关的哲学知识，以及世界历史和重要大国的国别史知识。最后，具备清晰、完整的当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框架，具备较好的中、外文写作能力，这对以后从事任何职业都是很重要的。

对研究生而言，由于没有指导研究生学习与科研的经验，不好多说。不过，下功夫阅读本学科内自己所关注的那个研究领域和问题的学术文献应该是基本功吧。其他方面，还是请研究生同学多请教一下我们系和我们院的资深教师和专家们。

**刘兴华：**南开作为综合性的著名学府，给学生提供的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成长环境，不仅仅是专业学习。本科阶段主要是通才教育而不是专才教育。所以不同的专业，其实在各个方面相差并不大。国际关系研究关注瞬息万变的世界事务，因此总有许多新的变化、新的冲击、新



的问题涌现出来，这也使国际关系这个专业的教学、研究和学习总是充满新鲜感，是很有趣的。而且当同学们分析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宏观问题时，就会发现，如果把国际层面加入进去，就会别有一番天地。

本科阶段建议同学们在努力学习专业课的同时，尽量拓宽自己的涉猎范围，多看一些其他学科的书籍，比如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博览群书，为以后打下基础。研究生时期，就要相对专一些了，最好能够找到自己的研究领域，大量地阅读本专业的中外文书籍文献，要能够对本专业有十分深入的理解。

**《新视界》：同时，对国关学生而言最关心的是以后的就业前景等问题，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呢？**

**杨娜：**要说就业，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因为我是从本科到博士一直读下来的，本科、硕士毕业都没有涉及到找工作的问题，到博士毕业的时候确实感受到了很大的就业压力。我有些个人的感受与同学们分享，找工作固然与专业有一定关系，但最重要的还是个人能力，不仅是专业学习的能力，还包括多方面的综合能力，以及怎么样去充分表现自身能力的的能力。第二，需要及早地进行正确的个人定位。比如你到大三的时候就必须思考是继续深造还是就业，如果你对这个专业有极大的热忱，而且又想在学术事业上有所发展的话，那么你平时就要注意多培养自己的学术能力、学术素养，还有就是要尝试多写文章，争取能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如果要是找工作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先把毕业论文做好、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再开始找工作。就我个人的经验，如果要是找工作、写论文都赶到最后，你一定会手忙脚乱、焦头烂额的。而且一旦你决定要做什么，要集中精力去做，不要三心二意，不要天天有新的想法，这样只会什么都做不好。最后，心态很重要。在大家毕业的时候有很大的压力，面临各方面的困难和挑战，大家一定要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而且要有坚忍不拔的态度。

**刘丰：**关于找工作就业的经验，我也都是来自身边的同学、朋友，以我的个人感受，未来工作起决定性因素的可能是你的能力。大家都是南开大学的学生，印象不会太差，最重要的还是个人能力，而这个能力来自于几个方面，我很多时候跟本科生聊天，我会说本科生经过四年的培养做到能说会道就可以了，专业知识不用很深。因为很多时候本科生就业与你所学的专业不一定相关，除了一些很专业的学科比如会计、保险等等，对专业知识要求高外，大多数专业都要面临一个重新学习、重新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就能检验出你在大学四年中有没有把自己的学习能力提升上去。另一方面，就是形象、气质、谈吐，你能不能通过你的语言以及平时的活动经历给别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另外，要找准目标，早立志早成才，早一步确定自己的兴趣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才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才会往这方面发展，将自己塑造成这方面的人才。有一个明确目标才会知道自己需要些什么技能，才会朝着这方面发展，少走弯路。



**黄海涛:** 对于本科生来说毕业面临就业、深造的选择,那么提前树立目标很重要。在求职过程中,南开大学的品牌是非常好的,你要相信在这个平台上,你经过四年的教育,老师认真负责,学生积极向上,你要认定你获得的知识 and 能力比别人强,你树立了这个信心,才敢于与其他学校的同学竞争。第二,需要认清现实,也要知道现在工作比较难找,认清这个现实,能让你豁达面对一时的不利。第三,把握一切机遇,你只要有一个机会就要去争取、去把握,即使现在看来不太理想,但是你先把握住了,才不会后悔。最后,千万不要气馁言败,你要知道目前的择业只是漫长的人生道路中的一个很细小的环节,一个小插曲,对以后人生的影响可能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有能力作为基础,你还有很多机会。

**阎梁:** 国内著名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在文科类专业中还是比较理想的。同学们除了在相关的外交、外事部门从事公务员工作和媒体工作外,还可以选择学术道路,在大学与研究机构进行教学、研究工作。此外,还可以选择在公司企业工作。外语特别好的同学还可以在外企、外国及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从事实务领域内的工作。总之,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有着比较广泛的职业适应性和发展前景。当然,这一前景建立在同学们良好的学业表现和初中的个人素质的基础之上。

**刘兴华:** 我的同学分布在各地的各种岗位,有些从事着外事外交和国际关系教学方面的工作,也有很多人的工作与国际关系没有太多关联。但大学四年的学习,思维能力的培养,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现在他们许多都成为本单位的业务骨干。所以,不是为专业而专业,而是通过专业学习获得社会需要的能力。除了学好专业之外,可以在假期适当参加一些社会兼职和志愿者活动,丰富自己的经历,也赢得更多机会。

### PART III 寄语

**《新视界》:** 最后,对即将进入国关殿堂的2010级新生同学们,您有什么建议或者希望吗?在专业学习之余,还应培养哪些方面的素质呢?

**杨娜:** 我希望大家能够学好玩好,快乐充实地过完大学生生活。同学们除了专业学习技能外,还要注意两点,第一,培养与人沟通交往的能力。我们将来找工作,从我的同学看来,大部分都是去新闻媒体、政府部门等,这些单位的共同点就是要与人打交道,那么同学们学习之外要注意培养乐观开朗的性格,善于与人打交道。第二点,就是提高外语水平,我们的专业对外语要求很高,期间需要阅读大量的外文文献,还有机会参加国内外研讨会,有良好的英语水平一方面能向别人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有更多机会了解前沿的研究及方法,对未来找工作也有帮助。

**刘丰:** 对于刚来的新生,跟院里系里的老师都有接触的机会,包括像院里的一些老师都会强调新生如何顺利地从中高过渡到大学的生活,我希望他们尽快地经过调整期,适应大学生生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视野一定要宽广一些。一提到南开的学生都是踏实、稳重、勤奋。但另外一个方面,我希望大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渠道打开视野,一方面读书看报,另一方面多参加校园讲座并多与师兄师姐了解打听,多跟老师交流,培养自己获取信息、把握机会



的能力。虽然大学的学习和生活以自我规划和管理为主，但是当大家面对困难、疑惑和抉择时，如果主动积极地寻求老师们的帮助，与老师们进行交流，我们是非常愿意帮助大家，引导大家的。

**黄海涛：**我就简短说吧。希望新同学们在这宝贵的四年时间里夯实基础、拓展眼界、寓学于乐、全面发展。

**阎梁：**我们刚来到南开不久的教师非常期待并欢迎 2010 级新同学的到来！希望新同学尽快地完成从高中阶段被动学习向大学阶段自主学习的转变。除了学好各门功课外，还希望大家培养自己的多元兴趣与人格魅力。

**刘兴华：**我给 2010 级的新生几条小小的建议吧。第一，珍惜大学四年的时光，这四年是你以后步入社会之后再也无法福祉的经历。第二，努力学习外语，无论朝哪个方向发展，这都是必要的工具。第三，听一听课堂上无比抽象甚至似乎有些脱离现实的东西，毕业后不会有人再讲起，而那时你会发现，如果缺少缜密的逻辑思维，工作会有点杂乱。第四，不浮躁，不人云亦云，不亦步亦趋，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南开人，铅华洗尽，南开依然是那个厚重的南开。

### 后记

与五位甚至可以用学长学姐称呼的新秀老师的交谈进行得就像是新老生交流会一样愉快。侃侃而谈的他们，依然带着些许学生特有的气息——那种我们称之为悸动的年轻标志，但又流露出我们难以拥有的成熟与沉稳——这或许就是时间与智慧的馈赠了。娓娓道来的他们曾经的故事，以及对于我们中肯的建议，让那个阳光午后充满了南开国关代代相传的亲情味道。这几位新秀老师的加入，让南开国关更加值得期待了，不是吗？





## 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一）\*

2015年11月16日 文/陈冲 刘丰\*\* 阅读/85 点赞/3

**【编者按】**这两天，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牵动着全世界人民的心。作为一种重要的冲突形式，恐怖袭击也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国际冲突、国内冲突、冲突管理以及和平研究等主题的研究成果是科学化最高、数据最为完备的一个领域。那么，国际关系研究中都有哪些重要的冲突数据库呢？今天《新视界》分享的这篇文章，相信会给大家带来收获。

### 一、冲突/冲突过程数据库

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主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国际冲突、国内冲突、冲突管理以及和平研究等主题的研究成果也是科学化最高、数据最为完备的一个领域。例如《国际研究季刊》1995-2005年刊载的定量分析文章的比例达到了22.5%，同时在这个领域内还有《冲突解决》和《和平研究》两种注重定量分析的顶级期刊。根据冲突研究的性质，我们可以将相关数据分为三类：国际冲突、国内冲突、冲突管理。

#### （一）国际冲突数据

表-1展示了几种与国际冲突相关的数据。使用最广泛的国际冲突数据是COW的“国际军事争端数据”(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data, MID data)。<sup>①</sup>它收录了“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威胁、显示或使用军事力量的行为”的数据，它对国际冲突的分类包括领土争端(territorial)、政策(policy)和政权(regime)争端三种类型。该数据库最初仅涵盖了1816-1992年的冲突数据<sup>②</sup>，在1993年之后对事件数据进行了系统赋值，目前使用的版本是2004年发布的MID 3.0数据。<sup>③</sup>在2007年10月26日更新的MID3.10版本中纠正了2003-2006收集集中出现的一些误差。最近使用该数据库进行研究的是陆凌宇(Lingyu Lu, 音译)和卡梅伦·蒂斯(Cameron G. Thies)，他们研究了贸易相互依赖对国际冲突发生的影响。<sup>④</sup>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的齐韦·毛兹在MID数据的基础上改进了相关变量，提供了一种双边(dyadic)版本的数据(Dyadic MID 2.0)，他将冲突方(双边或多边)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sup>⑤</sup>最近毛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0年第3期。

\*\* 陈冲，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刘丰，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① 关于该数据的详细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最后访问日期:28日)。

② 参考 Daniel M. Jones, Stuart A. Bremer and J. David Singer,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1816-1992: Rationale, Coding Rules, and Empirical Pattern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15, no. 2, 1996, pp. 163-213.

③ 参考 Faten Ghosn, Palmer Glenn and Stuart A. Bremer "The MID3 Data Set, 1993-2001: Procedures, Coding Rules, and Descriptio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1, No. 2, 2004, pp. 133-54.

④ 参考 Lingyu Lu and Cameron G. Thies, "Trade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Issues at Stake in the Onset of Militarized Conflict: Exploring a Boundary Condition of Pacific Interstate Relation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7, No. 4, 2010, pp. 347-368.

⑤ 关于该数据的详细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psfaculty.ucdavis.edu/zmaoz/dyadmid.html>(最后访问日



兹教授使用该数据库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研究了国际冲突与相互依赖的关系,分别检验了脆弱性相互依赖和敏感性相互依赖对国际冲突发生的影响。<sup>①</sup>

另一种国际冲突数据是 COW 的“国家间冲突数据”(Inter-state conflict data, ISC)。<sup>②</sup>它与 COW MID3.0 基本上是相匹配的,“每一场战争都有它相应的争端”,而主要不同在于对国家间战争或争端的定义上,在 COW MID3.0 中,符合国家间战争的事件首先必须要求参与方是国际体系的成员<sup>③</sup>,其次战争中至少有 1,000 以上的死亡人数。最近黄元载(Wonjae Hwang)使用 COW 的 MID3.0 和 ISC 3.0 重新评估了国家实力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检验了国家偏好(preference)对冲突和战争的影响。<sup>④</sup>

另一种主要的国际冲突数据是由“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库”(ICB)提供的危机数据。<sup>⑤</sup>ICB 对国际危机事件的认定包含两个方面:(1)基本的价值观受到威胁;(2)在限定的时间内必须做出反应以及卷入军事敌对的几率大增。<sup>⑥</sup>收集这个数据最初开始于 1975 年,2010 年 7 月发布的最新 ICB 10 版涵盖了 1918 年“一战”结束到 2007 年发生的 455 次国际危机事件和 35 次持久冲突(protracted conflicts)涉及了 1,000 个行为体。ICB 的数据包括体系层次(system)和行为体层次(actor)两种数据。由于 ICB 数据在收录时设计非常全面,涵盖了许多变量,它也得到许多学者的完善和修正,在后而我们将要介绍对 ICB 中扩展的国际调解数据,它也被广泛地用于冲突管理研究中。最近迈克尔·布雷彻(Michael Brecher)利用 ICB 数据系统地分析了国际危机的发生、升级和影响因素和后果。<sup>⑦</sup>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UCDP)和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PRIO)的“内战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ivil War)提供了 1946 年以来的“武装冲突数据”(Armed Conflict data, ACD)。<sup>⑧</sup>该数据库对武装冲突的界定更加广泛,不仅包括了国际武装冲突,也包括下而要介绍的国内冲突,而且该项目每年都在《和平研究》上发表前一年的武装冲突数据分析。<sup>⑨</sup>汉内·菲耶尔德(Hanne Field)在最近的一次研究中利用该数

期:2010 年 10 月 28 日)。

<sup>①</sup> 参考 Zeev Maoz, *Networks at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Effects at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815-200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forthcoming), chapter 9; Zeev Maoz,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o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cross Levels of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3, No. 1, 2009, pp. 223-240.

<sup>②</sup> 关于该数据的详细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最后访问日期:2010 年 10 月 28 日)。

<sup>③</sup> 确定国际体系中行为体(或者国家)是收集国际关系数据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对于行为体身份的界定不同收集数据会有很大的不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参考 Gleditsch Kristian Skrede and Kyle Clark Beardsley, "issues in Data Collection".

<sup>④</sup> 参考 Wonjae Hwang, "Power, Preferences, and Multiple Levels of Inter-state Conflict,"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6, No. 3, 2010, pp. 215-239.

<sup>⑤</sup> 关于该数据的详细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www.cidcm.umd.edu/icb> (最后访问日期:2010 年 10 月 28 日)。

<sup>⑥</sup> Michael Brecher and Jonathan Wilkenfeld, *A Study of Crisi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p. 3.

<sup>⑦</sup> 参考 Michael Breche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arthquak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sup>⑧</sup> 关于该数据的详细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www.prio.no/CSCW/Datasets/Armed-Conflict/> (最后访问日期:2010 年 10 月 28 日)。

<sup>⑨</sup> 参考 Lotta Harbom and Peter Wallensteen. "Armed Conflicts, 1946-2009",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4, 2010, pp. 501-509.



据库探讨了产油大国中的政治腐败与内战的关系,发现二者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提醒我们需要谨慎对待资源、政府与武装冲突的关系。<sup>①</sup>

## (二) 国内冲突数据

表-2 显示了几种主要的国内冲突数据库。前文介绍了 UCDP 的国际数据,它也收集了 1946-2008 年的国内武装冲突数据,最近也被学界广泛采用。<sup>②</sup>另一种是 COW 项目收集的“超国家战争”(Extra-State War 3.0)和“国内战争”(Intra-State War 3.0)数据。<sup>③</sup>这两种数据的主要不同在于,前者收集的是国家与非国家实体之间的战争,后者是国家内部的战争,即政府与非政府实体之间的战争。前者对数据的要求是主要冲突方中至少有一个不具备主权国家身份,并且每一次战争的伤亡人数在 1,000 人以上;后者收集的是发生在一国国土之内的政府与非政府力量之间或者至少两种非政府力量之间的战争。最近迈克拉·马特斯(Michaela Mattes)和布尔久·萨文(Burcu Savun)利用 COW 的国内战争数据研究了 1945-2005 年期间内战中的协定的持续时间与新内战爆发的关系。<sup>④</sup>

另一种国内冲突数据是由“政治动荡工作组”(The Political Instability Task Force, PITF)提供的所谓“失败国家”数据。<sup>⑤</sup>该项目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对“政治动荡”的定义包括爆发革命或种族战争、不利的政权变更和种族清洗,涵盖了 1945-2008 年的内战和所谓的“失败统治”数据。杰克·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等人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根据 1945-2003 年的数据提供了一个预测“政治动荡”的模型。<sup>⑥</sup>“少数裔风险”数据(Minorities at Risk data, MAR)收集了世界上 1945-2003 年期间 283 个活跃的政治种族群体的活动<sup>⑦</sup>,它由泰德·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于 1986 年建立,经过 5 个阶段的收集,其变量已达到 400 多个,以观测全世界种族之间的压迫和流动情况。该数据被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广泛使用。例如雅罗斯拉夫·蒂尔(Jaroslav Tir)和迈克尔·亚辛斯基(Michael Jasinski)利用 MAR 数据扩展了“转移使用武力论”,发现当国内领导人的政治生存受到挑战时,更倾向于对国内种族冲突中的少数裔使用武力以获得公共的支持。<sup>⑧</sup>

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国内冲突(内战、种族冲突)的关注越来越多,而且受到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与此相关的数据库建设也发展迅速,除了前而介绍的这几种数据之外,还

<sup>①</sup> 参考 Hanne Fjelde, "Buying Peace? Oil Wealth, Corruption and Civil War, 1985-99",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5, No. 2, 2009, pp. 199-218.

<sup>②</sup> 例如 David E. Cunningham, "Blocking Resolution: How External States Can Prolong Civil War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2, 2010, pp. 115-127;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nd Andrea Ruggeri,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Democracy, and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2, 2010, pp. 299-310.

<sup>③</sup> 关于 Extra-State War 3.0 和 Intra-State War 3.0 数据的详细介绍和下载地址可参考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28 日)。

<sup>④</sup> 参考 Michaela Mattes and Burcu Savun, "Information, Agreement Design, and the Durability of Civil War Settle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4, No. 2, 2010, pp. 511-524.

<sup>⑤</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globalpolicy.gmu.edu/pitf/>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28 日)。

<sup>⑥</sup> 参考 Jack A. Goldstone et al., "A Global Model for Forecasting Political Insta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4, No. 1, 2010, pp. 190-208.

<sup>⑦</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www.cidcm.umd.edu/mar/>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28 日)。

<sup>⑧</sup> 参考 Jaroslav Tir and Michael Jasinski, "Domestic-Level Diversionary Theory of War: Targeting Ethnic Minoriti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No. 5, 2008, pp. 641-664.



有“世界政治与社会指标手册”(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sup>①</sup>，“种族战争的隔离方式”(Partition as a Solution to Ethnic War)<sup>②</sup>，“少数裔、暴乱与内战数据”(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data)等国内冲突数据<sup>③</sup>。

### (三) 冲突管理数据

表-3展示了几种主要的冲突管理数据。在国际冲突调解数据方面，前面已经介绍了ICB数据，它在1977年建立之初并没有关于国际冲突调解的数据，在2001年25位学者开始在原有版本基础上系统搜集国际冲突调解的数据，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现在这个包括近200个变量的国际危机数据库版本。<sup>④</sup>另一种常见冲突管理数据是由雅各布柏科维奇(Jacob Bercovitch)收集的“国际冲突管理数据”(ICM)<sup>⑤</sup>，它涵盖了1945-1995年期间的295次威胁或使用武力的争端，它们经历了3,207种不同的冲突管理形式，其中调停有1,859次。利用这一数据产生了一大批关于国际冲突管理的研究成果。<sup>⑥</sup>

另一种冲突管理数据是“第二方与国内冲突干预数据”(TPIID-Intrastate Disputes)<sup>⑦</sup>，它涵盖了1900-2006年以来所有的第三方对国内争端的干预。第三方包括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IGO)和非政府组织(NGO)。这个数据对“干涉”的定义不仅包括军事干涉，也包括非军事干涉。这个数据还区分了冲突的不同阶段，包括危机前(pre-crisis)、危机(crisis)、冲突(conflict)、冲突后(post-conflict)和危机后(post-crisis)。迈克·米伦巴赫(Mark J. Mullenbach)和杰勒德·马修斯(Gerard P. Matthews)利用这个数据研究了美国在1945-2002年期间对海外的国内冲突的干涉，他们区分了国际和国内因素对美国干涉动机的影响，认为国际因素通常比国内因素的影响更为重要。<sup>⑧</sup>

另外一种常见的冲突管理数据是ICOW的“领上、河流和海权主张争端数据”(ICOW Territorial Claim, River Claim, and Maritime Claim data)。<sup>⑨</sup>它涵盖了1816-2001年以来西半球

<sup>①</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www.icpsr.umich.edu/icpsrweb/ICPSR/studies/07761>(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28日)。

<sup>②</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econ.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EXTDEC/EXTRESEARCH/0-contentMDK:20699324~pagePK:64214825~piPK:64214943~theSitePK:469382,OO.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28日)。

<sup>③</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www.Stanford.edu/group/ethnic/>(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28日)。

<sup>④</sup> Jonathan Wilkenfeld, Kathleen J. Young, David M. Quinn and Victor Asal, *Mediating International Crises*(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17 在这本书中, Jonathan Wilkenfeld等系统地介绍了ICB中的危机调解变量。最近使用ICB研究国际调解的一篇文章是 Kyle Beardsley, "Pain, Pressure and Political Cover: Explaining Mediation Incid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4, 2010, pp. 1-12.

<sup>⑤</sup> 目前, ICM数据的获得需要通过电子邮件联系雅各布·伯科维奇教授本人。

<sup>⑥</sup> Tobias Bohmelt,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4, No. 4, 2010, pp. 566-592; Tobias Bohmelt,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cks of Diplomacy Strategies in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2, 2010, pp. 167-178.

<sup>⑦</sup> 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faculty.uca.edu/markm/tpi\\_homepage.htm](http://faculty.uca.edu/markm/tpi_homepage.htm)(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29日)。

<sup>⑧</sup> 参考 Mark J. Mullenbach and Gerard P. Matthews, "Deciding to Intervene: 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nfluences on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s in Intrastate Dispute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4, No. 1, 2008, pp. 25-52.

<sup>⑨</sup> 关于ICOW数据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www.paulhensel.org/icoworg.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30日)。



和西欧对领土、海洋权利的主张，以及中东、西半球和西欧对河流的权利主张。相比于前而的两种数据，ICOW 数据对于“争议问题”(issues of contention)进行了界定，允许比较不同问题的管理方式及其效果。该数据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sup>①</sup>例如，托拜厄斯·博梅尔特(Tobias Bohmelt)在文章中利用这个数据研究了调解者的规模(size)对调解的效果的影响，发现二者之间呈现出一个倒“U型”曲线的关系。<sup>②</sup>

“危机管理”与“冲突解决”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的两个热点问题，除了我们前而介绍的几种主要数据库外，还有一些作者自己收集而形成的“复制数据”，这些数据既有关关注“国际和平建设”(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sup>③</sup>，也有关于“国际领土争端”(Territorial Dispute)<sup>④</sup>的管理数据。

<sup>①</sup> 例如 Paul R. Hensel, Michael Allison, and AhmedKhanani, "Territorial Integrity Treaties and Armed Conflict over Territory," II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6, No. 2, 2009, pp.120-143 — Paul R. Hensel,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Thomas E. Sowers II, and Clayton L. Thyne, Bones of Contention: Comparing Territorial, Maritime, and River Issu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2, No. 1, 2008, pp.117-143 — Hansen, Holley, Sara McLauhlin Mitchell, and Stephen C. Nemeth, "IO Mediation of Interstate Conflicts: Moving Beyond the Global vs. Regional Dichotomy," II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No. 2, 2008, pp.295-325 等。

<sup>②</sup> 参考 Tobias Bohmelt, "The Impact of Multi-Party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s: Synergy, Conflict, Effectivenes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Theory vs. Policy? Connecting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New Orleans Hilton Riverside Hotel. The Loews New Orleans Hotel. New Orleans. LA. Feb 17 2010.

<sup>③</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econ.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EXTDEC/EXTRESEARCH/0-contentMDK:20701031~pagePK64214825~piPK:64214943~theSitePK:469382,00.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30日)。

<sup>④</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dvn.iq.harvard.edu/dvn/dv/phuth/faces/study/StudyPage.xhtml?studyId=18738>(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30日)。



## 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二）\*

2015年12月29日 文/陈冲 刘丰\*\* 阅读/39 点赞/0

【编者按】国际关系研究经常需要运用数据对问题进行比较、检验或支持。一般而言，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获得相应数据：收集新数据和利用已有数据库。相对说来，后者更为省时、省力，并使所收集的数据在信度和效度上易于达到科学研究的水平。本期他山之石，继国际关系的“冲突/冲突过程数据库”的介绍之后，接续刊载“国际经济政治地理数据库”和“组织数据与调查数据”，包括其主要用途、特征、使用方法及最新研究成果。

### 二、国际经济政治地理数据库

#### （一）国际经济数据

布鲁明等人对国际关系领域的《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国际研究季刊》和《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三份杂志 1995-2005 年发表的文章进行调查后发现，国际政治经济学主题达到了 30.4%，位居第一；而且在每一份杂志中所占的比例也都是最高的。<sup>①</sup>在亨塞尔的调查中，经济议题的文章占到了所有定量分析文章比重的四分之一，而且在国际国内冲突的研究中，经济变量几乎成为必不可少的解释变量或控制变量。在这些定量分析中，经济议题一般包括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经济发展与增长、货币政策、对外援助、制裁、债务等。

表-4 展示了几种不同的经济数据。第一种是“宾大世界经济表”（Pen World Table, PWT）。<sup>②</sup>它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跨国比较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主持，2009年8月更新的6.3版本涵盖了世界上189个国家1950-2007年的国民生产情况。由于其收录数据的权威性和完整性，PWT在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PWT数据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相互补充，尽管世界发展指数涉及的变量更为全面，涵盖的经济问题也更多，但是遗憾的是“世界发展指数”需要付费使用。<sup>③</sup>在佩伊维·卢亚拉（Päivi Lujala）的研究中，他使用PWT6.0的数据来探究为什么资源依赖型国家爆发的国内冲突比其他国家更多这一问题，他发现国家汲取资源的方式以及资源所在位置对于国内冲突发生具有显著性的影响。<sup>④</sup>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0年第4期。

\*\* 陈冲，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刘丰，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sup>①</sup> Marijke Breuning, Joseph Bredehoft, and Eugenewalton, —Promise and Performance: An Evaluation of Journa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6, No.4, Dec. 2005, p. 453.

<sup>②</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pwt.econ.upenn.edu>（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30日）。

<sup>③</sup> 相关介绍可参考 <http://www.worldbank.org/data>（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30日）。

<sup>④</sup> 参考 Päivi Lujala, —The Spoils of Nature: Armed Civil Conflict and Rebel Access to 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1, Jan.2010, pp. 15–28.

表-4: 国际经济数据<sup>①</sup>

数据库 <sup>②</sup>	主要用途 <sup>③</sup>	时间年限 <sup>④</sup>	数据格式 <sup>⑤</sup>	比较 <sup>⑥</sup>
PWT 6.3 <sup>⑦</sup>	GDP、GNP、收入、经济开放度、储蓄 <sup>⑧</sup>	1950-2007 <sup>⑨</sup>	MS Excel(.csv), SAS 和在线数据 <sup>⑩</sup>	从覆盖的宽度来说, UNCTAD 涵盖议题更为广泛, 更新也最为及时; 而 COW 的贸易数据时间跨度最大, 对于历史经济数据的记录比较有代表性; 另外两种数据基本上都是“二战”结束后的数据, 在准确性上比较可靠; 格莱迪奇的扩展数据很好地处理了缺失数据的问题, 比较精确。 <sup>⑪</sup>
COW International Trade <sup>⑫</sup>	双边贸易额与进出口额 <sup>⑬</sup>	1870-2006 <sup>⑭</sup>	MSEXcel(.csv) <sup>⑮</sup>	
Expanded Trade and GDP Data <sup>⑯</sup>	GDP、人口和双边贸易 <sup>⑰</sup>	1948-2004 <sup>⑱</sup>	readme 和(.asc) <sup>⑲</sup>	
UNCTAD <sup>⑳</sup>	世界贸易、商品、商业船只、人口劳动力、FDI 等 <sup>㉑</sup>	1970-2009+ (部分追踪到 1950 年) <sup>㉒</sup>	.int 和 MS Excel(.csv, .xls) <sup>㉓</sup>	

表格来源: 作者自制<sup>⑳</sup>

贸易与国际冲突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关于国家间的贸易数据也比较完整, 战争相关项目的“国际贸易数据”(COW International Trade)<sup>①</sup>便是其中一种。该数据库收录了 1870-2006 年期间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数额,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地运用。凯瑟琳·巴比里(Katherine Barbieri)等利用 COW 的贸易数据检验了几种关于贸易与冲突关系观点, 并详细介绍了 COW 的贸易数据的建立和使用情况。<sup>②</sup>另一种关于贸易和 GDP 的常用数据库是由克里斯汀·格莱迪奇(Kristian Gleditsch)收集的“扩展贸易与 GDP 数据”(Expanded Trade and GDP Data)。<sup>③</sup>该数据库很好地处理了冲突研究中的“缺失数据”问题。作者利用其他替代资源, 改变赋值的规则, 扩展了既有的关于 GDP 和贸易的数据(主要是 PWT 和 IMF 的贸易数据)。由于在缺失数据的处理上格莱迪奇的数据更为可靠, 该数据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在许多研究成果中都会加以利用。例如, 在最近关于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是否对冲突方的调解出现产生影响的研究中, 博梅尔特主要使用的是格莱迪奇的“扩展贸易与 GDP 数据”。<sup>④</sup>汉·多鲁森(Han Dorussen)和休·沃德(Hugh Ward)则利用该数据库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检验了国际组织、贸易以及民主与和平的关系。<sup>⑤</sup>

<sup>①</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下载地址参考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sup>②</sup> 参考 Katherine Barbieri, Omar M. G. Keshk, and Brian Pollins, —Trading Data: Evaluating Our Assumptions and Coding Rule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6, No. 5, Nov. 2009, pp.471–491.

<sup>③</sup> 关于该数据的详细介绍参考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Expanded Trade and GDP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 5, Oct. 2002, pp. 712-724. 可在 <http://privatewww.essex.ac.uk/~ksg/exptradegdp.html> 下载最新版本的数据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sup>④</sup> 参考 Tobias Böhmelt,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bid.* pp. 566-592.

<sup>⑤</sup> 参考 Han Dorussen and Huge Ward, —Trade Networks and the Kantian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7, No.1, Jan.2010, pp.29-42.



另一种经济数据是“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数据。<sup>①</sup>它免费提供了关于世界贸易、投资、发展和国际金融流动的相关数据,包括“国际商品贸易”(International Merchandise Trade)、“国际贸易服务”(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国际贸易商品服务”(International trade in merchandise and services)、经济趋势(Economic trends)、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部金融资源(External financial resources)、人口和劳动力(Population and labour force)、商品(Commodities)、海洋运输(Maritime transport)数据,它在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运用广泛。例如利用 UNCTAD 的 1980-2000 年 FDI 的数据,玛吉特·巴斯曼(Margit Bussmann)在双边和多边层次上分析经济一体化中的 FDI 的存量(stocks)、流入(inflows)和流出(outflows)对国际冲突爆发的影响。他发现 FDI 的流入和存量减少了爆发重大争端的风险。<sup>②</sup>另外,目前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统计报告中能够获取许多国际经济方面的数据。<sup>③</sup>

## (二) 地理环境和政治数据

近年来在冲突研究中地理变量正在受到广泛的关注。<sup>④</sup>表-5 展示了几种主要的政治地理环境数据。第一种是 COW 的“毗邻数据”,包括“直接毗邻数据”(Direct Contiguity data)和“殖民依附毗邻数据”(Colonial/Dependency Contiguity data)。<sup>⑤</sup>直接毗邻数据测量的是 1816-2006 年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之间的直接毗邻程度,毗邻国由五类构成,一种是陆上毗邻(路上边界或河流),另外四类是水域毗邻(以 12, 24, 150 和 400 英里为准)。殖民依附毗邻数据则是根据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国家由与其殖民地或依附国,或者两个依附国之间的殖民或依附关系测量的。COW 的毗邻数据在国际冲突研究中应用比较广泛。例如,威廉·里德(William Reed)和戴娜·千叶(Daina Chiba)将毗邻领土效应分解为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效应来对军事冲突与两国之间的边界关系进行研究。<sup>⑥</sup>除此之外,COW 还提供了“国际军事冲突发生地点”(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Location, MIDLOC)数据用以研究地理环境位置对国际争端发生的影响。<sup>⑦</sup>

<sup>①</sup> 关于 UNCTAD 数据的相关介绍和下载参考

<http://www.unctad.org/Templates/Page.asp?intItemID=1584&lang=1>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sup>②</sup> 参考 Margit Bussman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ilitarize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7, No.2, March 2010, pp.143-153.

<sup>③</sup> 例如世界银行的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data (前身是 World Debt Tables), 世界发展指数它们分别可以在 <http://go.worldbank.org/9GEOFVEAS1> 和 <http://www.worldbank.org/data> 上获取, 但这些数据一般都需要研究者自己购买。

<sup>④</sup> 关于“地缘的毗邻性”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在研究联盟行为时作出的精辟论述, 参考[美] 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sup>⑤</sup> 这两种数据均可在 COW 的网站上下载, 参考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sup>⑥</sup> William Reed and Daina Chiba, —Decompo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iguity and Militarized Conflic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4, No. 1, Jan.2010, pp. 61-73.

<sup>⑦</sup> 关于该数据的介绍可参考 Alex Braithwaite, -MIDLOC: Introducing the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Location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7, No.1, Jan.2010, pp.91-98. 该数据可以在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下载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表-5: 政治地理环境数据<sup>①</sup>

数据库 <sup>②</sup>		主要用途 <sup>③</sup>	时间年限 <sup>④</sup>	数据格式 <sup>⑤</sup>
地理资源数据 <sup>⑥</sup>	COW Contiguity data <sup>⑦</sup>	国际或殖民国家的地理位置距离 <sup>⑧</sup>	1816-2006 <sup>⑨</sup> 1916-2002 <sup>⑩</sup>	MSEXcel(.csv) <sup>⑪</sup>
	PRIO Geographical and Resource Datasets <sup>⑫</sup>	国家地理数据、自然资源数据 <sup>⑬</sup> (钻石、石油、河流) <sup>⑭</sup>	1815-2001 <sup>⑮</sup>	Stata(.dta) 和 MS Excel(.csv) <sup>⑯</sup>
	TFDD <sup>⑰</sup>	国际河流、关于淡水资源的合作与冲突事件 <sup>⑱</sup>	1820-2007 <sup>⑲</sup> 1950-2008 <sup>⑳</sup>	在线访问数据 <sup>㉑</sup>
自然灾害 <sup>㉒</sup>	EM-DAT <sup>㉓</sup>	地震、火山等自然灾害及其范围 <sup>㉔</sup>	1900-2010 <sup>㉕</sup>	MSEXcel(.csv) <sup>㉖</sup>
政治数据 <sup>㉗</sup>	Polity IV <sup>㉘</sup>	政治体制、民主和独裁 <sup>㉙</sup>	1800-2009 <sup>㉚</sup>	SPSS(.sav)和 MS Excel(.csv) <sup>㉛</sup>
	Political Survival Data <sup>㉜</sup>	国家层次和领导人层次; <sup>㉝</sup>	1800-1999 <sup>㉞</sup>	Stata(.dta) <sup>㉟</sup>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sup>㊱</sup>	政治腐败、法治 <sup>㊲</sup>	1996-2009 <sup>㊳</sup>	MSEXcel(.csv) <sup>㊴</sup>
	Institutions and Elections Project <sup>㊵</sup>	政治选举 <sup>㊶</sup>	1972-2005 <sup>㊷</sup>	Stata(.dta)和(.txt) ASCII (comma delimited) <sup>㊸</sup>

表格来源: 作者自制<sup>①</sup>

另外, PRIO 提供的“地理和资源数据”(Geographical and Resource Datasets)中也提供国家之间的边界长度。它由凯瑟琳·弗朗(Kathryn Furlong)和尼尔斯·彼得·格莱迪奇(Nils Petter Gleditsch)两人完成,包含了1815-1997年国际体系中国家边界变更的确切日期,并提供了一个关于边界长度的比较<sup>①</sup>,同时也包括政治实体之间的最短距离数据。除此之外,PRIO 还提供了“钻石资源”(Diamond Resources)、“石油数据”(petroleum datasets)等资源数据。<sup>②</sup>另一种关于自然资源争端的数据是“跨国淡水资源争端数据”(Freshwater Dispute Database)<sup>③</sup>,它由六个子数据库组成,包括1820-2007年的“国际淡水条约数据”(International Freshwater Treaties Database)、1950-2008年的“国际淡水事件数据”(International Water Event Database)等。自然灾害经常被作为一个诱因纳入到国内冲突的分析中。由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收集的“紧急事件数据库”(Emergency Events Database, EM-DAT)收录了1900年以来的包括干旱、火山、海啸、森林火灾等11种自然灾害。<sup>④</sup>例如查尔斯·科恩(Charles Cohen)和埃里克·韦尔克(Eric D. Werker)根据这

<sup>①</sup> 关于该数据的介绍可参考 Kathryn Furlong and Nils Petter Gleditsch, —The Boundary Datase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9, No. 1, February 2003, pp. 93–117.

<sup>②</sup> 关于这些数据的介绍和下载可参考 <http://www.prio.no/CSCW/Datasets/Geographical-and-Resource/> (最后访问日期: 2010年10月30日)

<sup>③</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transboundarywaters.orst.edu/database/> (最后访问日期: 2010年10月30日)

<sup>④</sup> 关于这个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访问 <http://www.emdat.be/> (最后访问日期: 2010年10月30日)。



个数据的经验观察提出了一个自然灾害干预的政治经济学模型,用以解释为什么国家政府在自然灾害的防止上会有不同的表现,进而探讨政府对国际援助选择的动机问题。<sup>①</sup>

对于政治数据的关注主要受到“民主和平论”研究的推动。政治数据一般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政治制度(比如民主政体与独裁政体),二是政治领导人的数据。最常用的政治数据是“政体 IV”(Polity IV)<sup>②</sup>,它包含了 1800-2009 年 163 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数据,它的分值从-10(最不民主)到+10(最民主),西方研究者一般将分值在+6 以上的政体视为民主政体。从 1975 年最初发布的 Polity I 到 2009 年最新版的 Polity IV,该数据库被广泛运用于国际冲突研究中,作为衡量政体民主与否的一个指标。例如,拉尔斯-埃里克·塞德曼(Lars-Erik Cederman),西蒙·胡克(Simon Hug)和卢茨·克雷布斯(Lutz F. Krebs)利用 Polity IV 数据研究了民主化与国内冲突的关系,发现民主化导致的冲突仅限于政府间冲突而不是领土冲突。<sup>③</sup>道格拉斯·吉布雷(Douglas M. Gibling)利用这个数据研究了国家领导人在面临外部威胁时对国内集权的改变,以达到一种“团结”效应,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存在。<sup>④</sup>另一种“政治生存数据”(Political Survival Data)关注国家制度和领导人两个层面<sup>⑤</sup>,该数据由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等人收集整理,梅斯奎塔利用该数据提出了“政治生存理论”(Political Survival Theory)。<sup>⑥</sup>

由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数据涵盖了 1996-2009 年世界 213 个经济体六个维度上的治理指标,包括“言论和责任”(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和无暴力”(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治”(Rule of Law)、“控制腐败”(Control of Corruption)。<sup>⑦</sup>另一个政治数据是由宾厄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提供的“制度与选举项目数据”(Institutions and Elections Project)<sup>⑧</sup>。它收录了 1972-2005 年间国际体系中的所有国家的政治选举数据,该数据库的特点在于它广泛的变量设置(从立法机构到中央银行)和国家范围(民主和专制国家)。由于采用了

<sup>①</sup> 参考 Charles Cohen and Eric D. Werk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ural’ Disasters, ||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No. 6, Dec. 2008, pp.795-819.

<sup>②</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sup>③</sup> 参考 Lars-Erik Cederman, Simon Hug and Lutz F. Krebs, —Democratization and Civil War: Empirical Evidence, ||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4, August 2010, pp. 377-394.

<sup>④</sup> 参考 Douglas M. Gibling, —Outside-In: The Effects of External Threat on State Centralization, ||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4, No. 4, August 2010, pp.519-542.

<sup>⑤</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nyu.edu/gsas/dept/politics/data/bdm2s2/Logic.htm>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sup>⑥</sup> 参考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lastair Smith,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James D. Morrow,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sup>⑦</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govindicators.org/>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sup>⑧</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2.binghamton.edu/political-science/institutions-and-elections-project.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0 日)。



与 COW 相同的国家编码，它能够很好地与 COW 的其他数据兼容。接下来，我们将介绍有关国际组织和条约的数据以及关于对外政策分析态度的调查数据。

### 三、组织数据与调查数据

#### （一）国际组织/条约数据

表-6 展示了几种主要的国际组织/条约数据。第一种是 COW 项目的“政府间国际组织”（COW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OW IGO）数据。<sup>①</sup>它收录了 1815-2005 年间所有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信息，它对 IGO 的定义是至少包含 3 个民族国家成员。根据分析单位不同，它的数据形式包括 3 种，第一种是按照 IGO 组织，根据 IGO 成立时间列出所有的 IGO 成员；第二种根据国家来组织，列出国家参加的所有 IGO；第三种列出了每一个 IGO 所有的联合双边成员。该数据是研究国际组织最常用的数据。例如伊莉莎白·福塞特（Elizabeth Fausett）和托马斯·沃尔吉（Thomas J. Volgy）利用 COW 的 IGO 数据研究了冷战之后东欧和中亚的“后共产主义国家”IGO 对低程度的冲突的影响。<sup>②</sup>汉·多鲁森和休·沃德利用该数据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检验 IGO 成员联系对国际冲突的影响，证实了康德的假设。<sup>③</sup>

国际同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由布雷特·阿什利·利兹收集的“同盟条约义务与条款”（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ATOP）数据收录了 1815-2003 年所有国家签订的军事同盟协定。<sup>④</sup>例如，利兹、迈克拉·马特斯和杰里米·沃格尔（Jeremy S. Vogel）利用这一数据研究国内领导人的变更对国家履行国际条约承诺的影响，他们发现威权政府领导人的变化容易导致国家放弃条约义务，而民主国家没有这种影响。<sup>⑤</sup>另一种同盟数据是 COW 的“正式同盟数据”（COW Formal Alliance data）<sup>⑥</sup>，它收录了 1816-2000 至少两个国家签订的所有防御协定、中立或非侵略条约（neutrality or non-aggression treaty）或者谅解协议（entente agreement）。它不仅提供了同盟成员国加入或退出的时间，而且也包括该同盟的生命周期。托马斯·普卢佩尔（Thomas Plümper）和埃里克·诺伊迈尔（Eric Neumayer）同时利用 COW 同盟数据和 ATOP 数据作解释变量来研究国际同盟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sup>⑦</sup>

<sup>①</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最后访问日期：2010 年 10 月 31 日）。

<sup>②</sup> Elizabeth Fausett and Thomas J. Volgy,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GOs)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Parsing Out IGO Effects for Alternative Dimensions of Conflict in Postcommunist Spa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4, No.1, March 2010, pp.79–101.

<sup>③</sup> Han Dorussen and Hugh Ward,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Kantian Peace: A Network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No. 2, April 2008, pp.189-212.

<sup>④</sup> 关于这个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atop.rice.edu/>（最后访问日期：2010 年 10 月 31 日）。

<sup>⑤</sup> Brett Ashley Leeds, Michaela Mattes and Jeremy S. Vogel,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the Reli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3, No. 2, April 2009, pp. 461–476.

<sup>⑥</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最后访问日期：2010 年 10 月 31 日）。

<sup>⑦</sup> Thomas Plümper and Eric Neumayer, —The Friend of My Enemy is My Enemy: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49, No. 1, Jan. 2010, pp. 75–96.

表-6: 国际组织/条约数据<sup>①</sup>

数据库 <sup>②</sup>	主要用途 <sup>③</sup>	时间年限 <sup>④</sup>	数据格式 <sup>⑤</sup>	比较 <sup>⑥</sup>
COW IGO data <sup>⑦</sup>	共同的国际组织成员 <sup>⑧</sup>	1815-2005 <sup>⑨</sup>	MSExcel(.csv) <sup>⑩</sup>	COW 的 IGO 数据涵盖的时间跨度最长, 由于对国际组织的界定比较宽泛, 它所收录的数据样本也最多, 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数据; ATOP 数据收录的是军事条约, 主要关注的是条约的生命周期; COW 的同盟数据对于条约的定义宽泛, 重点关注的 <sup>⑪</sup> 是条约的成员国; ICOW 的条约数据仅仅关明确要求和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组织, 样本较小。 <sup>⑫</sup>
ATOP data <sup>⑬</sup>	国家之间的军事同盟协定 <sup>⑭</sup>	1815-2003 <sup>⑮</sup>	Stata(.dta) <sup>⑯</sup>	
COW Alliance data <sup>⑰</sup>	防御条约、中立条约、谅解协议 <sup>⑱</sup>	1816-2000 <sup>⑲</sup>	MSExcel(.csv) <sup>⑳</sup>	
ICOW MTOPS <sup>㉑</sup>	在其章程中明确要求和和平解决争端 <sup>㉒</sup>	1816-2001 <sup>㉓</sup>	Stata(.dta) <sup>㉔</sup>	

表格来源: 作者自制<sup>①</sup>

亨塞尔的 ICOW 项目提供的“和平解决争端的多边条约”(Multilateral Treaties of Pacific Settlement, MTOPS) 数据, 涵盖了 1816-2001 年间所有的全球和地区在其章程中明确要求其成员和平解决争端的组织信息。<sup>①</sup>它目前收录的数据包括超过 30 多个全球和地区国际组织的信息。克丽丝塔·威甘德 (Krista EWiegand) 和伊米莉亚·鲍威尔 (Emilia Justyna Powell) 在研究国家过去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对解决争端的影响时利用了这一数据。<sup>②</sup>除了上面介绍的这四种主要的国际组织/条约数据之外, 还有埃里克·弗滕 (Erik Voeten) 收集的“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记录数据” (Documenting Votes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data) <sup>③</sup>, 它记录了 1946-2008 年所有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记录。

## (二) 调查数据

在对外政策分析领域, 学者们经常使用的数据是关于民众政治态度的数据, 这些数据一般都是由一些调查机构开展收集的, 例如盖洛普民意测验、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意测验数据等。关于政治态度的主要调查数据有三种。第一种是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意调查数据 (Chicago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Public Opinion Survey) <sup>④</sup>, 自 1975 年以来, 它每两年开展一次大规模的调查, 来比较美国公众和世界其他国家公众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 同时也会不定时地开展一些具体问题的调查, 例如 2008 年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查, 2006 年关于“中国和印度崛起”的调查等。另一种民意调查数据是欧洲委员会的“欧洲晴雨表” (Eurobarometer), 即“欧洲委员会公众舆论分析”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sector of

<sup>①</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paulhensel.org/icowdata.html#mtops>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1 日)。

<sup>②</sup> Krista E Wiegand and Emilia Justyna Powell, —PastExperience, Quest for the Best Forum, and Peaceful Attempts to Resolve Territorial Disput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published online 16 August 2010.

<sup>③</sup> 关于该数据的介绍可参考 Erik Voeten —Resisting the Lonely Superpower: Responses of States in the UN to U.S. Dom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No. 3, August 2004, pp. 729-54. 该数据可以在 <http://www9.georgetown.edu/faculty/ev42/UNVoting.htm> 下载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1 日)。

<sup>④</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ccf.org/pos\\_overview.php](http://www.ccf.org/pos_overview.php)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1 日)。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up>①</sup>，它自 1973 年开展以来，每年都在成员国开展一些对重要问题的调查。第三种是“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sup>②</sup>，涵盖了 1981 年以来关于社会文化变迁的数据，它的调查单位不是按照国家来进行的，而是分为不同的社会，比前面两种调查的范围都要广泛。除此之外，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数据也是研究者经常使用的，但是其大部分数据都实行收费制度，不便于获取。罗普中心(Roper Center)免费提供了盖洛普的所有民意测验数据。<sup>③</sup>例如，迈克尔·穆索(Michael Mousseau)在关于从社会经济根源解释民主和平论的机制的研究中使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用以检验个人在合约密集型和收入不平等社会中的行为。<sup>④</sup>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还经常使用其他一些数据如事件数据(event data)和恐怖主义数据。事件数据分析方法是研究国际行为体互动特征的一种方法，自 20 世纪 60 年代产生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代表性的事件数据库有“堪萨斯事件数据系统”(Kansas Event Data System, KEDS)(即现在的“宾州事件数据项目”(PennState Event Data Project)<sup>⑤</sup>，“冲突与和平数据集”(Conflict and Peace Databank, COPDAB)，“世界事件互动测量”(World Events Interaction Survey, WEIS)。<sup>⑥</sup>例如克莱顿·锡恩(Clayton L. Thyne)在关于美国在对外政策中释放出的信号对拉美政变的影响的研究中就使用了 COPDAB 和 WEIS 这两种事件数据。<sup>⑦</sup>“9·11”事件之后，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恐怖主义的关注越来越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恐怖主义事件数据有“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GTD)<sup>⑧</sup>。例如，崔承唤(Seung-Whan Choi)利用 GTD 数据研究了民主国家的“法治”制度是否为国际国内的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便利。<sup>⑨</sup>此外，关于测量“权力”(或国家能力)的数据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普遍使用的一种数据。几乎每一项有关国家实力的研究都会提及 COW 的“国家物质实力数据”。它根据国家的总人口、城市人口、钢铁产量、能源消费、军事人数、军费开支等指标测量了 1816-2007 年国际体系中国家的实力。“国家综合国力指数”就是根据这个数据库中的数据变量计算得出的。<sup>⑩</sup>

<sup>①</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index\\_en.htm](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index_en.htm)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1 日)。

<sup>②</sup> 关于该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1 日)。

<sup>③</sup> 参考 <http://roperweb.ropercenter.uconn.edu/>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1 日)。

<sup>④</sup> Michael Mousseau, —Democratic Peace: The Social Market Roots of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p>⑤</sup> 在 2010 年 1 月，原来由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主持的“堪萨斯事件数据系统”改由宾州州立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的政治学系主持，这一数据库的网站也随之改变，参考 <http://eventdata.psu.edu/>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1 月 4 日)。

<sup>⑥</sup> 这一数据同样可在“宾州事件数据项目”网站上获取，参考 <http://eventdata.psu.edu/data.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1 月 4 日)。

<sup>⑦</sup> 参考 Clayton L. Thyne, —Supporter of Stability or Agent of Agitation? The Effect of US Foreign Policy on Coups in Latin America, 1960–99,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7, No.4, May 2010, pp. 449–461.

<sup>⑧</sup> 详细介绍参考 <http://www.start.umd.edu/start/data/gtd/>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1 月 4 日)。

<sup>⑨</sup> 参考 Seung-Whan Choi, —Fighting Terrorism through the Rule of Law?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Online first, June 15, 2010.

<sup>⑩</sup> 关于这个数据库的介绍和数据下载可参考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最后访问日期: 2010 年 10 月 31 日)。



我们简要回顾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几类定量数据，当然，由于篇幅所限，我们能够介绍的数据仅仅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数据需要研究者们根据个人的研究兴趣和需要去“发现”，也需要研究者们根据已有的数据整合、甚至重新收集研究所需要的数据。



## 罗伯特·吉尔平\*

2015年12月1日 阅读/59 点赞/1

**【编者按】**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巨大而快速的变化给国际关系学科带来严峻的挑战，人类文明的不断前进与发展也使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难题，如何看待纷繁的世界是重要的人类命题，而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透视现实的窗户。本期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罗伯特·吉尔平。

### 一、作者简介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出生于1930年，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学院（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系，目前是该院艾森豪威尔公共与国际事务荣誉教授（Eisenhower Professor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meritus）。从美国海军退役后，他先后担任了美国政治学会的国会研究员（Congressional Fellow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哈佛大学科学与公共政策项目研究员（Fellow of th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at Harvard University）、勒曼研究员（Lehrman Fellow）、埃伯研究员（Abe Fellow）以及美国政治学会副主席（Vice-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并被遴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member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他曾到伦敦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964）、日本国际大学（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Japan, 1984）、欧洲大学研究所（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in Florence, 1989）等世界各地高等学府做访问。

其主要著作包括：《美国科学家与核武政策》（American Scientists and Nuclear Weapons Policy, 1962）、《科学时代的法国》（France in the Age of the Scientific State, 1968）、《美国权力与多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1975）、《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981）、《国际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7）、《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国际经济学》（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2000）和《全球经济学：国际经济新秩序》（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2001）。大多数著作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有多部获奖。

### 二、自我认知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1年第4期。



吉尔平被视为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享有崇高的学术威望。然而在纷繁的现实主义流派分野中，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温和”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现实主义是种关于人、社会和政治性质的哲学立场，而现实主义本身并不是科学。因为科学可以用来证伪，但是现实主义不具备可证伪性，只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吉尔平在分析政治事件时，主要关注行为体的利益和权力，除此之外也注意分析观念等。而且在他看来，宗教等意识不是外生给定的，并且宗教等意识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大师的学术经历和感悟往往是学者们的兴趣点所在，这不仅给他们提供了借鉴，也激发了他们继续学术生涯的动力。在每个学者的成长阶段，良师益友必不可少，他们不仅能给予思想上的启发，也能提供现实的帮助。

初涉国际关系领域时，吉尔平跟随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和保罗·西伯里（Paul Seabury）在加州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读书。那时盛行“新社会科学”、集团理论和行为主义，但是吉尔平却从未青睐过这些方法，这是因为他深受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影响，他认同摩根索强调的观点，即必须从国家行为体的视角观察国际政治，关注行为体的行为、利益和权力。吉尔平认为过于强调基于特定规则或逻辑的体系会忽略很多东西。不过即使如此，他也不认为自己是摩根索的门徒，并指出《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仍然存在学术缺点，如摩根索把客观因素与道德因素放在一起的想法是不可行的。

除了摩根索之外，马克思主义思想、英国作家以及历史研究也影响到了吉尔平。尤其是刘易斯·费尔的研究引发了吉尔平对学术的热爱。

当然，除了特定的个人印象外，有关延续性与变迁性的问题在吉尔平的思想中也至关重要，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政治思想，甚至在教学中，吉尔平会指定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的第一章作为阅读材料。他对修昔底德思想的解读是，外交和外交政策本来可能干预和阻止体系的两极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战争的爆发。这就没有我们认为“囚徒困境”那么绝对。

### 三、物质与意识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关于物质性力量和意识性力量的关系的争论是精彩而激烈的。注重物质性力量的学者往往强调历史、经济和技术等“硬”方面，而注重意识性力量的学者则将身份、规范和情绪等“软”方面置于优先位置。那么，非物质性因素如心理认知、精英阶层的判断等在国家对外行为中的作用涉及到的就不仅是政策的制定，也关乎民意的反馈。

在吉尔平看来，身份是由利益和权力所建构的，而独立于国家和权力。私人利益之外的政治意志不会塑造身份认同，认同来源于共同的经历尤其是战争，意大利人可能会比人们所理解的更趋向“意大利式”。他认为在19世纪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统一德国的战争之前根本不存在什么德意志认同，是战争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他同样把这个理解用于南斯拉夫问题上：在美苏争霸时期，南斯拉夫的许多矛盾包括民族意识都是被压抑的，直到





冷战结束后才觉醒，他们对于自身是“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的认知既是南斯拉夫危机的原因又是结果。欧洲认同也需要一个共同的“敌人”，如苏联，共同的威胁和团结才会巩固认同意识。

吉尔平将意识和物质的问题具体化为对外决策之中的道德和国家利益，尤其是在美国这种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等相互交织的国度里。他认为在布什发动“反恐战争”之后，美国人对于国家利益和道德的判定模糊了，原因在于美国国内没有通过政治斗争做出抉择。而且，在伊拉克战争中有政府最高层秘密制定的外交政策充满了谎言和欺骗，很多人（如国务院高层和专业的军事人员）知道发动伊拉克战争是错误、愚蠢而危险的，也知道阿拉伯世界会反对战争。与官方宣传的一样，很多人把伊拉克战争当做对抗邪恶、推广民主的一种方式，认为这样做是伟大的。但是美国人逐渐清醒了，也慢慢明白发生在伊拉克的一切是那么糟糕，而且未来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吉尔平认为，与美国传统的对外政策不同的是，不是创造了另外一种更加具有侵略性、干涉性和以军事力量为主导的政策。这就部分地支持了观念意识是变革动力的观点。而许多现实主义者之所以反对布什的政策是因为他们更希望未来对外政策的制定由利益来主导而不是由意识形态来主导。

#### 四、国际政治经济学

吉尔平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国际政治经济学》历来被视为霸权稳定论的经典之作。该理论阐述了霸权领导国的存在和持续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是维持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繁荣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英国与美国的霸权领导为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提供了和平与安全的环境。

他认为，国家与市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本理论因素。然而，这两者的逻辑是不同的，甚至是相矛盾的。市场的逻辑是将经济活动集中在便于发展生产并获得高额利润的地方，而国家的逻辑是获取和占有经济活动的好处，控制经济增长及资本积累的进程。这两种逻辑影响着当代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就决定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及其演变。

在他看来，国家和市场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的结果，即世界经济中那些比较持久存在的方面，如国际分工体系、贸易体系、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以及支配经济活动的种种规则和制度。此外，吉尔平认为，国际货币问题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也可以反映出当代国际政治协调与合作的现状。

#### 五、全球化

吉尔平指出，全球经济的开放和一体化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广泛、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全球资本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已经立足于、将来也必须继续立足于可靠的政治基础。这一基础的前提是：领导国的存在、大国的合作以及公众的支持。冷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正



经历着一场最深刻的变革。全球化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机遇和风险并存的挑战，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贸易自由化总受到保护主义的威胁，这一威胁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进一步加剧。世贸组织的成立及其改革措施的实施，也未能解决国际贸易体系的不稳定问题。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摩擦将会继续威胁全球贸易体系。第二，固定汇率制度瓦解以后，全球一直未能确立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设计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困难重重。吉尔平认为，主要原因是各方对于国际货币体系适用的经济模型、理论和具体方法等意见不一，国家货币自主性、汇率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很难同时兼顾，国际货币稳定和国内经济自主性之间存在矛盾。而一个稳定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有赖于牢固的政治基础，这种基础在战后初期来源于美国和盟国的合作，可是现在这种基础已经不存在了。主要经济大国之间的政治分歧也意味着以制度化的政策协调和严格的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再也不可能出现，或许“危机管理机制”是在未来可以尝试的办法。没有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救助机制是 21 世纪初期世界经济的最突出特征。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暴露了这一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能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这表明缺乏有效的国际监管造成的严重后果会使世界经济付出极高的代价。最后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其行为已经对全球财富分配和民族国家的经济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由于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性和投资对象国的自我保护，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会遇到困难。此外，区域化的快速发展也构成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挑战。比如欧洲一体化运动、北美区域主义和亚洲区域主义的发展，这将可能会加大地区保护主义的力度，对建立更为开放的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总之，吉尔平认为，全球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但同时又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全球化的发展也将会构成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

## 六、国际关系研究现状

吉尔平以现实主义视角看待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变化与发展。他认为，尽管跨国公司、国际机构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民族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构成了国际体系的主要控制形式，同时权力的相对大小决定了民族国家实现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能力，相对权力最大的国家拥有对国际体系的支配权和控制权。世界经济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市场，也取决于民族国家的政策，但是，国家安全永远是国家最关心的问题，以上观点都体现了其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学术倾向。并且他认为国际关系仍然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独立行为者之间争取财富和权力的循环斗争，当代世界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仍是对国家之间权力发展不平衡的后果进行和平调整的问题，由于世界正处于国际体系的转变过程中，战争和暴力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供稿：权贤美、王芳琳、石宇]

[责任编辑：任娟]



## 全球化对于中国企业意味着什么\*

2015年12月9日 文/岳健勇\*\* 阅读/33 点赞/0

**【编者按】**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重要特征，中国的崛起正是发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但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的条件下面临怎样的挑战以及机遇，目前存在不同的观点。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本期学术讲堂带您一起领略岳健勇博士在牛津大学的演讲。

首先感谢约翰（John）的热情邀请。很荣幸今天能够在牛津大学谈论全球化——这是我最喜欢的话题之一。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全球化对于中国企业意味着什么”。我打算将这个题目扩展为“全球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目前的主流观点是，中国显然在高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方面从全球化中获益巨大。中国企业正变得更大更强，因此，中国正在快速实现工业化并成为经济上的超级大国。

我认为全球化对中国经济而言是双刃剑而非有益无害，因此我质疑这种主流的观点。一方面，全球化确实发挥了中国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刺激了中国出口导向型高 GDP；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将中国企业卡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阻碍其技术水平升级，从而限制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众所周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领导人做出的重要决定。这对中国的企业而言是一场冒险，因为在“入世”之前，这些企业与全球企业相比，在任何方面都极弱，彼得·诺兰（Peter Nolan）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研究，这些企业或者没有被征询意见，或者被排除在协议之外。与中国跟全球经济深度整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的传统观点相反，我认为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自然融合不仅是由于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成功，还在于改革和工业化的困境迫使中国尽可能早地加入 WTO 以保证经济增长。前国家总理朱镕基在 2002 年对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an Roach）说得很明白，“中国如果不加入 WTO，就不可能实现重组和维持经济增长”。

全球化的逻辑是竞争是万能的。竞争会使低效的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变得更有效率。但竞争真正的操纵者是政治。中国领导人在谈判桌上做出了广泛的让步。究其原因，是在 1989 年之后经济增长是其执政合法性的唯一可靠来源，加入 WTO 被他们认为是对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的重大刺激。

贸易和投资的激进自由化意味着中国放弃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在东亚生效的大部分工业政策。这违背了工业化先于经济自由化的通常做法。用夏俊昌（Ha Joon-Chang）的话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2年第3期。

\*\* 岳健勇，男，出生于台湾，知名自由学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化与中国的发展，东亚国际政治。



说，“事实上，现在的所有发达国家在赶超阶段，都实施过工业、贸易和技术政策”。中国是个例外吗？

实际上，许多中国企业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已经发展为行业巨头。然而，这些企业都是在过去十几年间没有得到政府扶持的寡头国有企业（SOE）。私人企业在加入 WTO 前的 90 年代曾经受到鼓励，但是它们日渐陷入困境。总的来说，私人资本家的成长在政治上是不受现行体制欢迎的。与之相反，外国资本家在政治上的危险更少，因为他们关注的更多是钱而不是政治，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是中国政府的同盟，因为它们游说中国政府将贸易从政治中剥离出来。

这些政策明显限制了私人企业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角色。更广阔的市场准入和廉价劳动力使得中国成为跨国企业心中最理想的产品基地，这些企业将“核心经济活动”重新定位于中国。他们是市场领导者，并且通过主导中国高科技部门和国际贸易增加竞争力。随着很多产业政策因 WTO 协议而无效，中国维持在国有部门的外部干预不是为了使得国有企业更加有竞争力，而是为了使它们规模更大、通过寡头或垄断取得更大的效益。

加入 WTO 后由于国外直接投资的涌入而带来的新一轮投资热潮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作为世界主要的制造业大国，中国毫无疑问是 19 世纪主导工业创新的英国的翻版。随着全球供应链的延伸，中国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装备制造基地。

面对跨国企业日益渗入全球市场、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购体系的形势，本土的企业不能立足于中国国内市场基础上在全球层次上竞争。随着全球范围内国际劳动分工，本土企业在从先进国家的“设计、主要零部件和制造设备”进口方面的依赖日益加深。它们得到的只是最后劳动力密集装配阶段的微薄附加值（以苹果为例）。尽管它们进口尖端设备制造产品，鉴于相比外资企业无竞争优势可言的现状，它们几乎没有选择的机会，只得制造无差别、标准化的产品。这种所谓的商品化的生产降低了准入门槛，也急剧降低了本土企业的利润水平。因此，本土企业不能在研发升级领域大量投资。截止 2005 年，在市场主导力量上，外资企业提升而中国制造业企业衰弱使得市场主导方换位。本土企业提出国家主导创新的理念，即要求国家提高研发投入、引入一系列产业政策提升本土企业的创新力以降低国内对国外技术资源的依赖，争取从目前的 50% 降至 2020 年的 30%。

我不会细讲国内创新。这是傅晓岚博士的观点，该理念的重点在于加强国内企业的资本吸引力，通过强制实行“地方性内容”确保技术由跨国企业转向本土企业。除此之外，在 2005 年前后，中国政府在 2004 年制定了《政府采购法》，2008 年制定《反垄断法》。以上再加上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消退共同组成了中国产业政策以提升本土创新力。

然而，为提升国内企业原创能力而制定的中国本土创新计划被很多跨国企业视为“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技术剽窃计划”。外企对中国政府为平衡国内外投资技术而制定的“地方性内容”尤其敏感。这实际上夸大了中国追赶西方的能力，因为缺乏本土企业吸引力



的重要提升，中国没有办法在长期竞争中脱离创新赶上西方，即使中国通过各种非常规途径获得复杂的西方国家技术。这与前苏联如出一辙。

此外，本土创新力毫无疑问是“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的，并没有违背中国的 WTO 协定。这些产业政策是 WTO 框架内的法律政策指导规范。例如，中国签订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禁止了“地方性内容”的原则要求，但是这些实际上是灰色地带，即中国可以在法律上把“地方性内容”规定应用到少数未开放的产业部门。

因此，中国不是在通过扶持工业化来寻求自由的全球化替代方案，相反，这是试图在严格的 WTO 规则约束下进行现代化的行为。从中美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中国进一步的自由化协定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这三轮对话中，中国同意向国外投资者开放“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能源储备和环境保护产业领域”，加入 WTO《政府采购协定》（GPA），撤回“地方性内容”条款，并且开放股票交易。中国不得不接受这些要求以换取美国继续向中国产品开放市场。

本土创新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中国在这一方面还远未取得成功，这部分是由于政策不连贯，部分由于来自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持续的自由化压力。结果外资企业的市场主导趋势在 2005 年后没有减弱反而得到加强。迄今为止，国外直接投资已经控制超过半数的中国国际贸易和 85% 的高科技出口。官方报告宣称截至 2009 年，由外资企业控制的市场已经超过国内产业安全水平。

因此，大多数的中国企业被卡在全球价值链的最底端，这证实了阿姆斯登（Amsden）提出的非主流论证，即全球经济体系的后来者没有必要通过低端产业的专门化来实现简单工业化。除非大量专业的民族企业成为国内外市场的领头人物，否则国家无法实现产业化，这是实践的结果，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自我预言。产业化也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还需要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从任何层面来说，经济的独自增长无论如何都不是中国崛起的象征。全球化没有让中国成为产业的巨人，崛起的道路依旧是遥远的。

在现今的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的成员有责任恢复全球市场的平衡。中国不需要采取美国的方式，后者通过在近 5 年内实施一些策略性产业政策来增加出口，将工业制造利润带回国内。制度性的产业升级受到 WTO 规则的阻碍，将增加中国实现从出口增长型转变为创新增长型国家的难度，即使这有实现的可能性。

总之，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发展模式还远远无法成为其他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效法的成功模式。随着特殊的利益群体逐渐强大并控制国家政权，在威权政治的框架内不可能找到实现独立发展道路的改革政策。另外，中国出于国内综合发展考虑提出的对于全球规则的任何修订，都将冲击过去几十年费心建立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需要实现在国内外的两个变革。打破贫富分化的政治变革是必需的，却不是唯一的。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到全球制度变革中，实现全球化更有利于全球发展的目标。只有优化全球化，中国才可能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同时实现全球经济更加稳定与健康。



## 重读摩根索\*

——聆听现实主义大师的伟大智慧

2015年12月10日 文/吴建树\*\* 阅读/67 点赞/2

**【编者按】**作为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摩根索为何偏爱“贵族外交”？道德如何影响国际政治？均势带来的是和平还是战争？摩根索又留下了那些忠告？本期《新视界》带你重读摩根索，聆听现实主义大师的伟大智慧。

本文的写作目的是通过对摩根索国际政治思想的解读，了解摩根索对人性和权力等国际政治的本质因素的论述，审视摩根索的国际政治道德观和他对国家之间基于权力与利益关系的深刻解读。

### 一、现实主义者的理想

摩根索在著述里毫不掩饰自己对欧洲历史上“贵族外交”时代的怀念，他在《国家间政治》中举了很多案例来说明他对17、18世纪贵族外交的向往。他感慨地说道，欧洲贵族社会所遵守的道德行为标准必然具有超国家的特征，它们不是适用于全体普鲁士人或全体奥地利人或全体法兰西人的，而是适用于所有根据他们的出身和所受教育能够理解并按照这些标准行事的人。<sup>①</sup>这就是说在意识形态接近的人群间或国家间，发生冲突的概率可能会小一些。但是，摩根索也并不认为在国家间意识形态相同的状态下就不会发生冲突。相反，摩根索认为，“无论国家之间还是个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是最可靠的纽带”。<sup>②</sup>摩根索怀念贵族外交是因为那时国与国之间彼此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是审慎的，也因为摩根索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已经非常的不满。他论述道，“对美国人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思想发展进行反思时，人们惊奇地发现，各种错误的态度有着顽强的抵抗力，它们以各种伪装逃避了学术争论和政治实践”。<sup>③</sup>换言之，摩根索认为，外交决策者绝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屈从于民众的压力去制定那些不符合现实的外交政策，后者给国家和民众带来不必要的灾难，哪怕是对于美国那样的国家。

在摩根索内心深处，他认为贵族出身的外交官和国务家，由于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和他们之间所共有的价值观念，使他们在处理外交事务中比一般平民出身的外交官和国务家更为理性。正如王缉思所说，现实主义者认为外交权应高度集中，决策者有权以秘密外交的方式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2年第4期。

\*\* 吴建树，男，身残志坚的脑瘫患者，国际关系学拥趸。作者邮箱：[hongshu7@sina.com](mailto:hongshu7@sina.com)；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conitz>。

①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王缉思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0-281页。

② 同上，第9页。

③ 同上，第31页。



纵横捭阖，求得国际冲突的和平解决。在此过程中，应尽量排除国会与公众舆论的干扰。<sup>①</sup>他一生提倡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时，外交家和国务家一定要本着审慎原则去做。

## 二、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美德

摩根索现实主义理论以人性和权力为基础，对人性持悲观态度，这和“联邦党”人<sup>②</sup>的政治理论主张类似，就是以野心来制衡野心。<sup>③</sup>对人性持悲观的态度使摩根索强调以权力来界定利益，并作为他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基础。摩根索这样解释自己的理论，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为观察者规定知识规范，为政治学的研究主题注入理性秩序，因而使政治的理论分析成为可能。<sup>④</sup>政治的实质是权力，而政治的意义在于规范权力的使用，使权力不被滥用，或者说，对武力和权力加以区分，进而使权力的基础不被武力所毁掉。摩根索这样论述这个问题：“假如暴力在战争中成为现实，政治权力便被军事实力取而代之。实际使用暴力意味着两个人之间的心理为他们彼此间的身体接触所取代；前者是政治权力的本质所在，后者则取决于二者孰强孰弱。而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一旦诉诸武力，政治关系中的心理因素便不复存在”。<sup>⑤</sup>

摩根索认为，“在一个仍以主权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作为动机的世界中，和平只能通过两种方法来维持。一是社会力量的自我调节机制，它表现为国际舞台上的权力角逐，即权力均衡。另一种方法是以国际法、国际道德和世界舆论的形式对权力角逐加以规范性的限制”。<sup>⑥</sup>这就是说，摩根索通过把国际政治纳入到政治规范中去，降低了国际政治与生俱来的暴烈性。所以，摩根索的国际政治理论达到了难得的思想高度。他既没有像爱德华·卡尔一样，纠结于道德和权力之间不能平衡，不能自拔；也不像摩根索之后的沃尔兹和米尔斯海默一样，一味地强调权力的绝对物质化。从米尔斯海默对现实主义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与摩根索在思想境界上的高下之分。米尔斯海默这样论述，“现实主义不对国家好坏作出评判，而主要依据它们相对权力的多寡来分辨”。<sup>⑦</sup>米尔斯海默这样的论述反映了他的理论中权力的绝对物质化的倾向。虽然摩根索也认为权力有物质化的一面，但他同时也强调权力非物质的一面，也就是道德和意识形态层面对权力的限制与操控所带来的决定性影响。摩根索这样论述：“道德约束的存在及其效力，明显表现在对美国中央情报局所策划的暗杀阴谋的反映上。美国公众舆论的主流所反对的不是这些企图没有成功，而是它们违反了道德限制”。<sup>⑧</sup>也就是说，道德虽然在国际政治中只起着辅助性的作用，但道德也能有限度地规范国与国之间的权

<sup>①</sup> 王缉思：《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3 页。

<sup>②</sup> 联邦党是美国立国之初，以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为首所形成的一个政党。该政党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该党由于对人性的极度悲观的态度，所以主张用巧妙的政治制度设计，来使联邦政府的各部门为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展开斗争，使权力达到均衡状态，从而使国家免于暴政之苦。

<sup>③</sup> [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陈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264 页。

<sup>④</sup>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王缉思校），第 29 页。

<sup>⑤</sup> 同上，第 57 页。

<sup>⑥</sup> 同上，第 51 页。

<sup>⑦</sup>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年版，第 19 页。

<sup>⑧</sup>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王缉思校），第 268 页。



力斗争。所以，在摩根索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倾向，即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道德或伦理学只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是政治学的起点。<sup>①</sup>这一点体现出摩根索的国际政治理论对人类有一种终极关怀的精神，体现了自马基雅弗利以来现实主义思想的传统，即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政治和道德是分离的。<sup>②</sup>另一方面，摩根索现实主义理论的经验性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他这样论述道，真理在客观上和理性上是真实的，以事实为依据的，靠推理阐明的。<sup>③</sup>摩根索认为，一切新的国际政治理论和一切国家外交政策的好与坏，只能通过实验来验证。在摩根索的政治世界里，他的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价值取向性，就是最终把国际政治带回到古希腊政治“善”与“正义”的发展轨道上去。正如摩根索所言，良好的动机可以保证避免有意制定坏政策，<sup>④</sup>希望通过使用权力来不断完善道德，使国际政治变得更加温和。这就是摩根索现实主义理论的美德所在。

笔者把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与理论的道德取向总结为四点核心要素：

(1) 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认为，政治是植根于人性基础上的，而对人性的悲观态度迫使学者和国务家们必须要用人性中最悲观的一面，也就是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说的，野心只能用野心去制衡。

(2) 国际政治的普遍特征是权力斗争，因为权力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以及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所以，国际政治的权力斗争是国际关系亘古不变的铁律。

(3) 摩根索试图把国际政治纳入政治规范之中，以此来减少国家之间在争夺权力过程中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进而用政治道德来规范权力使用和争夺，从而达到摩根索所著的《国家间政治》副标题——“争强权、求和平”的目的。

(4) 摩根索认为，诚然，在国际政治中，以权力来界定利益是普遍适用的。但是，摩根索同时又认为具有道德或法律权威的权力必须区别于赤裸裸的权力，<sup>⑤</sup>得到道德或法律认可的权力，比赤裸裸野蛮的权力更有力量。

简而言之，摩根索的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和道德观里，强调一种对权力的双重约束，既用权力来制衡权力，又用道德和法律以及正义等手段来约束人性中对权力的贪欲的一面。摩根索想通过这样双重制衡的方法，来达到国家间维持长期和平的目的。

### 三、摩根索的均势观

沃尔兹概括摩根索的均势观时认为均势是国家谋求某一事态的政策产物。<sup>⑥</sup>摩根索认为，均势的存在是各国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维持现状的一项外交政策，是一些国家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防止那些谋求改变现状的国家夺取它们的既得利益而采取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而已。正如沃尔弗斯所说，均衡倾向于阻止通过暴力来实现变革，而暴力通常又是

<sup>①</sup> 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2 页。

<sup>②</sup> 但是，马基雅弗利并不希望道德和政治永久分离。见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修订版），第 199 页。

<sup>③</sup>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王缉思校），第 28 页。

<sup>④</sup> 同上，第 30 页。

<sup>⑤</sup> 同上，第 58 页。

<sup>⑥</sup>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年版，第 127 页。





实现重大变革的唯一手段。<sup>①</sup>因此，摩根索认为，均势很难说是给世界带来和平，还是更多的战争。比较长周期的和平不是均势本身可以做到的，而是受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其他一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摩根索认为均势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因为国家间的实力不可能像增加或减少天平的砝码一样来保持平衡。基辛格在讨论维也纳均势体系时有这样一段描述：梅特涅体系<sup>②</sup>反映着十八世纪的宇宙观，认为宇宙犹如一座庞大的时钟，其内部的每一个齿轮均复杂而紧密地咬合着，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他部分的互动就会受影响。<sup>③</sup>此外，摩根索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均势绝对不可能长期维持稳定，因为国家权力是不可能完全量化的，而且国家的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制定和实施也不可能完全理性化。

摩根索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现象：18世纪有一个反对权力均衡的人试图证实那个时代力量评估方式的荒谬，他质问道，一个君主有三磅军事力量，四磅政治才能，五磅热枕和两磅野心；另外一个君主有十二磅军事力量，但其他要素只各有一磅，这两个君主中谁的权力更大？作者偏向于前一位君主。<sup>④</sup>摩根索在这里想说的是，国家之间的均势是很难长期维持稳定的。因为很显然地，若想维持国家之间的均势状态，就要像保持天平的平衡一样，而那是机械式的，更主要的是它的砝码是可以量化的。换言之，人们通过精确的加减天平两端重量来维持天平的平衡，但任何国家都无法肯定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对权力分配的评估都是正确的。在国家权力不可能准确评估的情况下，国家为了避免权力估算出现错误给自己带来不必要损失，就要在平时多谋取权力，以此来保障它在权力失误下依然拥有很高的安全系数。按照这种逻辑推理下去，摩根索自然会认为，均势是不可长期维持的，因为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意图的难以预测，使得只有自身的权力增长才能保障国家的安全。

如果把摩根索的均势观念归纳起来，可以得出如下两点结论：

(1) 仅仅单靠均势本身并不能给世界带来绝对和永久的和平。均势只是多极体系和某些国家既得利益的产物，而非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而产生的。所以，它没有天然的维护和平的特性。因而想利用单纯的均势来维护世界和平是不可能的。

(2) 权力是不断变化的，且对权力难以精确地量化，所以像那种机械天平式的均势不可能长久维持。

实际上，纵观这三百年多年的国际关系史，我们就会发现，摩根索的这种质疑是非常符合逻辑的。从1689年由英国领导的反对路易十四法国的大同盟战争至1914年所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战争的爆发不都是打着维护欧洲的均势而进行的吗？这到底是均势促战争，

<sup>①</sup> [美]阿诺德·沃尔弗斯：《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于铁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sup>②</sup> 维也纳均势体系是在1815年欧洲列强打败拿破仑后，为了维护欧洲和平与秩序而建立的欧洲均势体系。他的主导者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所以该体系又名梅特涅体系。

<sup>③</sup> [美]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sup>④</sup>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王缉思校），第241页。



还是战争促均势呢？均势是在欧洲特定时空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特殊产物，它对今天的国际关系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参考意义。

#### 四、摩根索的忠告

摩根索告诫我们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sup>①</sup>也就是说，国家如果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实现自己的任何政治目标，就必须通过残酷的权力斗争来实现。正如与摩根索同一时代的另一位国际关系大师尼布尔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通过军事打击还是通过经济制裁，强制就是施加痛苦，而且政治生活从来都离不开强制”。<sup>②</sup>

每一个国务家和参与国家外交政策的决策者，都应该记住摩根索的告诫，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一定要以这个国家的实力作为基础，切记不要谋取与自己国家的权力不相称的威望。摩根索指出，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不是权力之名，而是权力之实。<sup>③</sup>例如意大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初侵略地中海时高估自己的实力，再加上表现得气势汹汹，这使得意大利在推行自己的“地中海政策”<sup>④</sup>时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任何阻碍，而当它遇到统治地中海几个世纪的大英帝国时，其灾难性的失败已是不可避免。因此，那些不以实力作为外交政策基础的国家，盲目追求与自身实力不相称的权力声誉的国家，必然会因为这种愚蠢的行为遭到可怕的失败。

摩根索还告诫我们，在处理外交问题和制定外交政策时，不能以过去经验来指导今天的外交政策制定。摩根索这样论述到：处理不同的政治局势时，我们问自己，这种局势与先前的局势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什么相似之处？相似之处是否再次证明了以前制定的政策有效？或者，相似与差异的混合是否使以前政策的基本点，在政策的某些方面得到修改之后仍能得到保留？抑或差异完全取代了相似之处，并使先前的支持不适用了？如果想要理解国际政治，抓住当代事件的实质并预言和影响未来，人们必须能够完成这些问题中暗示的双重的思想任务。<sup>⑤</sup>一个国家在新的环境下，重新制定外交政策时，既要参考过去成功的外交政策，又要考虑到现在与过去的异同，进而使所制定的外交政策适合客观环境的需要。摩根索认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权力不是永久固化的，所以“当我们谈到国家权力，说此国十分强大而彼国虚弱的时候，我们总是暗含着比较”。<sup>⑥</sup>也就是说，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一定要考虑到本国和彼国之间国家权力的动态变化关系，从而制定出相应时段内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

此外，摩根索还提出，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某种外交目的时，不是只算经济得失，而是更多应该考虑政治利益的得失。例如，当美国向波兰这样的国家提供贷款或援助时，其目的主

<sup>①</sup>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王缉思校），第55页。

<sup>②</sup> 同上，第3页。

<sup>③</sup> 同上，第116页。

<sup>④</sup> 意大利的地中海政策，目标是把地中海变成意大利的内湖，这是墨索里尼的野心。他希望通过地中海政策的成功推行确立他在意大利的永久统治地位。

<sup>⑤</sup>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王缉思校），第44-45页。

<sup>⑥</sup> 同上，第192页。



要不是经济或财政利益，而是促使这样的国家从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下争得几分独立。<sup>①</sup>也就是说，摩根索认为，在使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和外交目的时，首先是要考虑的是它在政治上是否能取得预期的收益，而不是单纯考虑它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理解国际关系中经济和安全事务的关系，是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任务。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从来都不是脱离政治的，因为其经常卷入安全而被高度地政治化”。<sup>②</sup>

总结起来，摩根索告诫我们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注意如下三点：（1）国家必须以自己的实力为基础来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2）过去的经验不能成为现在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外交政策的性质只有通过检验所采取的政治行动和这些行动可预见的后果才能得到确定；（3）经济利益必须服从于政治利益和外交政策的目标，而不是相反。摩根索通过分析三百年的欧洲国际关系史总结出来的这些规律是我们应该铭记的。

## 五、总结

纵观摩根索一生的国际政治研究，他力图用权力来制衡权力、用道德和国际法来约束人性，通过这样的双重约束把国际政治的实质——权力政治纳入政治的规范轨道上来，避免权力政治中所隐含的武力和暴力成为政治权力的表象与实质，因为那将破坏政治统治的心理基础。摩根索指出，政治权力是权力行使者与权力行使对象之间的心理关系。前者是通过后者的意志对其某些行动产生支配力量。<sup>③</sup>也就是说，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更倾向于用一方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的方法来实现权力的运用，而并非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身体接触来实现。所以，摩根索的理论更倾向于心理控制而达到权力的目标，而不是通过杀戮来达到权力的目标。正如沃尔兹所言，他相信美国比大多数国家好，但他也担心美国并没有许多美国人想象的那么好。在国际政治中，失去制衡的权力构成了危险，即使失衡的是美国的权力。<sup>④</sup>如果摩根索还在世的话，相信他会非常认同，因为这代表了摩根索用他的一生研究国际政治所悟出的真谛，即权力失去了制衡，失去了理性的运用，无论到了什么国家手里，结果都是一样的。

## 后记

建树作为脑瘫患者，身残志坚，对国际关系有着极高的热情和兴趣。近年来，他通过电子邮件、网络学习等方式跟随国内名校的多位老师修习国际关系课程，广泛阅读相关论著，勤于思考，勇于练笔，乐于交流，不断进步。一直以来，他积极关注、支持《新视界》的发展，与我们保持了长期的互动。为了保留真实性，本文在编辑过程中仅对字词和格式规范等技术性问题进行了处理，最大程度尊重了作者的原意。作者也希望能够借此机会与更多的朋友一起学习、探讨。

[责任编辑：李金潼]

<sup>①</sup> 同上，第 60 页。

<sup>②</sup> 李巍：《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版，第 92 页。

<sup>③</sup>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王缉思校），第 56 页。

<sup>④</sup> [美]肯尼思·沃尔兹：《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张睿壮、刘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1 页。



## 国际法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发展\*

2015年12月13日 文/王黎\*\* 阅读/141 点赞/4

**【编者按】**国际法在一战后曾是国际关系学科的主干课程，但二战后逐渐步入被边缘化的境地。时至今日，国际法虽然也为部分欧美大学所要求，地位却仅列“枝节”。那么，国际法对国际关系学科早期发展的贡献在哪里？当前国际法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相对颓势是哪些因素造成的？我们在专业学习时又应当怎样对待国际法？本期学人访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学系的王黎教授将从学科发展的视角来为我们分析上述问题。

**《新视界》：**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的主干课程，国际法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

**王黎教授**（以下简称“王”）：国际法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在早期是非常深的，特别是在第一阶段，1919-1945年，因为当时还是欧洲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时期。而作为一个崇尚法制和民主的社会，欧洲国家重视法律的传统思维对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的发展影响至深。

为何在“一战”后，研究国际关系要从国际法和外交史开始？简单地讲，一个新学科的出现，不可能没有任何的学术背景。我们成立一个全新的学科，不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其他学科中汲取借鉴，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成立一个全球一体化、南南合作的研究所，都不可能离开政治、经济、外交、哲学、思想、历史、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从这个角度讲，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时候，比较接近的学科是什么？研究国家间关系、外交政策的制定，比较接近的学科是国际法与外交史。

所以国际关系学科最初成立的时候，学科建设主要来自两类学者，一是以诺尔·贝克、曼宁（C. A. W. 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 Lauterpacht）、奥本海（Lassa. F. L. Oppenheim）等国际法学出身的学者为代表，另一派是以齐默恩、卡尔、莫瓦特等欧洲外交史或历史学者为代表。所以最初英国几乎所有开设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科的大学，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布里斯托大学、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等，都是在这两个学科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关系系。他们主要研究为什么战争会爆发，如何维护世界和平等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如何阻止战争的爆发。但牛津大学和伦敦政经的学者认识到战争的爆发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还有经济因素，如果仅称之为国际政治系，未免视角太窄。故仅仅研究战争的原因和过程是不行的，还要研究经济。凯恩斯在此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只有战争，还有和平、贸易、人员往来、思想交流，所以“国际关系”更能概括国际政治现实。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3年第1期。

\*\* 王黎，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系教授，博士毕业于英国阿伯丁大学政治学系。主要研究领域：欧美外交与国际关系、国际法史与国际组织。



总体而言，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着眼点迥异。因此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一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所以，早期国际法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影响是尤为深刻的。

**《新视界》：更进一步说，国际法对国际关系中一些基本概念如集体安全、国际规范、国际体系等有什么影响？**

王：你们说的这些概念实际上最初都源于欧洲，而成熟于美国，但其归根结底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国际法概念的影响。很多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现实的思考促成了这一些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比如诺尔·贝克关于集体安全和裁军方面的论述。

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 Robert 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前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著作《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

诺尔·贝克属于以格劳秀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事实上，曼宁、劳特派特等许多其他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基本概念的贡献都是不可忽视的。

**《新视界》：如您所言，国际法对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的发展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为什么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国际法在整个国际关系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又下降了昵？**

王：国际关系学科在成长的早期阶段，在学科建设上借助的力量只有国际法和外交史，但是，为什么国际法的作用慢慢消退呢？我想这主要还得考虑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是美国的因素。二战之后，现实主义理论思潮在美国出现，并且成为主流，这里有一个内在的逻辑。汉斯·摩根索说，大量的犹太难民逃往美国，他们害怕美国再陷入孤立主义，他们要让美国感受到，现在美国是世界霸权，必须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所以美国需要全球主义，而非孤立主义。当时摩根索写了一本书，叫《国际政治》，也有人翻译成《国家间政治》，但我认为就是“国际政治”。当时的小标题是，“为权力而搏”。但美国出版社拒绝



出版，怎么办？他把小标题改成了“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这样才得以出版。所以，当时美国的和平主义还是很强的。二战结束后，出现了冷战，这验证了卡尔·摩根索的观点，国家之间不可能长期和谐、实现集体安全，冲突是本质存在的，是常态。从1960年代起，美国社会科学开始了行为主义革命，科学的研究方法被不断强调和凸显。

第二，国际现实也让人感觉到国际法很脆弱。国际关系学科的建立是在一战之后，那时学者与政治家对国际法是比较看重的。学者从国际法中汲取营养构建国际政治理论，政治家构建了集体安全框架以维护世界和平。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并未按照学者和政治家的设想发展，在20世纪的20-30年代，即所谓的“20年危机期间”，卡尔撰写并于二战前夕出版了非常重要的著作《二十年危机》，他在书中非常深刻地批判了理想主义。恰好在那本书出版的同时，二战爆发了。国际政治的现实再一次证明了权力和利益是国家最为考虑的因素，维护世界和平的最重要手段是均势，而不是国际法。那么二战之后怎么样呢？二战之后，我们知道国际结构很快出现了美苏两极格局，权力平衡、国家利益、国际安全完全高于任何国际法。

第三，从学科上讲，国际法本身有两个软肋，并常常被学者们攻击：国际法的母法基础在哪里？通常国内法的基础来自于宪法，而国际宪法不存在。如果没有国际宪法，这个法律依据在哪里？我们现在主要是指《联合国宪章》，但人们会觉得这很可笑。另外，谁是执行国际法的机构？假如一国违反国际法，谁派警察去执法？现在没有一个“国际司法部长”，也没有一个“国际派出所”。所以学法律的人，特别是学国内法律的人就有一种观点，即国际法不是法，因为它缺乏强制执行机制。

**《新视界》：全球化已不可逆，不少新兴的地区性大国（比如金砖五国）都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中，美国的战略有所收缩。在此情况下，国际法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能够起什么积极作用？**

王：正如之前所讲，国际法和外交史是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必需。全球化是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结构的过程，而新的国际法法规必然需要。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标准，那么全球化就绝对是个空话，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完全脱离无政府状态。那么说到全球化，新兴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问题，绝非达到修改现存国际秩序的程度。况且，金砖国家等新兴大国，互不服气和信任，很难形成像英美、北约那样的关系；而作为学术探讨，这几个国家，目前也很难取代由西方国家主导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流学术理念。这里我认同约瑟夫·奈在《权力的未来》中说的，“这几个国家各有优点，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文化教育上挑战美国”。不过，国际法还是非常重要的，新兴国家在这方面很难提出新的理念，但还是能够作为一种补充。即便国际法的核心理念来源于欧洲，并由美国扩大，但是肯定有很多观念不能代表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欧美文化的国家。另一方面，现在也有人提到，当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学者们，由于受过美欧的教育，其关于国际关系的理念与西方是一致的。



《新视界》：我们知道，您有着丰富的留学经历，您可否简单比较一下当前中国和西方在国际关系专业中国际法课程的教学？同时，您对国关专业的同学如何学习国际法有什么建议呢？

王：为什么现在欧洲仍然比较接受国际法？欧洲人认为只要你往国际社会这个方向走，或者如果我们承认我们叫国际社会的话，那么就有法（即哪里有社会，哪里就有法）。所以如果承认我们今天各国所生存的这个国际体系构成一个国际社会的话，就要有法。但是，美国人不承认或很少用社会（society）这个概念，比如奥巴马他们讲话，都用的是 community（社区），没有什么特别强制的约束，互相之间可以不理睬。为什么他们不用“社会”呢？他们知道一旦接受 society，他们就必须承认甚至遵循国际法。中国对国际法也是比较认同的。我承认中国政府很尊重国际法，中国政府绝对把国际法作为国家行为的一个准则加以强调。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学科建设还非常弱。你得深入了解所学专业。就历史系的外交史而言，你若是在美国的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学校，就有三分之一的课程在政治系，尤其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面。换句话说，你若是研究某一个领域，你就必须得用这个领域的专业语言来解读，你不能光解读史料。这是在国外，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除此之外，政治科学、外交史也很重要。我个人认为一个学生的知识结构的构建和训练是最重要的。主要表现在：首先，国际法作为国际关系学生的学科训练是坚决不能忽视，坚决不能掺假的。学生需要读大量的条约，这对理解一国的思想和理念、理解国家力量的变化、理解国际法有很大帮助。我们所涉及到的集体安全、国际社会、裁军、国际冲突等理念，有很多都离不开国际法。第二，要学习主要国家的国别史、地区史和专史，比如国际关系史、法律史、经济史、政治史等。第三，要有方法论，要有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掌握。如果说谁是学国际关系的，但是对无政府状态、现实主义、主权都无法解释，那怎么和别人交流？第四，你得给学生提供语言训练，听说读写都得会。

[整理：李家胜、李漩、宁鹏举、裴瑶、赵姝婧]

[责任编辑：陈一一]



## 拉丁美洲与全球经济政治发展\*

2015年12月19日 文/王翠文\*\* 阅读/124 点赞/1

【编者按】拉美各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舞台上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5月访问拉美三国，更是将国人的目光聚焦于这片因遥远而略显陌生的土地。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对全球经济发展又有怎样的影响？作为“金砖国家”之一的巴西是名副其实，还是空有虚名？中拉关系现状及前景如何？本期学人访谈，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副教授王翠文将就上述问题畅谈自己的观点。

**《新视界》：王老师能否就拉丁美洲的重要国家、地区组织或国家联盟做一简要介绍？**

王翠文老师（以下简称“王”）：我们首先从拉美的整体概况谈起。“拉美地区”一般用来指称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该区有33个独立国家。拉美地区物种繁多、资源富饶，尤其是油气、矿产、水利、农牧渔业等领域。但拉美自19世纪多数国家获得独立以来，一直在探索发展的出路。为何拉美国家独立较早却始终未能走出发展的困境？一种解释认为拉美陷入了“资源诅咒”。经济自由主义认为，殖民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以此获利。拉美国家利用资源形成了出口初级加工的资源型产品的发展模式。对此，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认为初级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不利于拉美国家的发展。

二战后，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真正得以深入展开。20世纪50至60年代，拉美推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多数国家基本确立其工业体系。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拉美国家的工业年均增长在8%左右，人均GDP年均增长约6.5%，拉美也成为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市场的发展、各种金融创新使得上个世纪70年代的国际资本市场极度活跃，资本充裕的外部环境鼓励了拉美国家推行借债实行“财政赤字”政策。但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因为无法偿还到期外债而普遍爆发债务危机，经济发展陷入了“失去的十年”。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推动经济复苏，特别是为了偿还外债，拉美各国不得不接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所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调整方案，拉美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最大的试验场。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可谓毁誉参半。一方面，拉美的高通货膨胀问题得以缓解，基本实现了宏观经济的整体稳定；另一方面，拉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再一次向资本倾斜，拉美国家内部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矛盾激化。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中调侃称：如果你对一个见多识广的国际银行家、金融官员或经济学家说“金融危机”，他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3年第3期。

\*\* 王翠文，女，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





肯定会回答：“拉美”。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相继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巴西货币危机和阿根廷债务危机再次让拉美国家重新反思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

**《新视界》：拉美地区如今又取得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王：近十多年，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出现重大变化，欧美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经济低迷，发展迟滞，西方世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少，影响力明显下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大国崛起，东亚和拉美成为经济增长最具潜力和活力的地区，对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其中，尤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最为世人瞩目，“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成为过去十年间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也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新的增长地区。中国经济的增长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加上国际贸易条件的稳步提升，促使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 2003 年至 2008 年间，经济迅速增长，出现了“繁荣的五年”，尽管 2009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拉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较大降幅（-1.8%），对中国的贸易也暂时放缓，但是从 2010 年开始，拉美国家又开始恢复强劲的经济增长。中国和拉美地区的经济表现得益于相互之间密切的经济贸易联系，透过这一南-南经济联系与合作，中拉双方实现了互利共赢，更重要的是，南-南贸易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

**新视界：拉美有哪些有影响力的国家和国家集团？**

王：有特性且有影响力的地区性组织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当属“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Community），简称“拉共体”，在 2011 年由拉美 33 个独立国家联合成立的、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外部国家参与和影响的地区合作组织，拉共体的成立是拉美地区合作进程中的重大事件。2011 年的“拉共体”成立大会又被称作“里约集团团结峰会”，明确宣示了“拉共体”的宗旨是“发出拉美自己的声音”。两年来，其首脑会议和高层次互动已达到十几次之多，拉美国家通过联合自强摆脱美国控制的行动取得标志性的成果。

“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简称 OAS），是西半球最早出现的地区性组织，现有成员国 35 个，包括除古巴之外的所有拉美国家以及北美的美国、加拿大。美洲国家组织前身是成立于 19 世纪末的“泛美联盟”，成立于 19 世纪末，该组织在 1948 年更名为“美洲国家组织”，这是一个近乎囊括所有拉美国家的组织，但长期沦为美国控制西半球国家的工具。进入新世纪，随着拉美的“第二次独立运动”，拉美国家在外交和内政上的自主性大大增强，美洲国家组织在处理拉美国家事务中的作用也日渐式微。

“美洲国家组织”是美国长期主导西半球事务的集中体现，而“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Cumbre Iberoamericana）则展示了拉美地区的欧洲传统与历史渊源。它最初是纪念哥伦布航行 500 周年时由西班牙倡导成立的，由十几个拉美国家和三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构成，其特点是强调拉美国家和原先的宗主国——如西班牙、葡萄牙——的联系，以及以西班牙、葡



葡萄牙为桥梁而推动的拉美与欧洲合作的进程。目前已由常设会议发展到固定的对话和合作机制。

“南方共同市场”（South American Common Market，简称“南共市”），是南美地区最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共同市场，成立于1991年，成员国有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四国。南共市在降低成员国的贸易壁垒，推动投资和地区合作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委内瑞拉于2006年成为南共市的新成员。该组织具有整合中南美洲、协调拉美事务、促进拉美国家合作的新使命。2007年南共市和“安第斯国家共同体”（Andean Community，简称“安共体”）合并为南美洲国家联盟（葡萄牙语：União Sul-Americana de Nações，西班牙语：Unión de Naciones Suramericanas，UNASUR），拟定分别于2014年和2019年前取消非敏感商品和敏感商品的关税。尽管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但在强化拉美国家政策协调和地区合作的进程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巴西是在拉美有影响力的国家，巴西的国土面积达到851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89亿，在拉美地区是总体实力最强的国家。巴西人认为，巴西始终是潜在的大国、未来的大国、明天的大国。巴西追求成为全球性大国的雄心在卢拉执政时期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从2002年到2010年，卢拉政府连续8年执政，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成就获得普遍赞誉。巴西的经济增长被认为可以与1968年到1973年的巴西经济奇迹相提并论。除了内政，卢拉政府高超的外交技巧和明智的战略也为巴西赢得了国际声望。卢拉政府依托南方共同市场成功抵制了美国主导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巴西在拉美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凸显。在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巴西是积极的协调者和南南合作的重要推动者；巴西追求“入常”，呼吁安理会改革，巴西与其他的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日趋上升。作为发展中国家中表现最好的经济体之一，巴西与印度、中国、俄罗斯一道被称为是“崛起的金砖”。

墨西哥是拉美第二大国，以玛雅等古文明著称。墨西哥的政治制度在全球独树一帜。从1929年到2000年，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71年，虽在2000年大选中落败，但于2012年东山再起，重新执政。革命制度党成为了解墨西哥政治进程的切入口。墨西哥有句谚语，“可怜的墨西哥离美国太近，离上帝太远”。美国因素是墨西哥发展最重要的外部因素。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高举“第三世界主义”的旗帜，一度是第三世界对抗美国霸权的旗手。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美加三方走向经济一体化。进入新世纪，墨西哥外交强调面向太平洋，开始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的整合进程。由墨西哥、哥伦比亚推动“拉美-太平洋联盟”于2011年成立。2012年的《经济学人》以“墨西哥的崛起”为主题推出一组专栏文章，对墨西哥的发展前景予以肯定。委内瑞拉人口不到3000万，国土面积不足100万平方公里，但近十多年来委内瑞拉却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明星。委内瑞拉是全球第五大石油出口国，到2009年石油储量为世界第二。石油是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但该国的石油资源长期为西方力量垄断控制。直到1999年，查韦斯上



台执政后，委内瑞拉才真正将石油这一经济资源转化为对抗强权的政治工具。查韦斯于 2001 年颁布了《石油法》，规定石油产业的国家获益从 16.66% 提高到 30% 以上，企业获利从 67.7% 下调到 50%，与外资合办的企业，国家控股须在 50% 以上，这宣告了“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出现。在对外政策领域，查韦斯政府高调反美，毫不留情地批判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委内瑞拉对内推行“21 世纪社会主义”，对外推动建立“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ianza Bolivariana para los Pueblos de Nuestra America—ALBA）。该组织是一个拉美左翼联盟组织，旨在强化左翼国家在拉美的执政地位，并通过“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 WSF）和“圣保罗论坛”（Sao Paulo Forum）等平台发出了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秩序的呼声。从 1999 年到 2013 年，查韦斯以其杰出的政治智慧为委内瑞拉赢得了超出其国力基础的声望与影响力。

智利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国土狭小势必影响国内市场的规模。为了克服地理条件的局限，智利的对外经济政策呈现外向型特征。从整体来说，它的对外关税率在拉美国家中是比较低的，智利政府一直支持智利企业“走出去”。智利早于其他拉美国家率先实行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又能兼顾公平和效率，改革富有成效，被联合国确立为“拉美经济发展的样板”。在拉美，只有智利与墨西哥成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智利的开放性和全球视野也体现其在面向亚太的政策上。在 1998 年，智利与新加坡推动了“东亚-拉美合作论坛”，这个论坛是在东亚和拉美的合作关系中唯一的官方合作机制。智利和新加坡、文莱、新西兰等国共同发起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构建，可以说在拉美国家面向亚太的战略调整中，智利是先行者，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 《新视界》：在新兴经济体中，巴西是徒有虚名还是真正具有影响力呢？

王：最早提出金砖概念的高盛公司在近期报告中提出，新兴市场的周期性投资机会将终结。高盛公司判定金砖国家降温，主要源于中国、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放缓。对巴西国内经济发展的预测显示，巴西经济在 2013 年的增幅只有 2%，今年 6 月份巴西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示威活动，关于巴西的发展前景出现了不同看法。巴西这块崛起的金砖是否正在褪色？或者说巴西只是徒有其表的空心砖？

目前，巴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发展速度放缓，但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新兴经济体整体崛起的大势。具体就巴西而言，在这次社会动荡中，中产阶级成为表达社会不满的主体，中产阶级对过去十年政府社会过于优惠低收入群体而相对忽视中产阶级的收入分配政策心怀不满，大规模游行示威反对的并不是政府，也不是巴西的发展模式和经济政策。在 2007 年，巴西东南沿海发现了一个大的油气田，有预测说巴西未来可以位居十大产油国之列。这对于巴西未来的发展是个重要助力。巴西崛起的物质基础是成熟的工业体系和独特的资源禀赋以及得当的发展政策。

《新视界》：近几年，拉美政权出现了“集体左转”的情况，王老师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因为它们自身实力的上升和美欧实力的下降导致了这种现象呢？



王：拉美政权的“集体左转”，根本上还是内因驱动。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让拉美国家普遍失望，拉美国家关于发展的预期落空，同时，经济出现了结构性问题，贫困率、失业率上升，拉美国家在90年代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竞争力进一步受到抑制，国内的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外部风险性增加。此后，拉美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经济道路，重新寻找发展方向，在这样背景下，左翼力量整体崛起。左翼力量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把社会公正找回来，卢拉政府在巴西推动的“零饥饿”计划，就是一个减贫计划；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也是强调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照顾低收入群体的社会需求和基本福利。拉美国家出现集体左转，事实上是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矫正和反制。

#### 《新视界》：拉美国家对美国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

王：美国因素始终是拉美发展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自19世纪20年代美国提出“门罗宣言”，向世界宣布了“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之后，防范外部势力染指美洲事务就是美国对拉美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二战后，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控制、军事干涉以及文化价值观的输出形成了等级化的秩序安排。在历史上，美国对拉美国家很少以平等之心相待。一部美拉关系史也可以说是拉美国家寻求独立于美国控制、追求自主性的历史。美国对拉美的轻视与控制导致拉美历史上多次出现大规模的反美主义思潮，拉美成为全球反美主义的策源地之一。在另一方面，作为后发国家，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创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产品市场的开拓都需要美国的支持。战后50年代到70年代，拉美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唯美国马首是瞻，被称为“有外交而没有外交政策”。这种依附性合作的外交选择在冷战结束后再度成为拉美国家外交的主流。冷战结束后，即使是像阿根廷这样素有反美传统的拉美大国都转向了追随美国。时至今日，随着国际政治体系的转型，美国实力和影响力再度衰退，拉美国家掀起了“第二次独立运动”，拉美左翼联盟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攻讦不绝于耳，拉美与美国的关系始终在冲突与合作两条主线中交替演进。

#### 《新视界》：拉美在中国外交中处于何种地位？

王：中国与拉美大多数国家的建交是在20世纪70年代，对中国外交来说拉美是起步最晚、难度最大、历时最长的地区。在新世纪之前，无论是在中国的贸易体系还是外交战略的布局中，拉美都是外围地带。对于拉美来说，中国也还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家，双方关系基础薄弱、先天不足。由于地域遥远，中拉人员、商贸往来极为有限。在2000年之后，双方关系产生了跨越式发展。在2000年前，中拉贸易额不足100亿美元，2000年达到126亿美元，2011年就突破了2000亿美元。据估算，在未来5年中，中拉贸易额能突破4000亿美元。在投资方面，2003年的中国对拉美投资仅为10.04亿美元，到2010年达到104亿美元，增幅达到10倍之多。中拉关系在10年中实现巨大突破，实现了持续性、跨越式发展。中拉之间除了贸易和投资的大发展外，在金融领域的格局变化上也极为显著。目前中国对拉美的融资规模已超过了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的融资总额，来自中国的资本和信贷成为拉美信贷的重要来源，可以说，中国成为拉美经济体系中重要的影响力量。在美欧的金融危机和债务



危机之后，在拉美地区，中国成为平衡欧美影响的重要行为体。新世纪以来，中拉关系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04年胡锦涛主席的四国之行（巴西、阿根廷、智利、古巴）形成了中拉关系的第一个高潮。2008年中国发布了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政策文件，拉美成为中国对外投资、海外投资的重要目标地区。第三个高潮是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的三国之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习主席提出“要把合作的蛋糕做大”，中拉关系处于进一步发展的机遇期。在中国的外交布局中，拉美的地位呈上升趋势。

历经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中拉关系也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期。中拉关系的发展集中在中国和几个特定国家之间，如贸易和投资往来集中在阿根廷、巴西、秘鲁、智利和墨西哥几个拉美大国中，这就出现了中拉关系在国家层次上的不平衡，这说明：中国对拉美的关系还是以资源和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关系。中国外交被西方国家和个别拉美国家描述为新殖民主义，拉美将陷入新的依附，这都是不利于中拉关系良性因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墨西哥的演讲中反复提到中国不追求贸易顺差。目前，拉美有两种政治力量，一种是希望强化与中国的关系，一种是用贸易保护主义来对抗中国的竞争优势。在下一个阶段，中国会扩展经贸往来的范围，更多和有特色的国家拓展关系，如哥斯达黎加，被西方国家称为“民主的橱窗”，政局稳定，经济基础良好。哥斯达黎加作为中国的新朋友，双边关系在这几年的发展势头非常之快，在下一个阶段，中国与它的合作会进一步深化。这样的国家还有巴拿马、哥伦比亚等，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很有前景。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的均衡发展，符合中拉双方的利益和需求。

[整理：吕海、赵姝婧、彭紫嫣、郭晓琼、宁鹏举、裴瑶]

[责任编辑：刘芮宁]

## 新千年的全球失序\*

2015年12月21日 文/兰德尔·施韦勒\*\* 阅读/151 点赞/2

**【编者按】**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当今世界发生了太多标志性变化。对于世界趋势将如何发展，自由主义学者、现实主义学者分别给出了不同的预测。本期学术讲堂，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创始人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教授根据其新著《麦克斯韦妖与金苹果——新千年的全球失序》向我们阐释了为什么他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失序的世界。

今天我想谈谈几个月之后即将出版的书。这是本关于宏理论的书，其内容非常具有理论性。谈到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我不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知道**查尔斯·格拉瑟（Charles L. Glaser）**，他的上一本书是《国际政治的理性理论》（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本书是现实主义的，关于防御和进攻理论、安全困境等等，但对于我来说，这本书的内容太过时了，不是关于21世纪的问题，不是21世纪的现实主义，这本书中说世界没有什么改变。在我看来这不够好，因为事实上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数字革命改变了每件事。我们要思考国际关系的哪些东西变得不一样了。

**当我做这个演讲的时候，我不再是一个完全的现实主义者了。**让我们继续看看权力的概念和世界发生的标志性变化。我现在来到中国和在座的各位进行交谈，这种情况在30年前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变化不可谓不大。

这本书的题目《麦克斯韦妖与金苹果——新千年的全球失序》看上去有些奇怪，不过我可以解释的是，“**妖（demon）**”在美国有些像邪恶的部分，听起来是坏的，而“**金苹果（golden apple）**”是好的部分，这两个是相反的。

我要谈论的是世界已经进入到“熵”的时代（the Age of Entropy）。“**Entropy**”是借用了来自物理学的一个概念“熵”，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中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的内容非常广泛，但它的中心概念是**失序（disorder）**，**能量不能起作用**。而我们的世界正处于失序当中，尽管这不是很美好，但是却是真实的。

**首先要说的是全球权力扩散。**第一部分我将用所有类型的标志指数（indicators）来向大家展示世界在结构层次上发生着何种改变。结构是指各个部分对彼此如何反应、实力的分配等等。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的数据，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变化。这是新的复合全球实力指数预测（图1），包括文化、教育、科学实力等等，不仅仅是军事实力。在这张图上，中国、印度在上升，美国、欧盟、日本在下降。大家可以看到世界权力在扩散当中。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3年第4期。

\*\* 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国际关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创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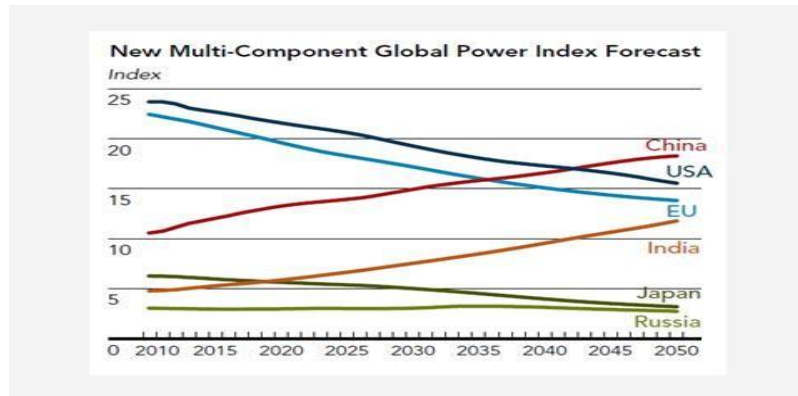


图 1

经合组织（OECD）可以看成发达国家，Non-OECD 可以看做是发展中国家。根据 CIA 数据（图 2），转折点（turning point）在 2030 年左右。再来看看人口机会窗口（demographic windows）的相关数据（图 3），我们可以看到德国、日本、俄罗斯的人口机会窗口在增长。再来看看金砖国家（BRICS，图 8），中国也是其中之一。重点在于，这个世界存在着大规模的权力转移：西方世界不再是权力的中心，而新兴国家在不断获取从西方国家中流散出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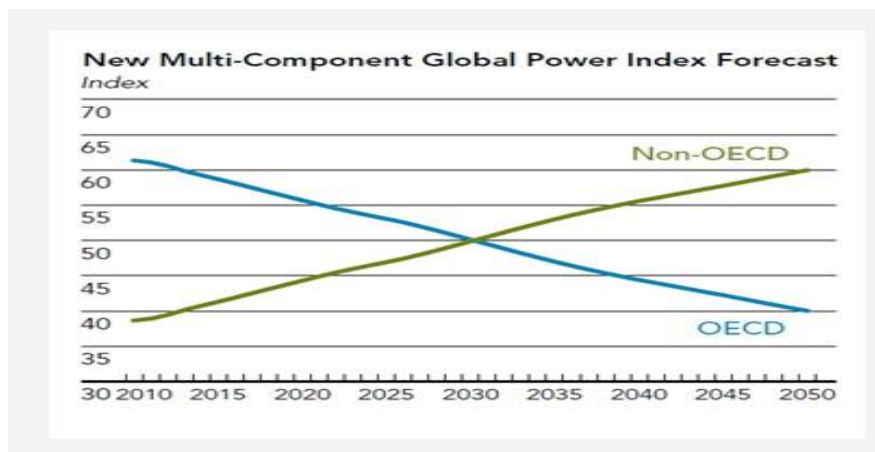


图 2

Country	Median Age, 2010	Median Age, 2030	Demographic Window of Opportunity
Brazil	29.1	37.4	2000 to 2030
India	25.1	31.2	2015 to 2050
China	32.5	42.5	1990 to 2025
Russia	37.9	43.3	1950 to 2015
Iran	27.1	39.5	2005 to 2040
Japan	44.7	51.4	1965 to 1995
Germany	44.3	48.8	before 1950 to 1990
United Kingdom	39.8	41.3	before 1950 to 1980
United States	36.9	39.1	1970 to 2015

图 3

有更多迹象表明，N-11 这些国家在接下来的 40 年里只能和 G7 相追赶（图 4、图 5），而不是与金砖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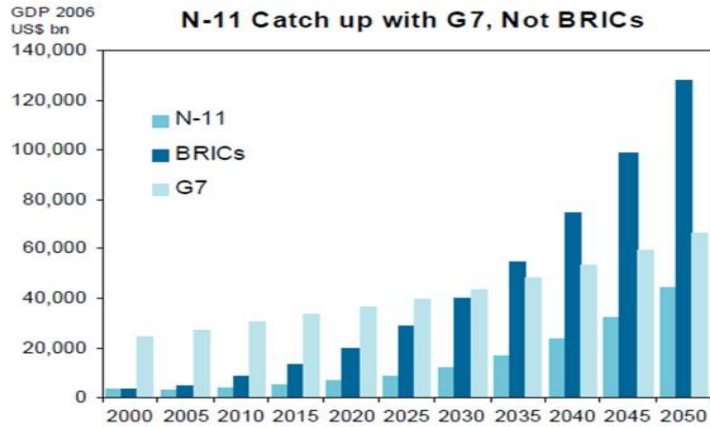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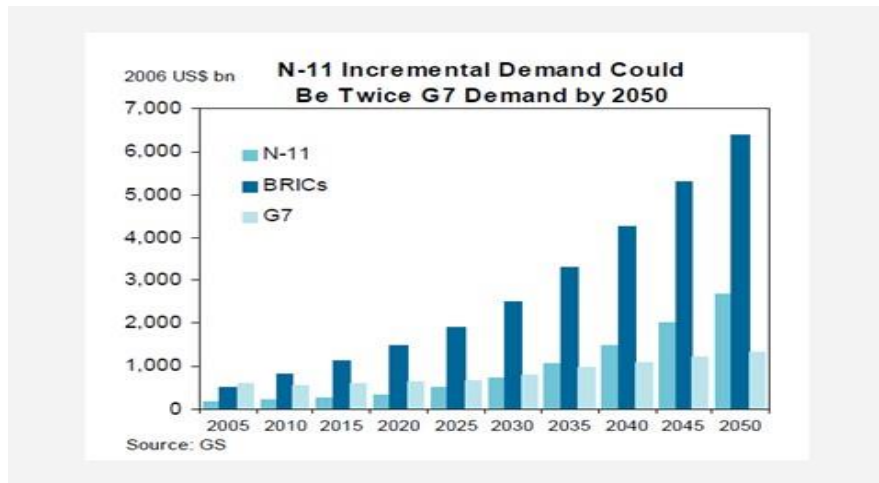


图 5

接下来，再看这一张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图 6），大家可以看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权力转移，他们在 2008 年的时候已经接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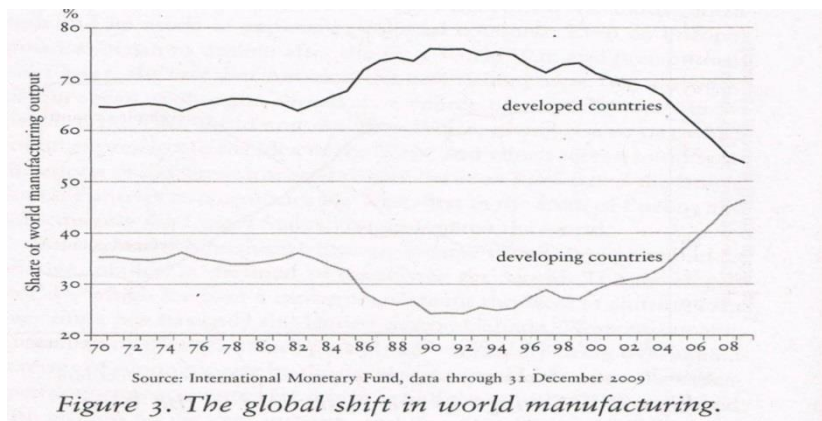


图 6



再来看一下（图7）人均GDP翻一番所花费的时间。英国用了154年，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美国用了53年，从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对于有着人数多了几百倍的中国来说，GDP翻一番用了12年；印度用了16年。中国有着多了百倍的人口，却只花了12年，而不是15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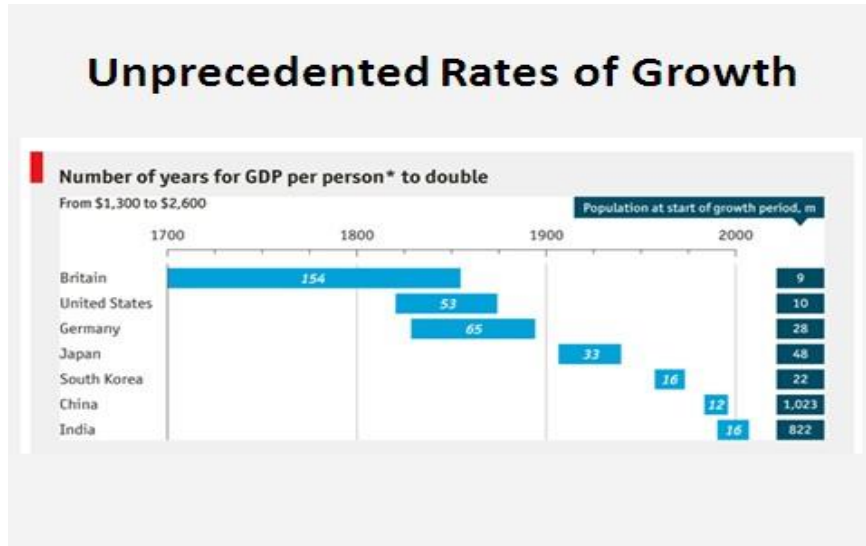


图7

关于未来增长（图8）。中国将会用8.4年来再次使得人均GDP翻番，而美国则需要用大约50年来翻番它的人均GDP。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历史上的权力转移，不是数量，而是改变的速度迅速增加，并且不会在短期内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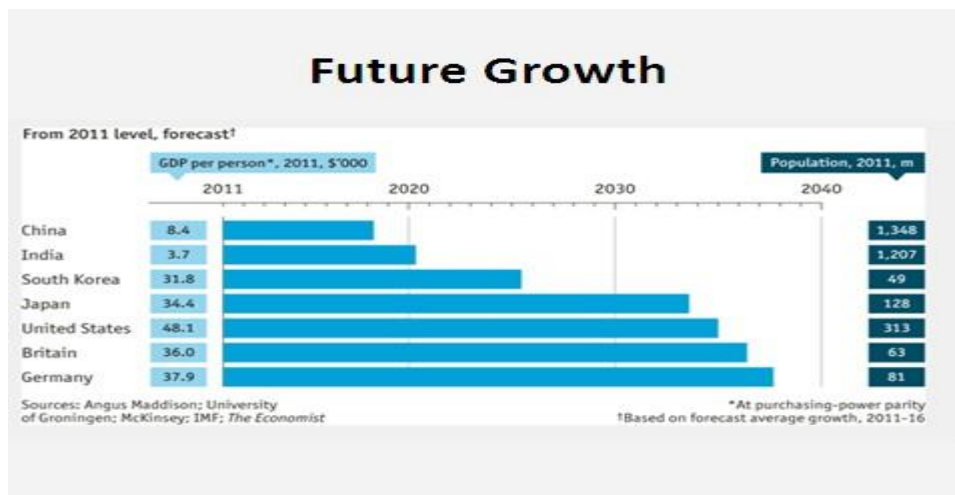


图8

下面是国家经济预估规模的柱形图（图 9），依据此图表可以推测，到 2050 年，中国可能会成为 GDP 第一的国家。美国是第二，印度第三，巴西第四，墨西哥第五，俄罗斯第六，这是非常显著的变化。

在美国大约有 34% 的人认为中国将会最终超越美国。在欧洲，非常高比例的公众认为美国会被中国取代，甚至是中国公众认为中国会超越美国的比例，都没有法国公众比例高。但是，无论如何，在美国甚至是欧洲，民众都关注中国的崛起。我现在认为西方大多数的人确信中国目前在经济领域也发挥着领导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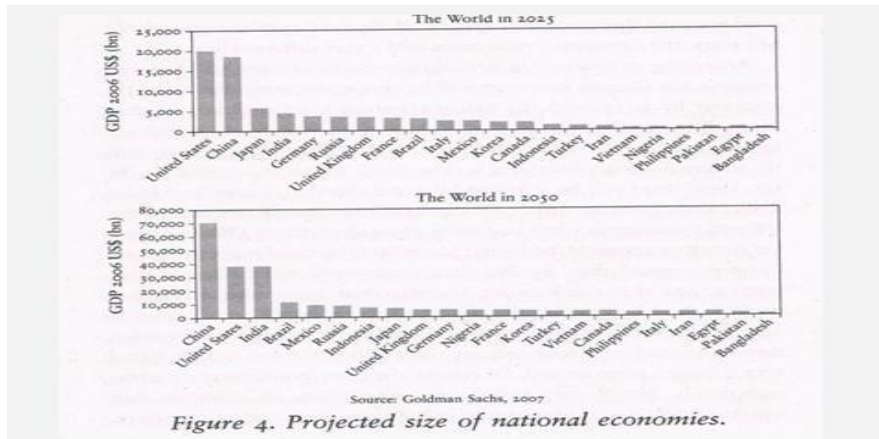


图 9

2009 年 28% 的德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领导力量，到 2011 年时大约 48% 的人赞同此观点。这些数据证明了世界人民相信这种预言是真的，它正在发生。综上，世界正经历着结构上大规模的权力转移，这个转移是权力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变化。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预测，到 2030 年，亚洲在以 GDP、人口规模、军事扩张和经济发展方面为基础的综合国力上，会超越北美和欧洲的总和。世界银行预测，到 2025 年，中国和印度的推动全球发展的动力，将会是美国和欧元区的两倍。六大新兴经济体将会推动全球一半多的发展量。国际货币体系将不再被单一的货币控制。美国很明显地将会衰落。还有更多的数据显示相似的结果。

所以世界权力结构正在经历一个巨大长久的变化。我认为，在宏理论中，过程很重要。体系是由国际结构、部分和单元组成，它同样也是由各国相互联系而成的。在非常简单的层次，我们要探求各个单元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似乎有点像动态的过程，世界的联系是怎样的。权力正在扁平化（flattening out），但它也变得更加相互联系（interconnected）。

在数字化的世界，有着超过五亿五千五百万的网站、九千多个电视频道遍布世界，数不清的在线报纸定期更新，每年有超过 100 万的新书出版，一亿六千万的博客发表，一万亿的视频在 youtube 上播放，并且有极其多的播客、mp3 和视频被下载。爆炸式存的数字信息需要好几万的数据中心用 300 亿瓦的电量，相当于三十个核电站的产能。

假设我们有一些网络把各个单元连接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出现的是国家，之后系统变得越来越多元，不只是国家，还有国际组织、跨国合作、一些国际团体等很多的行为体。



我在书上说过，由于世界网络化的变化，权力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像伤害猫一样，如果你想伤害几只猫，那非常困难；如果想伤害一群猫，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众多的行为体，他们都是相互联系的。所以现在的权力含义是相互分离的能力，权力是给别国造成伤害，与他们抗衡的能力。这非常像美国的政治，每个人都有权力，但却没有能力去做些积极的事。在这相互联系的世界有太多复杂性。太多的弱小行为体也可以猛击到你。因为你是与别国相互联系的，你将会比过去更加敏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损害他人而让他们觉得不舒适，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肆无忌惮的做事。权力是防止其他国家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下面我们讨论过程的发展。联系和行为体越多，那么相互联系就会越多，更多的行为体将会变得重要。参与的行为体越多，相互作用就会越多。两个行为体会会有一个重要的联系，三个行为体会有一到三个重要联系，如果有十个、十五个行为体，那么就会有更多重要的联系。但是事实上，你有很多的相互联系也证明了有很多重要的行为体。所以这里有一个因果关系在发生作用。

**目前的争论存在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大国冲突”模型和自由主义的“大国一致（和谐）”模型之间。**

约翰·米尔斯海默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认为未来将会与过去非常相似。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未来就像过去一样，是一个回到未来的逻辑。在他的观点看来，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会与美国发生战争，这场战争会非常像德国崛起时的样子。现在的多极局势会像以前的多极局势一样发展，国际政治将会渗透着不安全、军备竞赛、国家主义以及争夺稀缺资源的竞争上。所以，基本上，未来就像过去一样，遵照时间的周期会不断循环。

另一个部分就是关于自由的争论，理想主义者认为，时间以极快的速度一直向前，就像一支箭一样，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时间会进步。我们将会到达某个地点，就像历史的终结这个争论一样，我们都会获得自由，未来不会像过去一样，会达到自由主义霸权时代。新兴国家的发展轨道在自由主义理论下会使得世界多极化，所以我们要使新兴国家和现存的体系保持稳定。问题在于如何合作、控制其发展轨道使之处于和谐状态。例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关于建立多元的伙伴关系来应对多极化世界的设想。

**失序的时代如时间之箭。我的核心论点是，世界会变得更加没有秩序。比如你种了一棵树，你却并没有给予它足够的关注，任它自己生长。如果你不在正确的地方做正确的事情，这会使得所有的看起来都非常无序，这便是自然的时间之箭的效果。时间之箭使得事物更加无组织、无序。未来世界没有秩序，世界将会面临功能失调。**

我认为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世界不会像以前那样，不会像一战、二战时那样，战争可能不会爆发。我们很尊重中国的权力，但是我们更尊重核武器，我们试着去避免核战争而不是和中国进行战争，我们会找到应对对方的方法，和平是非常有益的。国家几乎不再为争夺领土而发动战争，没有人会因为占领别人的领土变得富有，我想最近的一次可以



把领土变为财富的是美国对墨西哥领土的占领吧。领土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你可能很需要资源，但它是有限的。

和平有很多种形式。但是现有对世界进行预测的观点是错误的。自由主义认为，未来世界是有序的，并且也能够自发处理无序的状态，因此能够保持和平状态（如冷战中的“冷和平”）。但是，他们错了，因为世界不会永远处于和平与和谐之中，并且不会有不变的秩序。秩序是什么？历史上国际社会的秩序就是霸权战争带来的秩序，胜利的一方带上皇冠，失败的一方接受统治。总体而言，在无政府的状态下，世界各国处于战争之中，只有最后得到霸权地位的国家才有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加强秩序。但是，尽管国际社会权力在不断更替，但是国家内部如政治结构、制度等都会坚韧不摧，而这就导致了一个“断裂”，或者说是实权的掌握者与对世界秩序存在话语权的威望拥有者之间的鸿沟。在这种矛盾下，世界不会是永无战争，也不会永远和平，这不是像米尔斯海默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所概括的地狱，也不是伊肯伯里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所夸大的天堂，这是实权与威望的博弈。而这，便是一种类似于混沌的无序状态。

**世界秩序处于永远变化之中，越来越多的制度被创造，但最后都鲜能发挥作用。于是，人们开始摒弃所谓的秩序，当人们不遵守秩序，就不会掌握秩序，所以容易造成秩序的缺失，而这正是我用“熵”来形容国际秩序的意义所在。**正如我在书中所言，这种“熵”一般的国际秩序是一种黏着的状态，甚至可以说是混乱状态。就国际秩序的“熵”而言，主要体现在两种形式，即过程上与结构中的熵。就一个动态的过程而言，一个封闭的国家系统是最没有全球秩序可言的。因为其中没有可产生效力的富余能量存在，即在封闭的系统之中，系统结构中的各个成分趋同，每个单元的效力都在被利用，难以同外界存在任何交流，所以难以被世界秩序所影响，反作用于国际则是一种秩序缺失。这种封闭的过程就像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述的一样，难以交流与互动。就结构而言，当结构中的单元以相同的方式扩散，那么它们之间便很难组成一个有机的综合体，因为它们之间不需要互动，而所谓的“能量”也就不会产生。然而，在国际秩序中，国际社会网络的形成与运作对国际秩序的形成至关重要。因为即便你拥有大量的信息，你也缺乏交流与互动的路径，而这必定会使所谓的国际秩序濒临崩塌。

这本书十分有意义，内容非常丰富，但是我的语言却很贫乏，很难解释。我给你的解释可能也很难理解，或许你可以尝试去读一下书。

让我们谈论一下结构问题，我认为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无序。**我认为世界的结构正在逐渐的“熵化”。**

因为在我看来，国际体系可以改变一些事情，这正是我们所谈论的。它到底做了什么？它约束行为体，这意味着国际体系可以对某些行为体施加影响，并且能够让确定的行为获得相关收益，这是约束的意义。当然，体系不能强迫你做任何事，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但是如果你做了，你可能受益，如果你不做，你可能会损失。在现在的体系中并没有这种约束能力，这正是我要指出的，为什么体系会“熵化”。

**那么现有的单极体系到底有什么用？**我能够告诉你在冷战两极格局下体系的作用，我也能够说出以前多极体系的作用，但我不能告诉你现有体系的作用，因为它纵容美国为所欲为。美国在体系中付出很少，却为所欲为，并且有很强的灵活性，但是在这种体系下，美国并不考虑其他国家的自由。在过去，欧洲被两极体系约束，它在一定程度上唯美国马首是瞻，日本同样追随着美国。那么，现在欧盟为什么要追随美国呢？如果要想成为领导者，必须有跟随者。美国是世界最有权力的国家，但是没有追随者，那就不能证明它的强大，你不能让别人做别人不想做的事。单极体系是一个显示权力的典型例子，美国相比冷战时期有了更多的能力，但是力量却比冷战时期要弱，因为它现在少了在冷战时期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威胁的这个砝码。现在的这个体系并没有对国际上的任何行为体作出约束，那这个体系的作用是什么在单极体系下你无法预测。

**下面我们会谈到影响同质化和扁平化影响（Homogeneity and a Flattening Effect）以及机能的消耗、衰弱。**

我们常常用很多事物来比喻国际层次上国家间行事的规则，在这里，我使用熵的比喻也正要说明国家间并不存在所谓的行事规则。因为从结构层面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约束国家行为的更高的行为体，所以国家间并不存在行事的规则。另外，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年代，而信息与信息之间是平等的，这也恰是在熵中所体现的一个特性。在国际信息的传输中，过程显得尤为重要：信息是怎样实现在单元间的相互交换的，单元对信息的处理是怎样被其他单元所了解的，这都是信息传输的过程所需要回答的。

**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在国际政治中，我们经常谈及的两个概念就是结构和过程。**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们主要关注过程，对于结构问题则相对很少提及。而在此，我所要做的就是尽量兼顾结构与过程这两个概念。就国际体系而言，我将其分之为宏观层面（macro level）和微观（micro level）层面两个层次。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都对应着结构与过程两个方面。比如说，在过程层面，微观层次所要解释的是个体决策是如何受到信息传输的影响的；而宏观层次所要解释的则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共同政策是如何受到信息传输的影响的。由于这些内容在书中有很详细的说明，我在此也就不做过多的解释。

**我首先将从微观层次说起，即国际信息的传输是如何影响个体决策的。**就结构层面而言，现实的实质性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无疑会导致个体对规范以及道德准则的背离。在这里，我应当提醒大家的是，这些现象都不仅仅限于国际关系之中。在日常生活中，现实的实质性使人们在都了解对方主要信息的情况下进行交流，而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则与之相反。就国际关系领域而言，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国际关系的行为体们都希望能够保证信息的确定性，这样才能做出好的决策。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每一个行为体都希望能够获取确凿的信息，而不是那种模棱两可的只言片语。只有这样，行为体所做出的决策才能够有明确的过程和对

象。但是，很多情况下，事实并不如此。正如我的导师罗伯特·杰维斯对情报机关的分析一样，美国的政策决策者们都希望能够有好的情报机关，但是他们往往不能如愿。因为情报机关所提供的很多信息与政策制定者的既定目标往往相左。比如，对于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迪克·切尼一再声称确认伊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便他们也没得到可靠的消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切尼一类的政策制定者希望攻打伊拉克，因此即使对消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最后还是对伊开战了。就此而言，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们也能在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决策了。

**就过程而言，我们需要提及的就是数字革命。**不得不说，数字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世界。在过去，我们认为心愿总是主宰着大脑，而大脑则只背着人们的行动。这似乎就是人的行为的最根本来源。但是，数字革命给我们的启示是，人们的心愿是可以被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的心愿被塑造成什么样，这与其所处的周边环境紧密相关。并且，这一种塑造的过程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这就使得信息的传输也变得复杂多样。比如，我们要将一条信息由 A 传送到 B，那么这一个传送链不会只是简单的 A 到 B，而有可能是 A 到 Z 到 G 到 C 再到 B。很明显，这是一个显得很愚蠢的过程，但它却是现实世界中信息传输的真实现象。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只有那些最为聒噪和喧闹的信息才能被大家所重视，这也是为什么国际关系中极化现象会出现的原因。在国际关系中，只有那些得到强大国家支撑的信息才能表现得“聒噪”和“喧闹”，因此，这些信息也最常被听见。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见，在国际关系中，美国总是拥有最多的话语权。

**我们当前正生活在一个事后(post-fact)的世界，很多事情只有在它被完成之后我们才得以知道，而完成它的人则是掌握了比所有人都多的信息。**因为数字革命的影响，这些信息会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人们则会因为对这些信息产生的不同的偏好而产生一些意见的联合。这些意见的联合可以根据所得到的信息来“自创”出事实，尽管这些“事实”很可能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

在宏观层次的结构层面上，我使用了“随机”一词对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行为进行描述。这是因为，在现实中，行为体的行为往往难以被预测。此外，对于全球力量(global power)而言，它正处于一个流散和失效的状态，而这正是熵的特性所在。在这一种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所带来的更多会是负能量，它们对国际体系的破坏、对抗，对现有秩序的扰乱要远远多于创造和合作。对很多人而言，国际组织也许是匡正国家行为的有效机制，但由于全球力量的流散，国际组织的作用将大大降低。当一个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利益因一些规则受挫时，它们便会加入另一些组织，甚至自己创建一个组织。这一过程就像是在购物一样，你只是在寻找适合自己尺寸和颜色的衣服罢了。就这种行为而言，我不知道中国如何，但美国确实常常如此。

我们现在常常提全球治理，但是很明显的是，我们还没有弄明白全球治理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在此中论述国家权力、国家责任，但是却没有提及全球权力、全球责任，这是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仍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中，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全球政府，而霸权也并没有在 9.11 后销声匿迹。所以，**就我而言，全球治理只是某一种程度上的全球治理，并不是真正的全球治理。**

在宏观层次的过程层面上，全球化正使得国家间在选择朋友或是敌人时一步步超越地域和边界的限制。在我的书中，有专门的一部分来论述为什么国家在选择朋友或敌人时变得更为自由。确实如此，在现实世界中，地理再也不如它曾经一般重要，他只是圈定了一个国家实施内政的范围而已。在当前，中国也正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自己的伙伴，比如欧洲的罗马尼亚、非洲的南非、南美的巴西等等。正因为如此，联盟成为了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与以往不同，当今的联盟已经不再受到地域的桎梏。我曾经读过一本很老的书，其中对政治的定义便是“政治是一门选择朋友和敌人的艺术”。而这，也是我认为的政治的真意所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资源才会得到有效的分配。在这样一种过程中，我们应当认识到，地理在政治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国际体系也应当变得更为灵活和不可控。

全球文化必将同质，我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它非常类似熵的概念，它的奇怪之处在于，你会觉得混乱会导致大量的不同，但它并没有，它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同质。

非军事战争方式的问题，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但我不在这讨论这个。我仍然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因为我仍然相信竞争，我仍然相信这个世界还不是有秩序的，我不相信全球治理，我不相信和谐，我相信稀缺的资源，我相信我们都仍要争夺、竞争地位、威望与最重要的影响力。不仅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影响力，我不关心安全，但即使我们有安全，我们还是争执不已，因为我们想要拥有影响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米尔斯海默是错误的。如果你读米尔斯海默的作品，他说他是一个进攻现实主义者，但他不是，他说他认为大家都追逐权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是安全的，除非我们已经征服了整个世界，但我不这么认为。

我的想法是，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安全，但我们仍然竞争，因为我们希冀财富。这有什么意义？对于当今世界有什么意义？国家实际上在忙于什么？国际本应使其国民富足，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它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家，国家是由其人民创造的，为人民利益服务，对不对？如果他们没让人民富有，他们就不合格；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就不能做得更好。

**为什么美国要成为一个大国？因为我们想要最大的影响力。**为什么我们不希望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不是因为我们反感日本，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会像我们一样，他们会为日本人思考，而不是美国人，他们只会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就像如果你们（中国）成为第一的大国，你们只会关注自己的利益，毫不在乎我们的利益。一个好的制度是使大家高兴，但一定会让自己更加高兴。

工业革命和核革命对于改变以往的权力方式作用巨大，事实证明一切都颠倒了，但数字革命的影响更为巨大。我们的世界变得全球化、数字化，信息无处不在。



今天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环境，通过拥有核武器来获得安全，这不错，但是这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安全。如果你需要开发、创新技术，你需要能够创建一个环境，创建机构、大学，那里的人正在学习最前沿的、新的东西。你需要的是知识和信息，并且最好善于此道，因为这将决定你的未来，而非武力和领土，故而，作为现实主义者，必须直面数字革命。但这并不是说现实主义错了。现实主义是对的，世界充斥着竞争，无非是对稀缺资源的争夺。

讨论熵的原因包括打破霸权战争的循环、去殖民化、单极世界的现实、权力的分散与多极中心以及数字革命或者全球化的挑战。作为演讲一部分，我将介绍在熵时代中一些崛起的力量。他们可以是搅局者，是支持者，是逃避责任者。

中国既被人称为逃避者，又被称为激进而强势的搅局者。我们希望中国是支持者。中国也一直认为如此，还谈论 G2 之类的话题。现实是，连中国自己也还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它时而强势，时而又逃避——有时在全球事务上确实如此。“这是你们的秩序，不是我中国的秩序，你在运行这一机制，还不停的说，‘你还没承担足够的成本’，‘你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因为这是你们的秩序啊，如果你想要我们来运行，我们可以做到。”当然，还不行，因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历史上，中国曾是一个超级大国，中国经济很快将跃升第一，你们最好认真的对待我。”同时，中国又说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虽然总量有可能成为第一，但人均不过百名开外”云云。

**但重点是，中国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崛起中的大国，他的身份也与他所传播的信息熵一致，但是不同的受众会有不同的理解。当谈论南南关系的时候，中国是一个支持者，当谈论周边关系的时候，中国是一个搅局者。现在，当谈论全球国际关系的时候，中国是一个崛起国，这个崛起国并不与我们为伍，我们有自己的发展问题。**

我现在所说的世界是很真实的，它已经不同于现实主义者眼中的世界。我不认为国家会受到外部环境的激化，反而，国家的发展主要受制于内部环境的刺激。我们过去常常谈论德意志帝国要扩张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也包括日本。但是我认为，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很多崛起国并没有声称他们要获得国际威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明白，威望是与付出相联系的。一个国家要获得足够的威望，就必须对国际社会有足够的付出。中国也是如此。英国和美国也都是如此。二战之后，美国想重塑全球秩序，而英法两国比较担心德国的再武装，英法两国也不只是在西半球发挥影响，他们也为了重塑国际秩序做出了贡献，因此可以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

这是一种博弈，你们应该对博弈都比较熟悉了，比如囚徒困境。这种博弈是非常有趣的，它反映了当前国际社会的现实，我想说的是，这种博弈模型是否具有有效性。这听起来像是笑话，但是它确实可以反映现实。在 1930 年代，最大的游戏者是美国的垄断者，几乎所有人都很穷困，但是企业垄断者可以让你参与游戏，这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冷战期间，最大的博弈是危机。在 1950 年代，美国仿佛是红色恐惧者，他担心并遏制全球任何地方的红色势力，所以冷战期间最大的博弈就是危机。在 1960 年代，很多人都在





猜想最大的博弈是什么，是在美国吗？最大的博弈是美国的爱与性的解放。在1980年代，最大的博弈便是追根究底，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成为最重要的媒介。谁可以获得信息，谁就是博弈的成功者。在冷战结束之前，信息真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那什么是冷战结束之后，直到当前最重要的游戏呢？是俄罗斯方块，这是苏联人发明的。

在电脑实验室，一种新的游戏产生了，类似日本的任天堂游戏机上的游戏。什么是麦克斯韦妖，我必须告诉你们，麦克斯韦妖是一种排序和分类。一种超人类的工具被创造出来。

世界上很多人，都在试图解释这种概念，但是英国的麦克斯韦（Maxwell）第一次解释了信息熵。你是怎么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改变一种信息熵的呢，并且使之可逆？如果你可以拥有一种能力，将一种冷分子和一种热分子共存于一体，那么信息熵将不会改变。所以在没有外部能量的前提下，这种实验是不会成功的。现在，在美国，是谁在进行这样的研究呢，是大数据。大数据将这一切变为可能。

现在，让我们重回博弈游戏。俄罗斯方块，什么是俄罗斯方块呢？俄罗斯方块的敌人并非什么恶人，而是一种不断地面对的压力，给你不断地制造障碍。我们都是麦克斯韦妖。我们知道，世界正在不断地过滤信息，这是很有趣的，换句话说，它可以反映出我们是谁。

[整理：陈一一、李家胜、马焱粮、裴瑶、赵姝婧]

[责任编辑：赵姝婧]

[校对编辑：董柞壮]

## 国际经济新环境下对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思考\*

2015年12月25日 文/赵龙跃\*\* 阅读/68 点赞/2

**【编者按】**中国参与的国际事务越来越多，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治理方面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我们参与国际治理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在当前国际经济规则推陈出新的情况下，WTO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中美之间应该如何互动以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本期学人访谈，南开大学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龙跃教授将就上述问题畅谈自己的看法。

### 一、 国际事务与国际经济规则

**《新视界》：**我们目前对于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感受最深的，首先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比起以前多了很多，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相对于美、欧、俄、日等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占有一定优势的国家，我国在参与国际治理方面，比如对WTO规则的制定和利用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您怎么看待这些不足？

**赵：**今天我们的采访也来一点创新，在回答你们的问题之前，我想请你们先考虑一下，与美、欧、日、俄等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存在什么样的美中不足，如何改进完善。

**《新视界》：**我们的感觉是，我国在参与国际经贸谈判、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方面仍然缺乏高水平的专业人员，对许多国际问题也缺乏深入的研究。您怎么看？

**赵：**我和你们有许多的同感。根据我个人的工作经历，无论是在国家部委从事国际经贸合作工作，还是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和国际会议，我们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特别是高端复合型专业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特别重视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综合性、复合型的高端专业人才仍然奇缺。参与国际事务的复合型高端人才首先要过英语关，能够运用英语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其次要掌握一定的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律和谈判的知识。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是我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的突破口。在使用人才方面我们也存在一些问题，缺乏一个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充分地发挥专业人才作用的机制，这个问题比缺乏人才还要严峻。

另一个不足是对国际问题的独立研究和见解，特别是前瞻性的、系统性的研究还比较少。如果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和把握不够准确，那么我们就很难提出一个可以得到世界认可的解决方法，也无法准确地判断有关方案对我国的影响。对于外国专家的研究成果，我们需要消化吸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4年第2期。

\*\* 赵龙跃，男，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经贸关系、经济全球化管理、WTO与国际贸易谈判、中美经贸关系。



收，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尽管我们现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但是还远远不够，直接引进的比较多、重复研究的比较多，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立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

如何弥补上述两个方面的不足，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南开大学创建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背景和初衷，针对经济全球化管理和国际发展方面面临的重大问题，组织比较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和交流活动，为我国政府和企业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全球化的管理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为我国全面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经济全球化管理培养专业人才。

**《新视界》：您对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有什么看法？是否存在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中国又可以为这些规则的改变做些什么？**

**赵：**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大多是在美欧等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形成的，首先体现的当然是这些发达国家的利益，包括世界贸易组织规则。WTO 的法律文本一部分是承袭了原来的关贸总协定，另一部分是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形成的一些新的规则。我国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成员参与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全过程，只是没有表决权，前提是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协议生效后，中国必须完全接受乌拉圭回合形成的成果。参与乌拉圭回合谈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和熟悉国际经济规则的极好机会，使我们在加入 WTO 之前，就开始对国内的有关规章制度进行调整，所以当我们加入 WTO 之后，适应的就比较快，避免了一些可能的震荡。

我国独特的经济体制，在国际社会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现行的一些国际经济规则不仅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有些规则还是专门针对中国甚至是用于限制中国的。最明显的条款是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使我国出口产品遭遇了极其不公平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补救措施的调查和关税；还有专门针对中国产品的特殊保障条款，即允许其他国家在认为进口中国产品比较多时，可以单方面采取诸如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保护他们的国内市场。

制定国际规则的时候，如果不能客观全面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那就是最大的不公平。那么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完善这些国际规则方面能够做些什么工作呢？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完善和制定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目前多哈回合谈判虽然面临重重困难，有些国家甚至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上，企图绕开 WTO，抢占新的制定国际规则的制高点。我们要加强区域贸易协定、超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系的研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多哈回合谈判，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把多哈回合的发展议程真正落到实处。

**《新视界》：多哈回合谈判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关于农产品的谈判依然没有明显的成果。有人认为这一谈判会遥遥无期，您对此怎么看？**

**赵：**多哈回合谈判从 2001 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进行了十几年，虽然步履维艰，但是我对多哈回合的成功充满了希望，因为多哈回合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提供了重要的舞台。2013 年 WTO 第九次部长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举行，中国为会议的圆满成功发挥了重



要作用，中国在 WTO 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显现出来。只要我们坚持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坚持多哈回合的发展议程，坚持更多地兼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取得多哈回合的圆满成功还是大有希望的。

**《新视界》：郎咸平曾经评论说，中国在 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中屡次败诉的原因是中国官员不熟悉 WTO 规则所致，您是如何看待他的这种观点呢？**

**赵：**不能把这个复杂的问题如此地简单化。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是 WTO 这项皇冠上的明珠，在解决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 1995 年 WTO 成立以来到 2014 年 5 月，在争端解决机制正式立案的有 479 起，涉及中国的案例有 153 起，其中我国作为起诉方的案例有 12 期，作为被诉方的案例有 31 期，作为第三方参与的案例有 110 起。决定贸易争端案例胜负的因素很多，既有规则方面的原因，也有应诉能力方面的原因。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缺乏自己的律师队伍，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观，但是与美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聘用一些来自于美国、欧盟等外国的律师专家，这就要求我们的指挥官必须具备更高的水平，去管理和发挥这些专家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听之任之这些专家的工作。总的来说，我国目前在应对反倾销和反补贴方面，情况越来越好了，我们国内的律师事务所也越来越多了，水平越来越高了。将来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地加大对 WTO 规则的研究和修改，培养和使用更多国内的法律人才，应对各种国际贸易争端。

**《新视界》：前一段时间，WTO 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稀土争端中裁定中国败诉，这一事件带给中国的启示是什么？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去减少在类似贸易争端中败诉的情况？中国又如何能在不违反 WTO 规则的前提下，实现对本国资源的保护呢？**

**赵：**今年 3 月 26 日，世界贸易组织公布了美国、欧盟、日本诉中国稀土、钨、钼相关产品出口管理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专家组报告一方面是认可中方对稀土、钨、钼采取的综合性资源与环境保护措施，另一方面认为中方对稀土等涉案产品的出口关税、出口配额以及出口配额管理和分配措施不符合有关世贸规则和中方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可见专家组报告并没有全面否定中国的政策措施。而且我们要注意，对于 WTO 争端解决机制无论是专家组报告，还是上诉机构的裁决，都不应该用胜诉或败诉去看待，只是有利或不利的裁决；而且胜诉也不一定有利，败诉也不一定不利。我国对于稀土资源尚未找到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曾几何时我们采取过出口退税政策鼓励稀土出口，甚至把稀土当粪土卖。美国日本不仅不开采利用自己的稀土资源，而且还大量进口稀土储存备用。我们为什么不能保护稀土资源，适度开发利用，而是那么粗放地毁坏我们的资源呢？实际上这是一个管理问题，保护资源、有效利用、适度调节，不一定非得采取贸易措施。

**《新视界》：在当前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如各种双边、多边的经贸协定等丛生的形势下，您认为 WTO 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

**赵：**目前确实有些人认为世贸组织的地位、作用没有从前那么重要了，美国对于世贸组织的兴趣也没有原来那么大了。我不太认同这些观点，美国对世贸组织的兴趣没有降低，只是在

世贸组织中唯我独大的局面有所变化，因为世贸组织以前是由美欧主导，但随着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中的席位越来越多，像中国、巴西、印度等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美国开始寻求绕开世贸组织，继续垄断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新途径，抢占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制高点。目前美国主导的 TPP、TIPP 和 TISA 谈判，不同于普通的双边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而是所谓的超区域协定，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寻求贸易的便利和优惠，而且更加关注规则的制定和政策的协调，给世界贸易组织带来许多新的挑战。世贸组织目前的处境为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应该研究利用好这个机会。

**《新视界》：是否存在这种可能，美欧逐渐抛弃 WTO，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 WTO 中占据有利地位还有意义吗？**

**赵：**不存在这种可能性。首先，WTO 不是美欧的 WTO，他们只是 WTO 的重要成员，并不存在美欧不要 WTO，世贸组织就不复存在的问题。其次，不论是对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成员，还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员，世贸组织的地位不仅不能下降，而且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世贸组织在贸易政策审议、贸易争端解决方面仍然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只是在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和制定方面，确实面临一些困难，但这种困难并不说明世贸组织不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说明它很重要。

##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新视界》：对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以及新时期的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赵：**对于美国是不是重返亚太，我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美国始终非常重视在亚太地区的存在，2007 年底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乔治敦大学维克托·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决胜亚洲：华盛顿没有讲出来的成功故事》。维克多曾于 2004-2007 年任小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亚洲局局长、美国朝鲜六方会谈代表团副团长。文章认为布什政府的亚洲政策，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高。应该说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目标更加显露，政策措施更具有进攻性。

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多个发展过程，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合作领域更加广泛，摩擦问题更加复杂。过去我们在处理中美经贸关系问题时对美国的抱怨比较多，今后要逐渐改变这种状况，主动采取措施，积极引领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特别是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天平开始倾向于中国，现在这种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今后我们在研究解决中美经贸关系问题时，必须要关注这些变化，从而研究制定相应的行动方案，从根本上改变原来被动应对的做法，致力于积极引领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首先是客观全面地总结中美经贸合作对两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影响，用事实向美国和世界展示中美经贸合作给美国、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带来的好处。其次要进一步深化对美国政治



制度、对外经济政策、以及社会国情的研究，准确地把握美国国会、政府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面对问题，对症下药，避免误导。第三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既不能过分夸大美国的力量，也不能低估美国的实力，坚持平等对话、互惠互利的原则，在中美经贸合作方面争取更大主动。第四，利用多边渠道，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改革完善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消除不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的内容，减少或避免中美之间的正面冲突。第五，进一步加快培养和充分发挥我国有关专业人才的作用，研究制定一个长期的、整体的、系统的和一致的对美行动方案和指导原则，并贯穿于国家有关部门的日常国际事务中。长期以来，我国对中美经贸关系重要性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缺乏一个统领全局的行动方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快培养并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作用，研究制定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长远战略与策略，更加科学地处理有关贸易摩擦问题，不断提高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鉴于以上情况，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在《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复合人才高级研修项目》的课程设置中，专门有一个《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单元，重点分析介绍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管理体制和执行机构，美国主要的贸易保护措施和法律依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贸易统计数据库的使用，以及中美经贸关系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

**《新视界》：目前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有哪些重点和热点问题呢？如何化解或解决这些热点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赵：**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着有本质和现象两类的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本质问题我就不展开讲了，在存在的现象问题中，美方主要关注的有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中方关注的主要是美国的出口管制问题、对华在美投资的安全审议问题等。

所谓的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就是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问题，实际上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存在贸易逆差才能成为真正的贸易大国，只有美国才能长期存在贸易逆差，发展中国家都是贸易顺差国家，否则就会面临外汇短缺、资不抵债、经济崩溃。况且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原因很特殊，既有双方统计口径不一致的因素，也有全球供应链的时代因素，双边贸易平衡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过去我们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够，所以在应对美国的抱怨时没能给出最有力的反驳，甚至还可能引起其他具有相关产业竞争的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实际上，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并不完全是中国制造的产品，许多是在中国组装的产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出口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出口。

人民币汇率问题更加复杂，美国方面的专家也坦言，谁也不知道人民币兑美元的公平合理的汇率究竟是多少。在过去好长一段时间里，人民币汇率低估给美国低通胀高增长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自2005年中国央行汇率重启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幅逾27%。人民币升值对于美国经济既有利也有弊，升值有利于提高美国产品出口竞争力，促进出口，带动



经济复苏，有弊是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美国压人民币升值的真正意图不只是在短期内的升值，最终目标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机制。

如果我们能够全面把握这些问题的实质，那么我们就找到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的有效措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在处理中美经贸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所以无论是双边会谈，还是在多边场合，都要研究一个统一的对外口径，一致对外，避免在不同的场合出现不同的声音，影响我国的大国形象。

### 三、 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新视界》：**前面您介绍了在南开大学创建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初衷，非常重要，现在四年已经过去了，中心工作进展如何，取得了哪些主要的成就？

**赵：**前面我已经介绍了一些，我们中心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我国全面有效地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与经济全球化管理的需要，组织一些系统的比较研究工作和学术交流活动，为我国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组织一些专题研修项目，为我国全面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全球化管理培养专业人才。四年来中心的工作得到了校内外、国内外专家领导的重视、支持和合作，所以也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课题研究方面，我们中心前后承接了天津市委研究室、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外国专家局、财政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OECD 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 10 多项研究课题；通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研究室、商务部和新华社等渠道，为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提供决策参考报 20 多篇，其中有 3 篇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公开发表的论文有 20 多篇，影响比较大的有：《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建议》，《从制定国际规则的角度分析 RCEP 面临的挑战》、《美国战略东移的经济方略：内涵与应对策略》，《如何看待美国的衰退，中长期中美经贸关系展望》，《积极引领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关注美国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新动向》和《多哈回合的前景与我国的应对措施》等 10 多篇。

在开设课程方面，中心围绕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培养专业人才的需要，借鉴美国大学有关专业的培养方案，研究开设了 5 门全新的课程：《国际管理与中国》、《国际经济谈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国际经贸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政策分析模型与方法（WITS）》。

在国际合作方面，第一，世界银行已经正式将我中心作为《国际贸易政策分析模型（WITS）》在亚太地区的培训基地，重点工作是为我国及其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学术机构提供 WITS 的培训。这项工作进展顺利，最近一期培训班将在今年 7 月份举办。

第二，中心与马里兰大学合作，建立了《南开大学-马里兰大学国际谈判模拟中心》，将作为我国开展国际谈判教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与马里兰大学合作联合举办《国际谈判与国际经贸谈判》专题研修班，研究开发更多的模拟国际谈判案例，以及培养国际谈判/国际经贸谈判专业硕士研究生。



第三，中心与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合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高级官员提供各种专业培训：2013年为朝鲜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举办了“贸易促进与外资利用”研修班，朝鲜选派了12位高级官员参加；2014年将为朝鲜高级人民法院举办“贸易投资争端与经贸仲裁”培训班，朝方将选派15位高级法官参加。

在高端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中心与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合作，联合启动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复合人才高级研修项目”，已经举办了三期专题培训班。今年即将启动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高级复合专业人才需求研究和培训项目”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

**《新视界》：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联合发起的《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复合人才高级研修项目》与一般的培训项目有什么不同？**

**赵：**“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复合人才高级研修项目”主要是根据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需要，为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培养熟悉国际政治、外交、经济和法律的综合性、复合性高端人才；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与管理，培养输送高级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培养的重点是熟悉国际管理知识、把握国际发展趋势、强化战略布局能力、树立全球领导意识四个方面：

一是要熟悉国际管理知识，了解国际管理的理论与学派、国际管理体制的探索与历史演变、国际管理中的大国关系、国家、地区组织与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国际管理中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等。

二是要把握国际发展的趋势，不仅要了解其过去，而且要展望未来。如果我们仅仅了解过去，而不能把握未来，那么我们只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如果中国真正想要引领国际事务，那我们必须要有自己超前的研究和展望。仅仅学习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够了，必须要有自己得独立思考和判断。

三是要强化战略布局能力。只有在全面了解过去、准确展望未来的基础上，才能具备较高的战略布局能力，否则面临突发情况，就只能是穷于应付和应对了。应对往往被动，我们需要学会引领，凡事预则立，研究发展趋势，提前谋划布局，才能应对游刃有余。

四是树立全球领导意识。对内讲是全球领导意识，对外讲是树立全球责任意识，因为领导就意味着责任。我们现在一定要有全球领导意识，在分析和处理任何问题时，一定要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反映，只有充分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才能有效地保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树立全球领导意识和全球责任意识，这是一个国际战略问题。维护自己的利益，也需要考虑一个国际的说法，不然很难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毛主席总是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就在全世界树立起一面旗帜，得到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支持，因为中国关注的是全人类的利益。今天也一样，在研究解决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时，想办法把它提高到关系国际安全的高度，那么就更容易得到更多国家的关注与支持。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复合人才高级研修项目”的另一个特点是“缺什么补什么”。高级研修班课程采取专题模块形式，分为若干个单元，每个单元相对独立、滚动开发、全年开放，





学员可以根据自己工作的需要和安排参与相关单元的研修。课程设置涵盖了全球经济治理所涉及的政治、外交、经贸和法律等多个学科领域，以及当今国际管理机制发展演变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于已经熟悉国际经济知识的学员，他们就可以选择培训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律方面的课程；对于具有国际关系知识背景的学员，就可以选择培训国际经济方面的课程。这样他们的接受培训的知识就不会重复，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来选择，因为我们培训的对象比较广泛，不仅有政府官员，还包括高年级优秀本科生、研究生，这就保证我们培训的效率，也突出了我们这个培训不同于别的培训。

我们举办研修班的另一个目的是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一方面我们将从参加研修班的学员中选拔部分优秀学员选送到国外进一步深造，可以是短期的研修学习，也可以是进一步攻读更高的学位。另一方面是发现选拔部分人才推荐到国际组织，参与国际组织的竞聘、工作和任职，这也是一种很有效的学习锻炼。

第三我们发现和选拔部分人才参与中心的研究工作，形成一支全新的研究队伍和研究网络。我们现在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重复研究比较多、合作交流比较少；直接引进的比较多、独立分析比较少，今后需要在前瞻性、综合性和独立研究方面下更大的功夫。我们非常欢迎有关方面的青年学者参与中心的研修和研究工作，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管理的能力和水平献计献策。

#### 四、 赵老师寄语

**《新视界》：又到毕业季，有一批南开国关学子将要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或者继续深造，还有一批未来的国关人将走进南开园，您对他们有什么寄语呢？**

**赵：**非常高兴有机会在此给同学们说几句话，首先是祝贺你们又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毕业走出校门，还是入学进入校门，都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希望大家倍加珍惜，取得优异成绩。其次是祝贺你们恰逢其时，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和法律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期，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需要大量深谙国际事务的复合人才，为你们提供了大量的用武之地。当然，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同学，希望你们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多读书、多实践，把自己塑造成综合性、复合型的高端人才。英语是基础，一定要学好，不仅要掌握地道的会话英语，更重要的是能够运用英语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除了学好国际政治外交理论之外，还要学好国际经济学，中国外交部 2012 年专门组建国际经济司，足见国际经济在当今国际政治外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另外，还要学好国际法和国际经济法，参与国际事务需要在国际规则的框架下去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于毕业班的同学们，也许目前你们所找到的工作与你们所学习的专业表面上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但是你们所学到的知识仍然是很重要的，希望你们继续努力，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自己，全面掌握上述有关的知识和技能，必将大有作为。

**《新视界》：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能接受我们的采访，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学习，最后请您为我们的刊物提一些建议。**



**赵：**《新视界》办的非常好，我很喜欢，每期必读。《新视界》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新颖，每期都有一些比较超前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些成就都是编辑部同学们自发努力创新的结果，刊物给读者和编辑的同学们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刊物发行以来，得到了全国各地兄弟院校学生和老师们喜欢，很简单。编辑部还形成了一个承前启后、有序竞争、平稳过渡的领导机制，这也是同学们学习创新所取得的成就。希望你们继续发挥这些优良的学习风气、踏实的工作作风，把《新视界》办得更好！

[整理：李家胜、李天翼、刘志、宁鹏举、裴瑶、赵姝婧]

[责任编辑：赵姝婧]

[校对编辑：董柞壮]

# 霸权的印象管理\*

## ——地位信号与美国大战略辩论

2015年12月31日 文/蒲晓宇\*\* 阅读/29 点赞/0

**【编者按】**美国公众和学术精英对美国近年来外交政策调整的态度不一应如何解读？印象管理和地位信号的含义是什么？这些概念如何运用到国际政治的分析之中？围绕着本国的大战略，美国又是如何管理其霸权印象的？本期学术讲堂，美国内华达大学助理教授蒲晓宇博士将就上述问题阐述他的独到见解。

今天我谈的主题是：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与美国大战略辩论。关于霸权的印象管理，最近我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了一篇中文文章，对这个话题本身我也做了一个长期的研究和探讨。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观察体会，供大家参考。我准备讨论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介绍一下美国公众和学术精英如何讨论美国最近的这种外交政策上的调整或困境；第二，讨论美国霸权不同的理论视角是什么；第三，讨论两个概念——印象管理和地位信号，以及这些概念如何运用到国际政治分析之中；并以“亚太再平衡”为例，讨论美国如何管理其霸权印象，最后做几点小结。

### 一、美国公众和学术精英对美外交政策调整的态度

最近美国外交基本一团糟，这里有美国的一些民意调查，包括对奥巴马总统处理外交事务的看法，对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巴以冲突等等的满意度，基本都是百分之五十以下。美国外交政策这么多麻烦，对奥巴马总统这么多批评，这种批评算是一种客观的批评吗？换个总统会做得更好吗？或者怎么解释美国外交的困境？

#### 1. 民意调查

我们看一下美国最近的民意调查，关于美国大战略的核心问题——美国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继续扮演一个有领导力的角色，还是实行战略收缩？芝加哥外交委员会每年做一个关于美国的国际地位、国际角色的民意调查，美国是应该继续承担积极的角色，还是置身事外（stay out）？从1947年到2014年，认为美国要置身事外的数据一直比较低，但是最近算比较高。到2014年，有41%的美国民众说“我们干脆置身事外吧”，但是认为美国应扮演积极角色的一直还是高于50%，最低点也是58%。这就说明，至少从美国民意看来，美国对继续在国际舞台上担任非常积极的领导角色有一种疲倦的感觉，但也不一定理解为美国要实施孤立主义。从民意反应来说，对美国自身的国际领导角色有一些调整。但是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5年第1期。

\*\* 蒲晓宇，男，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学士、硕士，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普林斯顿-哈佛中国与世界研究项目博士后，现为美国内华达大学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中国政治与外交、新兴国家、国际关系。

总体来说，美国主流的民意对于美国是不是要在国际上担任强有力地领导者，支持的还是占大多数，这是基本稳定的。

那么美国在世界的领导角色，从美国自己的民意调查来看，有什么变化呢？具体来讲，是更重要了、更不重要了还是差不多呢？数据表明越来越少的人认为美国角色越来越重要，只有 21% 的人认为美国角色在上升，大部分的人认为美国角色在下降——48%。

还有一个调查是关于美国是否受到世界舆论的尊重，参与者是美国民众。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没有受到尊重。这里要区分一下，“国际地位”与“受尊重”还是有区别的，有权力有地位未必等于有尊重。从这里看来美国民意对美国外交上至少有一些反思。

## 2. 学术精英

我们来看美国的精英，也就是在学术上重要的战略家，他们怎么看美国的角色和地位。一个重要的辩论题目是，是否要实施战略收缩和战略克制。波森（Barry Posen）是 MIT 的著名教授，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写了一本书叫《Restraint》，该书认为美国大战略要实施一种自我限制。有代表性的人物——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波森（Barry Posen）、沃尔特（Stephen Walt）这些资深学者，大部分有现实主义理论色彩的，他们认为美国要实施战略收缩和战略克制。说到这里，我感觉我们国关界对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有时候理解不够准确。虽然他的理论翻译成“进攻性现实主义”没有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理论主张国家大战略设计总要谋求进攻和扩张。实际上，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要维持其唯一的区域霸主的地位，但他反对美国过多介入到全球事务当中，反对美国用武力去干涉一些人道主义危机等。所以米尔斯海默对于美国实施全球性的霸权战略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批评。总之，这一批现实主义学者认为美国要实施战略收缩和战略克制。

还有一批学者在讨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时的观点更极端一些。他们认为整个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正在终结，因此美国不仅需要在战略上，而且需要在策略上实施收缩和调整。这些学者包括：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斯维勒教授（Randall Schweller），美利坚大学教授、现任国际研究协会的主席阿查亚（Amitav Acharya）等。

另一派认为美国不必实施战略收缩，而应实施战略微调。他们针对前一段时间美国兴起的实施战略收缩提出了批评和反对，认为美国主导下的单极秩序还是基本稳定的，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要继续担任一种领导角色。还有一些学者，比如卡根（Robert Kagan），他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没有终结，美国实行全球领导战略对美国是有利的。这一派的观点仍然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一派在学术界的代表人物还包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和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等。

以上关于美国大战略辩论的核心是：美国的霸权地位或领导地位（leadership）是否可持续，美国维持霸权体系的成本和收益又是什么。成本包括安全和政治上的风险，比如说从经典现实主义理论来推演，从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推演，均势（balance of power）是稳定的，那么维护一个霸权体系，总会有其他大国潜在制衡的一种风险。成本

还包括经济负担，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等是否值得？收益就是有利于维持一种国际秩序。美国既是维持这一秩序的世界警察，又是这一秩序的获益者。美国维持军事的主导地位是否有一种经济上的收益，这个问题还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 二、霸权研究的不同理论视角

回过头来，如何从理论视角看霸权本身。在中文里面，霸权通常指实际控制别国的行为模式，常常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在政治上有一种贬义。但在英文文献中，霸权是一个相对中立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国家所处的超群的优势地位和能力。我们分析霸权的行为模式，把它作为一个学术分析的概念，不管它政治上是贬义还是中立，主要是分析它的行为模式是什么，有哪些行为规律。

霸权的兴衰是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关于美国霸权有哪些理论视角？

第一个就是实力基础，如果我们研究霸权兴衰来关注实力的此消彼长，会发现任何一个霸权体系与他的硬实力是紧密相关的。

第二是霸权的维持机制。任何一个霸权体系不是只有硬实力的。用军事的手段、国际机制的手段，还是意识形态等其他办法来维持其霸权。

第三个就是抗争行为与霸权的相对衰落。我们观察国际体系演变的历史，会发现霸权的兴衰不可避免；而且另一方面，有霸权就有反霸，有主导就有反主导的行为，所以研究霸权也要研究那些抗争行为。

## 三、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运用

### 1. 印象管理

我提出的分析视角叫印象管理。霸权的印象管理是研究美国霸权的一个新的视角，具体运用到美国外交政策中，即在国际秩序的变动中，美国如何管理其在国内外观众中的印象。霸权的印象管理，与它的物质实力，与如何维持霸权，都有密切的关系。霸权的印象管理这一视角不是对现有理论视角的超越或替代，而是一种补充。

下面我们看印象管理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印象管理来源于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人生如舞台，人人都是演员”。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把这个概念发展成为一种微观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拟剧论（Dramaturgical Theory）。他用莎士比亚的一个比喻来探讨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管理自己的印象。杰维斯（Robert Jervis）把戈夫曼在社会心理学中的理论引入国际政治中，他的博士论文是《国际政治中的印象逻辑》，讨论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怎样塑造和管理自己的形象。这是印象管理理论的来源。

从一般的界定来说，印象管理作为社会互动的一种现象，它是人们试图管理和控制他人对自己所形成的印象的过程。在英文文献中，印象管理对应两个英文单词——impression management 和 image management、Impression 是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常用的，而一般商业文献研究如何树立品牌用 image。因为心理学探讨的是个人层面，讨论集体和公司的形象

就用 image。我自己的研究和学习虽然借鉴了社会心理学 impression management 的一些概念，但我还是翻译成 image management。因为我探讨的是国家，这就像一个公司在管理自己的印象和品牌，跟个人有些区别。

## 2. 地位信号

我把印象管理和另一个概念联系起来——所谓的“地位信号”，信号就是传达有关特定形象的一个信息。给大家举一些例子说明什么叫印象管理。一个是“炫耀性消费”。古典经济学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学者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他讲美国早期的有闲阶层会买一些奢侈品，不是图实用，而是为了彰显社会地位。这种炫耀性消费就是一种地位信号。

还有一种现象，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印度调研时发现一种现象。印度农民穷得叮当响，但他们把女儿嫁进比较富裕阶层的家庭。他们借钱不是用来发展生产或创造更多的家庭财富，而是用于举办豪华婚礼。这也是为了彰显社会地位。

有的学者做类比，认为很多东亚的国家如韩国、中国办奥运会也有些“嫁女儿”的意思，有彰显地位的意识在里面。另一种炫耀性消费，不完全只是象征意义。好比一个年轻的律师买一辆好车，其实是促进一种有实力的印象，这也是一个地位信号。一个新兴国家造航母既有象征意义也有实际意义，目的之一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大国形象。

还有一种地位信号不是体现在消费上。陈光标的风格就是高调捐款。在美国，做慈善事业是很普遍的。美国的富翁捐款可能上千万、上亿就写个支票，有人捐几百万名字都不留，但陈光标就要高调。有个词叫 Conspicuous Giving——炫耀性给予，非常高调地赠予也是在彰显地位。以上的例子都是为了传递一种地位信号。

## 3. 在国际政治中的运用

我把这些概念引入到国际政治的研究当中。国家怎样彰显自己的地位就是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信号，也就是一个国家试图塑造或改变自我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并将这种信息刻意地传递给国际和国内观众。

我简要地说一下，彰显地位有哪些策略？一是发动战争。最近勒博（Richard Lebow）的研究表明，历史上很多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是为了争夺地位和威望，不是争夺实际的领土。当然他的书争议非常大，但至少是一家之言。二是摆架势（posturing）。第三是策略性宣誓（spinning）中文讲好比“忽悠”。不是撒谎，而是强调一方面，不强调一方面，这是一种宣传策略。炫耀性消费和炫耀性赠予我已经讲了，此外，还有一种“构建和加入俱乐部”。地位本身有可能是一种俱乐部式的产品，加入一个有权力或有荣誉的小圈子，那么这个小圈子就是一种地位的象征。

美国是一个霸权国，中国是一个新兴崛起大国。霸权国与新兴国家在展示自己地位的过程中是不完全一样的。我稍微归纳一下，美国作为霸权国，对自己的印象管理特别是对地位的管理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有什么区别呢？霸权国在印象管理中主要展示的是对现有地位的护持，不是争夺一个新的地位。我最近写的一些文章，我主张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



叫 status seeking, 就是争取一个什么地位。我觉得这个大体更适用于崛起国家。但是对于霸权国, 他不是争取一个什么地位, 他是发出关于自我定位的信号 (status signal), 是一种霸权护持, 是一种地位护持, 而不是争夺一个新的地位。但就中美关系而言, 由于不够自信的美国对于维持地位的强烈偏好, 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定的新风险, 或者说更大的风险, 一会儿会讲到。

第二, 霸权国发出的地位信号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这个与中国或其他新兴大国不一样。新兴大国可能有两面性的地位信号。一种是示强, 展示你强硬、强大的一面; 另外一种是示弱, 展示我很弱, 我还是发展中国家。霸权国展示的地位是一致的。

第三, 霸权国的印象管理面临多重观众的困境。有国内观众、有国际观众, 国际观众又有不同类型的国际观众。还有一点我想强调, 霸权国做印象管理, 既有以基本事实为依据, 也有做面子功夫的操作空间, 也就是说你展示你的地位与你的硬实力不能偏差太远, 也不可能偏差太远。换作美国来说, 他的大战略、有关国际地位的讨论往往跟他硬实力的变动有很大的关系。

#### 4. 以“亚太再平衡”为例分析美国的霸权印象管理

我主张从地位信号的角度来思考“亚太再平衡”战略。当然, 我知道在美国也好, 在中国也好, 对“亚太再平衡”的争议非常大, 包括它的动机是什么, 它的效果是什么, 是不是需要调整。我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 只是提出一个分析的角度。

我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看成是一种认知之争, 即中国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就主导权的认知展开某种观念和认知的竞争。那么奥巴马政府实际上要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 在资源有限和战略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 如何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 “亚太再平衡”战略大的背景实际上是这么一种情况。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 美国自己对自己的国际地位也不确定, 做这些事实实际上是对自己地位的一种巩固和维护。如果我们观察到一些最新的进展, 它实际上有两个版本。希拉里 (Hillary Clinton) 当国务卿的时候她是最早推动提出这个概念, 当然背后实际上是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 (Kurt Campbell) 实际操作刀在做。但是希拉里时代强调的是在外交和军事上巩固美国在亚太的存在, 调子比较强硬。这在中国国内的解读非常负面, 认为美国是不是要重新制衡中国, 要遏制中国等等。但是最近, 在习奥北京会面之前, 克里国务卿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发表的中美关系的演讲, 谈到他对“亚太再平衡”的解读, 就比较和缓。他强调的是中美就全球利益的合作, 在亚太地区加强合作, 而且强调加强经贸之间的合作。

我们大体可以说有两个版本的“亚太再平衡”, 这跟其他霸权的印象管理一样, 面临的其中一个难题是“多重观众”——发出这样一个信号, 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解读。就“亚太再平衡”而言有几类观众: 中国、美国的亚太盟友, 以及美国的国内观众。我们也可以认为欧洲盟友也是, 但最主要的是这三类观众。



从信号传导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第一个动因是中国呢？在美国的一些决策精英看来，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的官方、媒体、智库以及一些学者过高估计中国的上升速度和美国的衰落速度，美国对自我定位的焦虑感上升，所以美国需要做一些事情进行回应。这是美方的一种解读。比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2009年在 *Washington Quarterly* 上撰文指出，中国过高估计自身上升的速度，也过高估计美国的衰落速度，这给中美关系带来一定的不稳定，这是他的一家之言。今年春天我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讨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时候，听到奈进一步提出这个观点，并且强调这是美方当时一个重要的焦虑和关注点。这是为什么中国作为信号观众的重要原因。

第二类是美国的亚太盟友。在小布什时代，美国的一些东亚盟友就担心美忽视其在东亚的存在，对美国的东亚联盟体系有一种焦虑感。随着中国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它们的焦虑感增加，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因。

第三个动因是国内观众，就是美国的党派政治。这是我访谈美国的一些学者智库的观点。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教授是小布什时期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提到“亚太再平衡”做的很多事情在小布什时期其实已经做了，而奥巴马则有过度“兜售”这个战略的嫌疑，实际上就是党派政治的竞争。奥巴马政府的言下之意是“你们共和党政府搞不定东亚事务，而民主党则可以搞定”。从这里可以看出，不同的观众它的期待有时候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矛盾的。美国加强对盟友的安抚，有时候又增加了中国的焦虑——美国是不是想要制衡中国？另一个核心难题我称之为“地位困境”（*status dilemma*）。我们常讲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安全困境的意思是一方寻求保障本国安全的努力导致对方也这样做，最终双方的安全反而都下降了。地位困境的前提是一国的基本安全是有所保障的。也就是说大部分人看来，虽然中美之间有着众多的利益冲突，但是它们并不威胁彼此的本土安全。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它们对彼此的安全并不构成直接重大的威胁。当然，台湾问题美国一直介入其中，这是值得探讨的，但是总体上这一观点仍然成立。我们可以说安全困境并不是中美之间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地位问题。地位困境的意思是一方试图维持其相对位置的行为导致另一方产生某种反应，双方都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地位竞争，而双方的地位排序并未得以改变。这同安全困境有很大的相似性，即花费了很多的资源 and 代价，但是它们之间的地位排序并未得到改变。近年来，地位竞争变得更加重要，甚至有的时候更为激烈。

## 5.小结

现在我小结几句。一是，从印象管理的角度来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超越物质实力和心理认知分析法的视角，比较全面地分析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和调整。现实主义关注物质实力，建构主义关注纯心理学。从我的角度说，印象管理既与物质实力紧密相关，同时也与社会心理因素紧密相关，把这两种视角综合起来考虑国际秩序的变迁，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第二个小结是，霸权国对于维护既有的国际地位有强烈的偏好。我们讨论中美关系时通常认为，一个过度自信、狂妄自大的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并不好。例如小布什政府的前期，说中国是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中国关系当时压力特别大。

“9.11”之后改变了，如果没有“9.11”，中美关系可能会更糟糕，至少在小布什执政前期是这样的。另一方面，从“亚太再平衡”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另一个极端也可能导致中美关系（有问题），一个过度不自信的美国对自己的地位拿不准，有时候也会导致反应过度的动作出来。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一个是从社会心理学的前景理论。通常而言，你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去防止损失而不是争夺更多的可能的收益。美国是既有的霸权，对其现有的地位有极大的守成偏好，不惜冒险付出很大代价。还有一个是单极体系本身，大家熟悉沃尔兹的权力制衡理论认为，在两极和多级格局下，国与国之间的制衡行为不是一个多么大的冲击。在两极体系下进行制衡或在多极体系下进行平衡，不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国太大的恐慌。而在一个单极体系下，一个新兴国家如果采取某些制衡行为的话，往往会引起现有霸权也就是单极的霸权主导国的紧张，这与两极和多极体系下的情形不一样。中国最近建立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美国的一些评论很有意思。斯维勒教授早年提出单极体系下霸权的运行模式：单极体系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显得比较敏感，对于微小的挑战也会非常敏感，这与单极体系的特征有关。

最后我想说的是，地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有竞争的性质。我们看中美关系，如果中美都要在地区扮演一个排他性的领导角色，那么双方关于地位的竞争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两国的精英和领导层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着实难办但是需要面对。习主席说，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个从外交上没有什么问题，也说得漂亮。但是从我的观察来看，中国官方学者对于这个的解读和美方不一样，这句话是很符合常理的，太平洋确实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们中国的心态与美国不一样，我们至少在这个区域都是平等的。但是美国认为太平洋是足够大，足以容纳两个大国，但是一直以来一直只有美国一个大国，而中国提出有两个大国，这是中方提出的挑战。正如“新型大国关系”，中方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要跟美国避免冲突搞好关系。而美方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解读则是五味杂陈。

总之，我认为对中美之间地位问题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题。中美未来关于地位的竞争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这里面有很多理论、现实的问题值得探讨。

#### 四、学人寄语

最后我简单说几点体会。我想说咱们南开的学术底子还是非常好的，这一点并不是自夸，而是说南开读书的氛围还是比较浓厚，能够沉下心来读书是一个比较好的传统。

##### 1. 需要培养跨学科视野与问题意识

做学问，特别是在国际政治这个学科中，我的体会还有以下几条。首先我们不仅要关注国际政治本身，也尽量要有跨学科视野。我们是国际政治学科的学生或学者，同时也是社会



科学的学生或学者。虽然我们的领域是国际政治，但是很多知识是相通的。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其实很多时候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领悟出许多道理。以前我在听温特（Alexander Wendt）教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说不要仅仅阅读政治学或者国际政治的文献。有时候国际政治科学辩论地热火朝天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在社会学、心理学中早已经得到了解决。如果你没有这种视野的话，那么会造成很多的浪费。我想首先需要的是跨学科的视野，尽量多读书，读杂一些。从我自身的经历而言，也是如此。以前我和同学一起读书的时候，虽然专业是国际政治或者政治学，但是我们读的远远超过这个领域。

二是要有一种问题意识。我们虽然阅读了很多文献，但是你具体的研究，选择你的研究问题的时候，不仅需要现实关怀，而且需要学术意识，你的问题到底重不重要，这个本身就很重；另外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趣。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可能也是最难的标准。以前我在国外读博士的时候，温特教授跟我们说，他听过很多人做报告，觉得不怎么样，为什么呢？他提出，不管你们写博士论文还是学术报告，有一个很简单标准——tell us something we don't already know! 什么样的问题是一个 puzzle，而不是重复文献本身。如果你做的工作是填补了文献上的一项空白，当然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工作，但是不够有趣。有趣的问题是，常规理论怎么预测，我提出一个不一样的解释。

## 2. 借鉴中需要注意不同学科的背景

虽然我强调研究中的跨学科视野，但需要避免的一种情况是简单的借鉴，为玩概念而玩概念，这样会引起国关学界的概念泛滥。一方面，我们需要一种跨学科的视野；另一方面，借鉴的概念应该能够实质性地解决过关学界中存在的问题，带来一种新的视角。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所借鉴的概念的适用性往往是有限的。国际政治的背景往往与经济学、心理学有所不同。我在平时的研究学习中比较关注政治心理学，但是我也并不是完全赞成纯心理学研究中的取向，很多时候它们过度强调心理的作用而忽视政治上的利益以及国内党派政治的作用等。总之就是需要兼顾不同学科的背景，在借鉴引用这些概念的时候，需要适当地修正、修改和微调它们的适用性，需要做一些思考。比如对地位的追求，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中，它是个人层次的。但是在讨论国家追求地位的时候，它是一种政治行为。有些时候它就同国内政治的合法性相关。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就特别注意引入政治学的背景以补充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背景。大体就是这几点建议和看法。我今天就先讲这么多。谢谢！

[整理：刘志、王燕、杨雪、宋一宁]

[责任编辑：王燕]

[校对编辑：赵姝婧]



## 中国的非洲观、非洲战略与非洲研究（上）\*

2016年1月1日 文/刘鸿武\*\* 阅读/740 点赞/6

**【编者按】**非洲大陆可能是最容易被世人忽视的一块大陆，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独立浪潮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非洲正在悄然发生巨变，其国际地位也不断上升。在这个巨变过程中，中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国的非洲观究竟有何特色？中国的非洲战略包含哪些内容？中国的非洲研究又需要做出哪些努力？本期学术讲堂，著名非洲研究专家、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将带来他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的演讲。

### 一、非洲研究正在成为显学

大家好，今天的题目是：中国的非洲观、非洲战略与非洲研究。这三个问题可以依次地向前推进。吴院长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的学术团队——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院是2007年9月1日挂牌成立的，我本人是1990年第一次去非洲留学，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留学，回国以后在云南大学做非洲研究差不多20年左右，也培养了一些学生。2007年受教育部和外交部的委托在浙江师范大学创立了非洲研究院。这几年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社会对这个学科的需求明显提升，但是我国的非洲研究还是比较滞后的。浙江的政策相对比较灵活，虽然浙江师范大学地处三线城市还是个师范大学，但是当时的校领导还是很有这方面的意愿。因为2000年左右承接了对非的援助教育，学校在培训非洲的大学校长的时候对我国的非洲研究有所了解，确实感觉国内做非洲研究的人很少。2007年我就带了我的两位博士和一位硕士来到了浙江师范大学。我走之后，云南大学还留着一批我原来的学生，还有一个非洲研究中心。从2008年开始就开始大规模地招聘人才，到现在已经有一个30人的团队了，其中有一位南开世界史的博士。这是我十多年前在坦赞铁路做调研的资料，做非洲研究也30多年，也走了几十个国家。非洲是非常辽阔的，把非洲问题完全搞懂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要培养大批的年轻学者。这是在非洲的桑给巴尔岛上，当年郑和七下西洋有四次到过这个地方，这是六百多年前的事情。“在这个岛上考古挖掘中国的瓷器可以一铲一铲地挖起来”，这是美国一个历史学家的原话。如此可见，六七百年前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之大。近代西方的崛起也就是两三百年的事情，在那之前世界是另外一种图景。目前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一种新的历史状态当中去，所以说中非合作是一个重新回归历史传统但是开创新的世界的一个过程。

我们一直认为做国际问题研究不能从概念到概念，从论文到论文，因为它是一个确实生活当中问题。刚才薛书记讲得非常好，讲到我们南开的国际问题研究、经济学研究、APEC的研究等，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现实生活当中的研究。观察中国现实发生的事情，去体验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5年第3期。

\*\* 刘鸿武，男，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著名非洲问题研究专家。2009年因在非洲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荣获中非人民友好协会授予的“中非友好贡献奖”，并当选“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



它感受它。我做非洲研究的一个感受就是：这块大陆对于中国来说太遥远了，所以研究者要对非洲有感性的认识。首先你情感上是要亲近这块大陆的，要对这块大陆上的自然山川、人文地理有一种欣赏的能力，你才能坚持下来。坚持下来就会发现这块大陆研究带来的快乐和视野的拓展是远远超出想象的。之前也见过一位中联部的部长助理曾在博茨瓦纳做过一任大使，他外交生涯主要是在欧美。他和我谈，在非洲做大使回来会怀念非洲，但是在欧美回来就回来了。所以我们以前做非洲有一句话就是：没有去过非洲怕非洲，去了非洲以后就喜欢非洲，离开非洲以后就怀念非洲。确实是因为这片大陆上几十个国家的老百姓保留了人类最本真、最具亲和力的本性。中国人本来就是比较看重人情关系的，所以中国人在非洲有一种被人善待、被人欣赏、被人尊重的感觉。去到非洲的感觉就是会变的简单起来，行走于非洲是一种人生的快乐。当然你来研究这块大陆的发展问题，为这块大陆经济、政策做出当代中国学者的贡献，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做的工作。

这就是我在研究院建立的非洲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已经汇集了国内十几位捐赠者的一千多件展品。它们都是从遥远的非洲带回来的，非常珍贵，每一件展品都有自己背后的故事。非洲博物馆正在征集中非发展六十年的史料，包括修建坦赞铁路。这条铁路从1971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最高峰的时候中国投入了五万人力在这个项目。当时我们没有大型设备，最大的推土机就是五吨重的，与欧美数十吨甚至上百吨的相比，我们的工具非常原始。用10年的时间修建了这条铁路，1860公里。很多北京铁道学院（现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生毕业了就去非洲三四年，修建完了这条史诗级的铁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时中国那么封闭，但是在那么遥远的地方修建了这样一条铁路，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现在中国在非洲已经今非昔比了，我们正帮助非洲大陆建设“三网一环”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区域的航空支线网。要把非洲大陆，3000多万平方公里，54个国家的首都连接起来，可想而知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这些工程都是和几十年前的坦赞铁路联系起来，是一个史诗般的过程。博物馆是小小的一个窗口，所以我们在建中非博物馆正在征集这方面的资料。这就是中国的故事，中国外交的故事，这需要年轻人去挖掘这些东西。

下面进入本次讲座的主题，今天的题目可以分为三个小问题。第一个就是怎么看非洲。中国人怎么看非洲，也就是中国人的非洲观。中国人怎么看非洲其实涉及到中国人怎么看自己，因为你用不同的标准和观念，那么你对非洲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对非洲的理解下，中国要采取什么样的对非战略。你的观念不一样，你的战略也是不一样的。非洲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怎么样来开展与非洲的合作。第三个就是你想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就需要能够支撑这些战略和思想的人才，所以要建立一个学科，要建立一个有中国思想气度的非洲学。

## 二、非洲发展现状

今天我们说非洲这块大陆，有些时候是世界的边缘，有些时候是世界争夺的焦点。争夺的焦点主要体现在未来，各种力量在非洲大陆上正在进行一场暗中角力。长远地看，这块大



陆是世界现代化最后一块大陆，也许在未来三十年有很多方面可能会替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场，世界工业的成长地。中国也需要和非洲进行转移和对接，形成一个梯度地承接的关系，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把非洲带动起来。这就有一个国际间战略的一个博弈的关系在里面，所以非洲研究已经成了各种各样的发展理论、发展模式竞争的一个场所，中国也是其中的一个竞争者。过去中国是不大有竞争的话语权的，但是现在情有些变化，非洲的学者和精英现在越来越想了解西方以外的，宗主国以外的世界发展是怎么回事。这次非洲知识精英的觉醒，比起19世纪非洲在殖民之下，非洲精英寻求非洲国家独立的觉醒，更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因为非洲现在真正在思考未来非洲发展的道路，所以这个博弈的背后就是世界思想的竞争和较量。给中国学者留下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非洲研究里确实包涵了当代中国的很多学科，民族自我创新，提炼自我话语体系的机会。

怎么看非洲，确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件事情，主要是因为这块大陆实在太大了。这是非洲的一张地图，目前非洲是54个国家，面积是3020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三倍大。我们把中国、欧洲、美国的面积加一起是2900万平方公里，非洲要比这三大块加起来都大。非洲有10亿人口，54国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把南非拉入金砖国家，它在非洲发展水平还是高的，但是体量还是很小。这块大陆发展还是非常滞后的，到去年为止，整个非洲54个国家制造业只占全球制造业的2.5%。如果把南非和北非的几个国家拿掉的话，撒哈拉以南“黑非洲”45个国家只占全球制造业的0.7%。0.7%只相当于我国中西部一个省份，像浙江、江苏、山东这些省份的制造业都是非洲几十个国家的十几倍。我国是世界工业制造业第一大国大概占22%左右，再过几年也许会适当提升，恢复到中国三百年前的一个体量。所以非洲是一块有待发展的大陆。

为什么在过去一两百年，特别是独立六十多年来这片大陆没有发展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也是个学术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过去几十年，得出的结论是很多的，西方围绕着非洲问题形成了很多的学科。就人文社科而言，很多学科是与非洲相关的，比如20世纪兴起的人类学、社会学、人种制和各种各样兴起的所谓的传播理论，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后殖民主义、理性主义等，好多都与非洲有关系的。很多西方学者在提出原创性的理论的时候，都会以非洲作为自己最初材料的来源，例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最初就是做乍得这个国家的，他研究多年以后发现不把非洲放在世界体系里是研究是不行的。还有像马利诺夫斯基现代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他也是通过非洲建构他的理论的。

那么谈到非洲的发展理论，学术界也有很多争论，这本《援助的死亡》的作者是一位赞比亚的经济学家。她在初中以后就去美国读书，在美国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在牛津获得博士学位，在世界银行、高盛集团工作很多年，在这些大的金融组织里做对非援助的。后来她就发现非洲在二战以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成为世界援助的对象。在过去六十年里，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多边和双边的形式一共向非洲提供了6000亿到10000亿美元的援助。但是这么巨大的援助，并没有让这块大陆发展起来，相反还留下许多的问题。她就完成了这样一



本书——《援助的死亡》。她有三层意思：援助使得非洲走向“死亡”，这样的援助让非洲永远也不能发展起来，另外援助本身也走向了死胡同。我们把它翻译成了中文。边上的这一本《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国际责任的战略研究》，是我和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一位老师和一批学者完成的，主要是谈中国的对非和包括东南亚援助的问题。在过去 30 年里，中国对非的援助也在推进，现在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包括老百姓也在议论这样的事情，批评的声音也有——中国目前也很落后，为什么要援助非洲，我们援助非洲是不是很多？所以这本书是回答这样问题的。总的来看，在非洲人看来中国过去 30 年，从坦赞铁路开始，我们的援助和西方的援助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援助是捐赠式的援助是自我标榜很高的是人道主义援助，是不求回报的，就是我很发达你很落后，我无偿的给你，是高高的捐赠者。但是会提出一些条件，比如要你搞政治体制改革，要多党选举；要搞经济体制改革，要搞市场化；要小政府等。但是这些要求都没有产生良好的疗效，还使得西方国家背上了沉重的援助负担。中国的援助是不一样的，我们把援助和发展结合起来，不是简单的施舍。我们要走合作的道路，坦赞铁路是中非之间一种合作的项目。我们现在谈合作比较多，现在也有援助，但是援助推动非洲发展能力的提升，后来我们把援助和中非经贸关系联系起来。商务部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每增加一个单位额度的援助，都能带动中非之间六个单位额度的贸易增长。所以大家就发现从 2000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之后，仅仅八年时间中非贸易额就从 100 亿增加 1000 亿，2014 年就突破了 2100 亿。14 年时间，中非贸易额就从 100 亿增加到 2100 亿，现在中国企业在非洲遍地开花。我们的援助就起到了推动中非之间贸易的作用，也带来了非洲自主能力的提升，这就是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模式，而且中国也不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者，而是合作者，这是我们提出的不同的理念。

那么中国为什么提出我们跟非洲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呢？这就牵扯到我们对非洲的看法，实际上非常简单，比如说现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了，但是你们想想，过去几十年西方也是看不起中国的，觉得中国不可能发展起来，是不是啊？东方国家只能走西方的道路，所以有西方很多很多的预言家一次一次的预言中国是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看，这三十年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就发展起来了。主要是确实中国国家很大，我们可能是保持自己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独立自主地去探索自己发展的道路可能是有条件的。中国毕竟是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国家很大，所以能够找到自己发展道路，但是非洲比较困难，更何况在过去两三百年西方已经给世界塑造了非洲的形象，而非洲本身也是四分五裂，所以它的自我认知也是有问题的。可以说西方的非洲观就成了世界的非洲观，最终也变成了非洲人的非洲观，非洲人看自己是什么，也是用西方的观点来看，那么你看西方人看非洲，其实这个表现了近代以来西方对世界的总体看法。我们把这个套过来，套到东方来看，套到其它地方，套在阿拉伯世界，大体上也是这样的。当然西方对中国人的看法有所不同，黑格尔讲到历史的时候，他说中国是有历史的，非洲没有历史。但是后来他说，中国历史终结了，近代以后历史转移到了西方，转移到了德国，所以东方是成了过去的东西，非洲从来就没有过历史，不像中国，中国

还有历史，但现在没有了。所以他说，非洲只有黑暗没有理性，是一个黑暗的大陆，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殖民主义观点。既然是这样没有历史、没有理性的一块大陆，那么它就不可能独立地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因为它必须依附于外部的东西。所以它要走向现代文明，就要移植西方的制度。二战结束以来，政治上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其实经济上并没有真正获得独立。西方在提供援助的时候给非洲设置了一个没有办法冲破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高墙，以至于非洲几乎不可能形成独立自主的国家观念。有好多非洲人到中国来和我们交流的时候，他们就感觉今天非洲最大的问题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知识精英和思想者，能够带领这块大陆去走一条自己的道路，因为它确实太分裂了，这几十个国家都太小，很难产生真正的自己的这种民族独立的观念和意识。由于这些种种原因吧，当然还有很多冷战时期的大国角力等，所以非洲过去几十年是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 三、中国的非洲观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下就是中国怎么看非洲。我们要谈这块大陆，过去长期不能够发展起来，可以寻找很多原因，但是以中国的角度来看，结合中国自己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大概这样几条我觉得在非洲是比较突出的，而这几条也可能就是中国我们解决的比较好的，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第一个就是国家认同的缺失，也可以说是文化认同历史的缺失。近代以来，我们知道，西方最早走向民族国家，走出了中世纪，由所谓的上帝的普罗的世界，近代王朝国家，经过两三百年王朝国家的发展，又通过几次战争，西方分裂成二十几个主权国家。国家主权是近代以来西方孜孜以求的，所以打了很多的边界战争。但是非洲独立以后西方却给它灌输了一种不要国家的观念，这个是害了非洲的，它本来在前殖民地时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它的国家都是在殖民地基础上形成的，而这个殖民地是西方给它人为划分的，划分以后等它独立了，它又不可能改变殖民地的边界。如果改变殖民地的边界就不断发生战争，所以这些非洲国家独立以后不得不接受这块殖民地的遗产。

我们来看这五十几个国家，这些边界划分都没有考虑非洲原来的历史文化形态。非洲历史是有些古代国家的，但是这些古代国家都衰落了、瓦解了、毁灭掉了。后来西方来以后就随意划分成这五十几个殖民地，这殖民地后来变成了五十几个国家。既然变成了国家。那么独立以后，首先就应该建设自己的国家形成国家的观念、国家的意识、国家的文化、国家的制度，你要实现国内一体化的进程，必须要有很有力的政府来实现国家建构进程。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国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春秋战国就已经形成华夏文明，后来到了秦朝统一六国，有了郡县制中央集权，两千多年一以贯之，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和认同感，无论谁执政，朝代可以更换，政党可以轮替，但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家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国家，这三十年中国不可能发展起来，这是所有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发展的资源不是投资不是技术，而是国家制度资源、国家历史文化资源。这是中国很强大的地方，但非洲缺少这个东西，这样就造成很多问



题，国家认同的缺失。西方冷战结束更加推动它的所谓多党制度，所谓讲民主讲人权，就是不讲国家。所以非洲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以天下为己任，报效国家服务社会是最高使命。那你想如果全社会知识分子都以国家为自己最高使命的话，这个国家迸发出来的力量多么巨大，可以一代代地延续下去，所以不怕短暂危机局面，能够渡过这个局面重新复兴的。但是这个国家如果本身是一个国家但是不是经济的国家，充其量是地图上的国家，在联合国上可能是有它的一票但不是有机的实体，它国家内部的民族部族宗教文化各个群体之间缺乏认同感和一体化进程。本来这个过程应该在独立以后经过两三代人实现，但是没有往这个方向走，西方给他们制定的道路就是所谓的竞争性多元化的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就撕裂了这个国家，所以它搞多党制后部族矛盾、宗教矛盾、区域差异就凸显出来。到四分五裂的非洲去你会看到，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只有你在首都还是一个国家的存在；离开了首都，走出去几十公里就看不到政府了，更不要说你到边疆地方去。但是你们知道中国，我们学历史的有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时候我在云南边疆地区长大，那么边远的地区，明清时候改土归流，全都是流官，在中国走到哪里都找到当官的人，找到一个管事的人，我们到哪里找地方政府是没有问题的，农村里面都有，城市里面还有居委会，从头到尾全都管起来，这是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制度。这种制度有一些问题，但是对后发展国家是至关重要的，非洲就缺少这些东西，所以国家认同一定要解决问题。当然现在是在全球化时代，所以它就是压在一起，全球化又要有区域一体化又要有国家化，而国家化、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又是矛盾的，这对非洲国家来讲就很困难了。它这里面包含的政治学的问题，确实是非常复杂的，任何一种西方的理论都没办法解释非洲现实发展问题。第二个就是产生下面几个顺带出来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都是连在一起的——弱势国家低能政府，然后就是外部干预和主权瓦解。

第三就是自主发展理念的缺失。非洲人的依附观念其实是非常严重的，这也不能完全怪非洲，一是国家小，很难独立自主；二是过去几百年西方的殖民统治造成非洲的文化都是西化的。非洲人是所谓的“香蕉人”——黑皮肤、白色的心理世界。这个是中国更加严重，非洲的知识精英比中国人可是西化多了。我90年代在非洲留学的时候，它们的大学教授全是剑桥牛津留学回来的教授博士。但是又怎么样呢，他们就重复从西方学回来的东西，他们也不研究自己本土的问题。非洲的知识精英他们的现代化程度比我们高得多，他们的英语法语比我们说得好，国际会议交流上我们都说不过他们，但是他就不研究当下的问题。所以非洲至今自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关注自身本土文化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研究非洲的问题我有一些想法，我也和吴院长交流过：我们搞国际问题研究，一定要懂中国、懂世界。我们经常讲内懂国情、外懂世界，才能够看得清非洲问题是什么样的。我顺带比较中国，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国几十个省，非洲是几十个国家，那么你想想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聚合起来的呢，这个一定要去研究，所以我们搞国际问题研究有两个问题绕不开的。第一个，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为什么没有中断？第二个，这个国家这么巨大，它为什么没有分





裂？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是汉族，有 12 亿人口，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大的民族？尼日利亚有几百个民族，非洲据说有两千多个民族，为什么分裂成了那么多民族，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现实的问题。

说了非洲那么多比较消极的方面，那这么说中国跟非洲就没有合作了？不是的，实际上刚才谈的是一些大的问题，但是中国人对历史的看法是两方面的。前面说过，中国人的历史智慧就是看似变动不居的世界当中、混乱不居的世界当中看出不变的东西。天地之下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在里边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这是做历史研究一个很大的智慧，也是中国看国际问题的智慧。天下变来变去但是你能够把得住大的趋势，不变的东西是什么，中国把它称作天下之道。首先，过去几十年非洲依然按照自己独特方式逐渐向前发展，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其次，你要从不变的世界当中看出变化之所在，很多人看不到非洲的变化，以为非洲永远都是混乱的、动荡的。其实不是，你要是有一个更加全面的眼光，你会发现非洲在过去几十年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概括起来讲有很多，但从未来非洲发展角度看，我认为有三点特别值得关注的。

第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虽然过去非洲独立以来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民族独立和主权国家的获得是非洲在过去 60 年来最大的成就。虽然非洲有那么战乱和冲突，但是我们看看二战以后的世界，全世界很多国家都瓦解或解体了，可非洲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解体。苏联解体了、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了，亚洲也有很多国家分裂了，更不要说近代以来西方很多国家，那些老大的帝国全都分裂了。非洲国家有大规模战乱，但你们看看独立六十年来，这块大陆保持了国家的持续存在，这就是很大的成就——除 1994 年厄立特里亚从埃塞分裂出来，2012 年南苏丹分裂出来，只有这两个国家，其它国家坚持了下来。1960 年独立开始到现在已经有 60 年，如果是 1960 出生的孩子，当他出生的时候这个国家产生了，不会有国家的观念；到现在他的孙子出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在非洲有些国家的观念、国家的认同感产生了，这就是非洲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我们去非洲去，我们发现有了新的变化，今天在非洲有些国家他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感。一些非洲的知识精英已经开始来寻求自己国家发展道路，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家的建构进程取得很大成效，政府的行动能力成长起来。

现在我们看非洲有几个国家特别值得关注，有时我们开玩笑跟法国人讲。法国人是特别关心非洲的，跟英国人不一样，英国人当年治理非洲是把它看作殖民地，间接统治，因为英国人少，当时全世界的殖民地相当于一百多倍日不落帝国，所以它派不出那么多官员去殖民统治非洲人，而且殖民地官员太多了回去以后退休工资很高，养不起这些殖民官员就搞间接统治，就是不想改变非洲文化。法国人不一样，法国人是雄心勃勃地想要改造非洲人。法国管非洲不叫殖民地，叫法国的海外省。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桑戈尔，他就是法国国会议员，据说法语讲的比老巴黎还要地道。他为什么要讲巴黎地道的口语？因为他一定把自己变得非常非常法兰西化。他到法国去，人家把他看成地地道道的法国人。但就是这些法国的非洲殖



民地 独立以后发展是最困难的，直到现在动荡也是最多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法国人一直想把非洲变成真正的法国海外省殖民地，但是要做到这点非常困难。现在很多非洲的法语国家已经意识到这样一些问题，开始寻求自己国家发展独特道路。

现在非洲有几个国家既不是法国的模式，也不是原来英国的模式，有点像中国的模式，比如说埃塞俄比亚、卢旺达、乌干达、坦桑尼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安哥拉。这几个国家是怎么独立的呢？它不像法国的殖民地，法国的殖民地是和平的，我给你建一个制宪议会，给你制定宪法，然后法国人走了，像桑戈尔当了总统，这些国家独立以后，基本上都是弱势政府，全盘照搬法国人一套。而其他几个国家不一样，刚提到的这几个国家都是像中国一样，通过武装斗争来夺取政权；内战结束后，原来的革命党就转变为执政党，所以它是强势的政府。比如说埃塞俄比亚梅莱斯·泽纳维推翻了门格斯图政府后掌握了政权，掌握政权后用军队和原来的执政党转变为国家的机器，所以就形成了强势的政府。埃塞俄比亚资源非常贫乏，原来是非洲最穷的国家，但是从 80 年代以来它在梅莱斯的领导下，经过 20 几年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和中国加强大规模的合作关系，现在已经成为非洲经济发展最快最有希望的国家。而且它是大规模移植中国这一套发展模式，埃革阵中央委员政治局以上的官员全是在中国接受过学习的，安哥拉、莫桑比克、卢旺达也是一样。你们都知道卢旺达大屠杀，它结束以后，现在这个总统卡加梅率领他的部队打回去，他的部队是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边境上由中国人培训的，东非这几个国家领导人都受过中国人培训的，顺着游击队打回了卢旺达掌握了政权。仅仅用了 20 年不到，现在卢旺达已经是非洲发展最快的国家，非洲最有希望的国家。所以像卡加梅、穆塞韦尼、梅莱斯和他的继承者等人就觉得只有这样的强势政府把国家聚合起来才能解决国家发展问题，他们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推行民族的融合，因为民族融合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宣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后来又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统一的、主导的意识形态非常重要，是形成一个现代国家的必备条件。我们都知道，所有的民族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是有些民族产生之后，它们的文化是比较强有力的，然后它用这种文化将整个民族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国家，并支撑这个国家的发展，而有些民族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民族跟文化的两者的同构最终形成一种现代国家式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基本的一个前提。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中国本身是非常有优势的。现在非洲经过几个阶段，有些国家已经往这个方向发展。这样就使得非洲在未来的 30 年，有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经济发展的新的阶段，这是我们谈的一个非洲成长的四大步伐。

那么为什么非洲在未来有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呢，其实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角度能够去解释它，但是比较重要的一点肯定是，全球发展体系结构的这种转移给非洲带来的机会。我们知道六七十年代曾经有亚洲的四小龙，但是它太小，成长不起来。80 年代的东亚开始升起了，但是那个时候中国主要是解决自身的问题。那么进入到 90 年代，特别是 2000 年以后，中国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等金砖国家的发展呈现一种新的世界现象。我们知道这些金砖国家



都有一个很突出的、跟当年的西方国家不一样的特点——体量大。这种体量巨大的国家要实现工业化时，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市场、资本、劳动力。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向后工业化时代过渡了，它们依靠科技、金融、信息等产业来实现进一步的发展。这些东西带动不了非洲的发展，所以，当年西方国家觉得非洲是不可能发展的，它们也不可能拉动非洲的发展，所以就是援助它。而今天的中国刚好相反，像中国这些国家的发展确实需要非洲，因为中国等国体量巨大，工业化程度也很低，市场需求很大，比如说石化材料、矿产、森林、木材等。

当年西方国家发展的时候，曾经部分带动了非洲的发展，但是基本上对非洲没有什么影响力。而今天不一样，金砖国家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那么就给非洲这片大陆带来了一种机会。我们看金砖五国和西方七国集团经济体量的变化，非常明显。2010年，我们只占到西方七国集团的一半不到，中国占到了70%左右，南非实际上很小加入进来的。但是到2020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预计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会超过西方七国集团，这个还可能会提前。那么到2030年，就是15年以后，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当中所占比重就是84万亿美元。现在中国是10万亿美元，非洲54个国家是2万亿美元经济总量，美国现在大概是16万亿。统计数字有所不同，一般的像中国现在10万亿，日本是6万亿左右，现在肯定达到11万亿了今年，美国是16万亿。但是如果按照平价购买力法，他们现在认为中国和美国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那么我们看再过15年，金砖国家会达到一个很高的84万亿，那个时候中国大概会达到30万亿左右，超过美国的经济总量。实际上金砖五国以外，现在还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这全部加在一起在未来的若干年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块头。这些国家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们对于非洲这块大陆的需求是根本性的。现在中国实现经济未来30年发展的35种战略性资源，支撑未来再继续发展的6%-7%的发展，如果再维持10-20年的话，这35种战略资源，有25种我们是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通过外国获取。那么外国获取呢，当然有些像西方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一些拉美，非洲是很大一块，而且非洲有些资源是其他地方没有的，所以他就会形成一种拉动的结构性关系。我们这里有一个按照这个所谓的平价购买力方法来计算，中国的GDP总量到2020年就超过了美国了。那么在后面的有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以及南非等新兴国家。那么这个里面你就可以看出来，到2050年左右，七国集团实际上都已经退到很远的地方去了，除了美国以外，一大批国家已经走到了前列。这就是一个大的世界的趋势，而这个趋势的形成，中国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整理：杨雪、郭超、宋一宁、刘志]

[责编：刘志]

## 中国的非洲观、非洲战略与非洲研究（下）\*

2016年1月1日 文/刘鸿武\*\* 阅读/430 点赞/5

**【编者按】**非洲大陆可能是最容易被世人忽视的一块大陆，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独立浪潮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非洲正在悄然发生巨变，其国际地位也不断上升。在这个巨变过程中，中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国的非洲观究竟有何特色？中国的非洲战略包含哪些内容？中国的非洲研究又需要做出哪些努力？本期学术讲堂，著名非洲研究专家、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将带来他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的演讲。

### 一、中国的非洲战略

中国现在又通过“一带一路”这样一种更加宏观的大战略，把所有全球变化、全球发展统在一起，就是把中国国内的发展和国际的发展统在一起。所以，“一带一路”这个战略是和未来全球大的布局是相吻合的，我们现在有成熟的非洲战略，还有一些其他的战略，可以统合在一起。现在中国就在寻找这样的战略，“一带一路”可能是一个过渡性的战略，但现在在找来找去，这个可能是比较好的，能够统筹起来，就是国内和国际统筹起来的，整个欧亚非统起来的一个战略。那么，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战略的影响范围是很广阔的，这就给非洲带来了机会。在这方面，中国和非洲的合作是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出，中非合作升级版，非洲也搞了一个“2063计划”。非洲统一组织是1963年建立的，那么到2063年是非洲联盟100年。我们是有一个“049战略”，我们知道中国是那个时候建国100年。大概是到了这个世纪的40到50、60年代的时候，中国、非洲和这些亚非国家，毫无疑问真正成为那个时候经济增长的中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要大规模介入这块大陆的发展进程，因为他现在刚刚起来，现在的非洲特别像中国的80年代初，大规模的建设正在铺开。这个时候中国又存在着一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迫切的需求——我们这种粗放式的结构已经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了，现在必须要进行结构上调整。结构调整要通过科技的进步，但是重要的方案要和非洲的方案结合起来，让中国产能转移对接到非洲去。中国向更高端走，腾出来位置让非洲填补进来。非洲来补位，他补的是中国的位，中国的机车到非洲去了，中国的标准到非洲去了，中国的文化到非洲去了。未来30年的发展就和中国未来的发展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就从根本上会改变未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以现在看上去，中美关系是中国的核心，大国较量就是中美在较量。实际上从长远来看，决定中美未来力量格局的不是中美之间的关系，而可能是像“一带一路”、非洲这样的地方最终会决定中美之间的关系。这一点西方是看的很清楚的，不是所有西方都看的很清楚，大部分的西方学者还是忽视非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5年第3期。

\*\* 刘鸿武，男，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著名非洲问题研究专家。2009年因在非洲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荣获中非人民友好协会授予的“中非友好贡献奖”，并当选“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



洲的。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有战略眼光的，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在非洲“一带一路”正在布一个更大的局。这个局是着眼在20、30年以后中国的全球地位的。

这样一种局的最大特点是，带动非洲大陆和中国的共同发展。这是当年西方没有做到的，那中国能做到这一点么？如果中国做到这一点了，那么中国几千年的所谓的天下志向、大同理念就在这一代人当中得到实现了。这也是中国未来确保自己的国际地位，获得强大软实力之所在。因为未来中国的安全，是不能像西方一样依靠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的。美国这样强大的，一个国家占全球军费开支的百分之五十，都不能保护中国自己。中国未来保护自己利益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世界和中国共同发展，把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捆绑在一起，这就是中国超越西方国家的所在，这也是中国智慧的所在。我们中国是有这个传统的，中华民族的“天下”观念、大同理念，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非洲是中国可以着力去经营的一块大陆。你看现在的“一带一路”战略，连接过去、进入非洲，下一步就是中国的泛亚铁路、欧亚大铁路，最后要把非洲连接起来。这是我们给非洲搞得这么巨大的工程，你们以前学历史学到，西方人搞一个什么“双C”，法国人又搞一个、英国人又搞一个，后来都垮掉了。你看我们现在把整个非洲大陆连接起来，你们可以设想一下，这块大陆再过二三十年发展起来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现在已经是大规模的铺开了，东西南北都在做。比如，我们正在修的蒙内铁路，从蒙巴萨到内罗毕的铁路。肯尼亚是英国的殖民地，可是一百多年来肯尼亚没有铺过一块木材，修过一米铁路，停了一百年了。现在中国给他修了蒙内铁路，把蒙巴萨和东非连接起来。这个还只是一个很初步的铁路，公路还有航空织线网。当然我们现在还帮助非洲搞电子商务，因为非洲他可以高起点先走啊。现在非洲达尔富尔的小孩，中国华人进去以后，达尔富尔那些农民放羊都是用手机放羊。现在用手机控制这个羊群，这就是一个跨越式的现代化进程。华为中兴等公司在非洲是不得了的，发展非常非常的快。非洲可以在某些方面是跨越式的发展的，这些就是中国看非洲发展的一些前景吧。这些都值得我们用心去观察。

我们这几年做了一些研究，就谈谈中非发展合作，这些理念、这种相关的一些成果。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些数字，实际上这块大陆在过去十几年年已经开始增长了，这是很多人都不太了解的。我这里是从06年开始的，实际上我们从2000年开始拉一个数字下来，在过去15年当中，这块大陆已经保持了十几年5%-6%的增长速度。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25个国家，前25个有14个是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像埃塞俄比亚已经连续保持了五六年10%的增长速度。有些国家增长的更快，这是2012年的一个数字。你看像什么塞拉利昂、尼日尔、科特迪瓦，这些都是6%以上的国家，连续几年都是这样。利比亚是个例外，因为刚刚打过仗嘛。这些国家的增长是非常快的，虽然说现在起点很低，整个非洲加在一起GDP只有2万亿，南非是4000亿美金。浙江省去年是6000多亿美金，人均GDP10000美金。我们人均还是很少的，体量是比较大的。现在非洲体量很小，所以增长很快，按照这个速度，非洲未来30年肯定是一个持续增长，不会是所有国家都增长，就是这么一个大的趋势。而



且现在有个特点就是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南南合作，南南合作确实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而且是来自于非洲内部，他自身内部成长起来，所以我们说现在非洲出现自己的金砖国家，比如这里列的几个，尼日利亚、安哥拉等都是中国要做的支撑国家，推动它们的整体发展。

实际上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中非命运共同体。这张照片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去南非访问，当时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0周年，我们开了一个研讨会。习近平副主席他去南非访问去开普敦看了一下，他参加我们这个研讨会，晚上在使馆接见了我们，就谈到了中国的非洲研究。当时我记得出来以后，我们好几个学者就说这个习近平啊日理万机，对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还这么了解，他也谈到中国的非洲研究要加强的事情。所以就是当时陪他一起去的国家开发银行的董事长陈元，晚上在一起吃饭。他就跟陈元讲，你们国家开发银行在国内搞了很多开发项目是相当成功的，你们以后能不能把开行到非洲去做开发。第二呢，你们拿点钱来支持一下中国的非洲研究。回来以后国家开发银行就果然大规模地推动中国企业到非洲的开发合作。我们现在跟国家开发银行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就是现在非洲国家一个一个国家找中国，让我们给他做国家的发展规划。中国不是有“十二五”规划么，现在正在做“十三五”规划了。非洲国家觉得这个非常好啊，所以好多国家就找上门来。我们国内哪有学者给他搞这样的规划啊，所以到这个时候国家开发银行就着急了，说我们过去为什么高校里面不好好培养这样的人才呢，现在非洲真的是短缺啊。五十几个国家，几千家企业走进去了，到处都是中国的海外利益、国家利益，但是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所以现在我们国家领导人要到非洲去访问，要找一本像样的这个国家的、真正一流的书都找不到，所以知识的这种短缺不足以支撑今天中国的全球战略、这种布局，已经成为一个棘手的事情。所以国家对这个非洲研究也是高度的重视，所以他才会出席我们的学术研讨会并发表演讲。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归纳一下就是，中国和非洲正在形成一种互为机遇的一种共同体，这确实是不是我们的政治口号，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首先我们说，中国可能是非洲的一个机会。非洲经常这样认为，金砖国家是这块大陆未来实现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这一次都不能够抓住中国这条起飞的这条龙的尾巴，那非洲就没有希望了。因为中国等金砖国家的发展会带动非洲的发展，所以中国可能是非洲实现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机会。

总而言之，非洲是中国的机会；同时，中国也是非洲的机会。非洲为什么说是中国的机会呢，主要有两点。第一，非洲是中国改变与世界关系的一个支点。大家知道中国重返联合国非洲起了很大作用，一直以来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础，这一点可以说 是很有道理的；而且这个基础是战略性的基础，它不是一时的，而是长远的。第二，非洲是中国改变自身国家形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过去几年西方国家一直给中国塑造一种形象——中国是集权国家、共产国家、造反国家。但是现在变了——美国是革命者，而中国是建设者，这个形象发生了翻转。现在在非洲流行着这样一个说法：革命靠美国，建设靠中国。因为美国在非洲是处处搞革命的，推翻这个或那个国家；中国是搞建设的，中国经常说你们不要



打了，一起来搞建设吧，不要管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这一点是和美国相反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好的，因为中国一定要改变自己是国际秩序的造反者这样一个形象，也需要改变自身是国际秩序的受害者这样的心态，抱着建设的积极态度去营造非洲。刚才讲到中国是非洲的机会，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第一，中国是非洲摆脱西方支配的宿命的一个机会。当然，以前非洲很难摆脱，因为它和西方靠的太近，深受影响；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它有更多的选择了，目前各方处于一种竞争的状态。第二，中国是非洲发展路径的另外一种选择，或者说中国的做法和经验使得非洲多了一种选择，不一定说一定是走中国的道路。第三，中国是提升非洲全球地位的一个拉绳。三十多年前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现在中国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实际上提升了非洲的国际地位。这个论坛建立以来，非洲的发展非常迅速，所以过去十年“忘记”非洲的西方国家赶紧“重返”非洲，它们现在也模仿中国搞各种各样的论坛，包括美国都开始搞，所以说非洲的地位开始提升了——中国开始把它捧起来，西方也更加重视它，这提高了非洲在国际上的要价。这种形势对非洲是有利的，当然对中国来说是个巨大的压力，印度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第四，中国是非洲重获自信心的一个平台，很多非洲学者来中国调研时这样说道，三十年前很多非洲国家比中国更好。比如说“钻石之国”博茨瓦纳，它只有两百多万的人口，它的人均收入在三十多年前已经达到了数千美元，此外在80年代好多非洲国家比中国富有。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亚洲国家发展起来了，而非洲的发展依旧缓慢。这说明非洲不是不能发展，而是没有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如果有一个好的国家，好的政府，好的政策，非洲也是能够发展起来的。这样，它们就会寻求发展的新道路。好了，再次回到中国的非洲战略这一话题。这些资料大家可以随便看一下，这是尼罗河，我们以前从苏丹进口石油，现在南苏丹独立了，怎么办呢它们就跟我们搞农业合作。它有4000万人口，13亿亩可耕地，作为对比，中国有13亿人口却只有18亿亩耕地。刚果金一国有7000万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5%，但是它也有18亿亩耕地。现在全世界未经开垦的耕地60%集中在非洲，这个数目是非常巨大的，也意味着中非农业合作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比如，尼罗河的土壤是黑土地，同中国东北的是一样的，非常肥沃。以前这一地区的农业非常落后，现在我们正在帮助他们进行土地开发。同时，非洲的人文资源也非常丰富。

谈到中国的非洲战略，以下几个概念是需要讲一讲的，一个是1974年毛泽东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时候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说我们中国和非洲都是第三世界。卡翁达回去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回应毛泽东这句话，他说赞比亚和中国是全天候的朋友。2009年的时候，卡翁达到北京来领奖，我当时当选了“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卡翁达是“感动中国的五位非洲人”，那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汶川地震的时候，他还去使馆捐2000美元。其实，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的，1995年我去南非的时候，见到了曼德拉的一个助理。他跟我说当时曼德拉在被关押的27年中，他说每年的10月1日的时候，那里的犯人需要“放风”（参见电影《红岩》，那里关押的共产党人就经常放风）。非国大被宣布非法



数十年，曼德拉被关在狱中 27 年，每年 10 月 1 日都需要用非洲的方式来放风——这是非洲人节日的庆祝方式。他说为什么放风，因为这是中国的国庆日。非国大是将中国看作是未来非洲的一个希望，因为我们当时一直支持非国大的斗争。2003 年我去赞比亚做访问学者，在坦桑尼亚做过逗留。当时坦桑尼亚的副总理 萨利姆和我们一起开会，他曾经做过非统的秘书长。当时在会上他就讲，你知道吗，当时我 22 岁就到中国做大使，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你们毛主席递交国书的。我们说不可能，怎么可能在天安门递交国书？他说是的，你们当时正在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晚上 9 点钟的时候我才找到一个机会，把国书递给他，然后 11 点钟你们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1971 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有 70 多票支持，其中三分之一是来自非洲国家的。当时联合国大会宣布新中国获得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那几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就站起来跳舞了，特别是那些个年轻的外交官，跳着跳着就到了时任外交部长黄华的后面。这个镜头我们现在都还能看得到，萨利姆说你们知道吗，跳舞跳得最好的那个人就是我。后来他做了坦桑尼亚的外长、又做了坦桑尼亚驻美国的大使、非统组织的秘书长，总之做了好多年的外交工作。到了 1980 年左右的时候，联合国要选举一个秘书长，按照惯例秘书长来自某一个大洲是可以连续两次的。当时美国推了一个是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中国则坚决反对，我们坚持要推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我们推举的就是萨利姆。为什么美国反对萨利姆，因为他和我们的关系很好。后来他回忆说，中国重返联合国我是做了工作的，美国因此嫉恨于我，说我不可靠，绝对不能做联合国的秘书长。当时中国推萨利姆推了 16 次，美国就否决了 16 次。美国推瓦尔德海姆推了 16 次，中国就否决了 16 次。最后，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难产，双方达成妥协，推举了智利人德奎利亚尔。他就跟我讲这些事情，我当时就被吸引了，可见当时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有一年江泽民主席出访马里的时候，马里科纳雷总统突然走过来说欢迎仪式撤消了，也不要到总统府了，到我家里去。当时外交部的官员也不好说，又没有别的办法，就到了总统家里坐了下来。这张照片呢是周总理出访非洲三个月，其中一站是马里，这是当地的一个孩子给他献花的场景，当时的总统叫做特拉奥雷。马里科纳雷总统说当年给周总理献花的小孩就是我。江泽民一听，非常激动，无条件地信任这个国家。总之，中国对非洲有着一种不一样的情感——平等相待、以诚相待。所以现在中央提出来中非关系需要“增实增诚”，就是中非关系中提炼出来的一些东西。发展中国家需要穷帮穷，互相帮助，加强合作。也就是说中国不一样的非洲观形成了不一样的非洲战略，中国的非洲战略也成为了中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撑。

## 二、中国的非洲研究

最后再讲讲中国的非洲研究。随着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中国面临的外部问题也会越来越多。一方面，我们还需要继续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更多地研究发展中国家，并且需要将两者连通起来，贯通起来。现在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起到这样一种中介、桥梁的作用。那么，非洲研究这个学科也





是一样的。非洲研究应当如何做，我觉得我们仍然需要做以下几个事情：一是要了解、借鉴和汲取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非洲研究的基本成果，要做大量翻译的工作、研究的工作、调研和考察的工作。非洲学是一个巨大的学科，西方很多一流的大学和机构都有着很强的非洲研究能力，而中国的非洲研究和西方的差距可真的不是一点半点。要是我们按照他们的方法，那么很可能几十年都难以赶上，因为他们的研究是几十年、上百年研究的积累，对非洲各个方面都研究得非常全面了。所以我们到西方国家去可以发现，西方的非洲研究非常详细，连很小的部落都有翔实的研究。西方的非洲研究既是一个财富也是一个负担，高悬在我们头上，因为现在你是真的难以企及。我们需要去了解、借鉴和汲取，但是也不能仅仅这样做，否则你永远走在他们的后边。

那么，怎样超越西方的非洲研究呢？我想还是需要回到中国传统的学术道路上去，围绕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来做非洲研究。围绕中非发展的现实问题，结合过去六十年的中非关系来研究当下的问题，从而建构起一套与西方不同的知识体系，这样的知识体系它有三个源头。第一个源头是借鉴西方学者的知识成果，但是不能照搬，需要消化和选择。第二个就是回到中国传统学术的源头上来，利用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资源进行研究。中国这方面是有悠久的传统的，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中国就有研究境内的少数民族以及周边国家的传统，积累了中央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资源，这方面中国是有自己的传统的，可以进行挖掘。第三点是利用当代中非合作的实践，这一点是西方所不具备的，因为现在中国在非洲有数千家企业，新中国同非洲国家也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当然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们能够平等的来观察非洲。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推动中非智库论坛的建立，形成了中国-非洲智库合作伙伴的计划，所以我们非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能够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因为西方比我们先行了很多步。我们怎样赶上和超过他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非洲研究对中国学术创新来说也可能是一个机会。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美国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西方人自己比我们了解的多，而且他们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已经是非常完备的了。非洲则刚刚相反，因为非洲的学术研究是非常落后的，而现在非洲处于快速发展当中，这样就给了中国一个机会。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非洲可能是唯一一块中国影响力可能超过美国的大陆。中国在其他大陆的影响力很难超越美国，但是在非洲更有可能。中非合作中因为双方的实力差距，中国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来推动中非合作的。这同时意味着中国学者可以更好地进行观察和解释中非合作以及非洲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发展的各个方面，并提炼出一套新的理论来解释非洲的发展问题。我想，通过这样一个学术边疆的开发，对中国未来学术体系的构建是非常有利的。综上所述，谈到中国的非洲研究，我想有三点需要融会贯通：秉承中国学术研究传统、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总结中非关系的实践。我们非洲研究院现在老师进来的原则呢，有以下几个：首先是确定研究领域，第二是定地域，第三是定国别，最后是定问题。领域是指经济、政治、文化、



外交等，地域则分为东非、西非、中非、南部非洲等，国别往往是两到三个，最后是定一个具体的问题。定完题目之后，将他排到非洲去做调研，最后将文章写出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带动非洲的研究。我们有一些设想：一个是建立一些实体性的机构，因为非洲现在无力来主动承担 或者吸引这样的研究，我们应当主动跨出第一步；第二个是要建设一批非洲研究的队伍，而且这个队伍应该是来自不同的学科，非洲研究不可能由一个学科来单独完成，需要根据不同问题进行跨学科合作；第三个是需要建成一个良好的环境，硬件、平台的搭建，“先筑巢、后引凤”；第四是要到非洲去，一定要到非洲去。这个有一定的困难，我们招进来的老师，有的一听说有去美国留学的机会，眼睛立马亮了；要是去非洲，则需要做很多的动员工作才愿意去。也许这也是中国还没有到达那个阶段——西方国家的非洲研究学者一定要待在非洲几年的，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离这个目标也差的很远。现在我们在逐渐地落实这些事情，包括智库论坛、相关的基地等等。最后呢我们希望建立一所非洲研究的大学，这是一所为十年二十年之后中非合作培养人才的大学。义乌市政府非常热心，专门拨出 100 亩土地来希望建立一所中国的非洲大学。但是师资力量、招生计划等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不敢答应这件事情，希望我们年轻的博士愿意走这条道路，去开创新的事业。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团队，这个团队在二十年后能不能成长起来，我现在不敢确定，但是我们正在做这样的工作。谢谢大家！

[整理：杨雪、郭超、宋一宁、刘志]

[责编：刘志]

学生

愿《新视界》成为知识之窗，思想之窗。

——王翠文



## 多伦多漫笔\*

2015年11月18日 文/段沁\*\* 阅读/76 点赞/1

**【编者按】**2010年的最后一天，远在多伦多的段沁写下了这篇文章，与南开国关学子共勉。重读这篇漫笔，依然能感受到国关学子独在异乡求学的不易，和有机会与不同思想进行思维碰撞的幸运。佳作重读，《新视界》谨以此文送给正身在他国和即将留学他国的国关学子。

不觉来加拿大四个多月了，繁重的课程和陌生的环境使我疲于奔命，难以静下心来感悟生活。偶尔闲暇，打开电脑，思绪繁杂，也不知从何写起。闲聊的时候，我的大学老友永哥鼓励我把这段时间的经历和感受写出来：一来给生活留份底稿，二来也可以跟南开的朋友们分享海外的生活感受。盛情难却，友命难违，我就尝试着梳理来加以来的生活感受。跨年的夜晚，独坐桌前，百感交集，就以“多伦多漫笔”吧。没有太多的寓意，孤独的人在多伦多追赶四散而去的记忆而已。

在这四个月里，我感受到最多的是挫败感。学习上的不顺利是挫败感的最主要来源。因为语言问题，更因为思维方式的差异和知识基础的不足，我这学期学习很不好。其中，糟糕的口语和听力是我适应学习不顺的最主要原因。在多伦多大学，老师的 lecture 最多占一半，剩下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课堂讨论和活动，老师们只扮演启发引导者的角色。他们尽全力启发我们思考，重点在于我们相互交流想法和观点。在这种环境当中，口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仅仅一个托福口语考试高分对我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同学们的发言和讨论，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多不同的语音语调的混杂，而且他们发言的声音是要比老师讲课小很多的，所以一开始我几乎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那种感觉太可怕了……好在后来听得多了，我就明显感觉好多了。同学们上课时你一嘴我一舌的发言我已经可以听懂大半，小组讨论时候几个同学之间的交流我已经基本明白。此外，学习中的口语表达很多时候也让我觉得非常难，所以这第一学期我的课堂发言是极少的，和同学之间的交流也是极少的。不过，经过一个学期的一个人围观一群人，现在小组讨论时我也可以说一些自己的想法了，即便只是一点点，我知道自己是有进步的。虽然很多时候我仍然会因为听不懂说不出感到极端的挫败，但是我不再让挫败感严重影响我的心情和学习效率，我会努力学会更好地调整情绪。

其次，我的阅读能力，尤其是速度也亟待提高。我的托福阅读是满分，GRE 阅读也没错几个，但是第一学期仍然不可能完成所有的 reading list, required 的都完不成，更不用说 recommended……这边的课程的阅读量实在太大了，毫不夸张的说，一门课 required 阅读量绝对大于以前一个学期所有课程的阅读量，而且多大一个学期只有 12 个星期，连本科时的三分之二都不到。这边的同学本科就是这么过来的吧？至少本科也就读过很多很有价值的书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0年第4期。

\*\* 段沁，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芒克全球事务学院（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University of Toronto）2009级全球事务专业硕士生。



和学术文章了吧？相比之下，我的本科实在太荒废了，所以我现在才会觉得这么累的吧？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四个月的锻炼，我的阅读速度已经有了明显提高，至少现在读那些英文书不会再觉得非常痛苦了，至少学会了浏览，学会了快速抓住重点。

还有一个让我产生挫败感的就是思考能力的欠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是从大学开始吧），我就几乎丧失思考能力了，这真是个大悲剧。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是基本不需要思考的：上课老师不喜欢你发言；课下没有同学会讨论课堂上的东西；考试不需要思考，只要背书就好了；论文不需要思考，只要会复制粘贴——会总结，会拼会凑就好了。我是个学习国际政治的，但是某些老师会口口声声在课堂说“我们不谈政治，记住这些理论就好了”（当然也只是为考试记住而已）。这就是我的极其可悲的大学生活！但是在这里，可以说是随时随地都得思考问题。前面就说了，老师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拼命启发我们思考，即便有些问题他们都有可能回答不出，他们会诚恳的说：“我本来就不是个专家，某些方面在座的你们知道的经历的可能比我要多得多，这个课堂本身就是个互相学习的地方”。听到老师这样说的时候，我总会觉得特别自豪，特别幸福，这里才是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学习的地方！

我现在觉得思考能力欠缺除了思维钳制之外，可能和眼界狭窄也有很大的关系吧。相比我们班上的同学大多经历非常丰富，我的生活经历实在过于单调。他们在大学里的时候可以接触到很多出国实习或者做实地研究的机会，去过非洲，亚洲，欧洲做过实习或者研究的同学非常的多。同样是大学毕业，他们的含金量远远大于我。我的压力真的很大，感觉本科时学到的东西实在太少，经历过的事情也实在太过有限。挫败……endless frustration……但是好在我还年轻，而且现在的学校班级给我拥有一个绝佳的平台，虽然第一学期我浪费了很多机会，但是我相信以后我会做的越来越好，在这里学习的经历不管多难多苦，绝对是我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此外，我现在有了接触以前很多想接触却接触不到的知识、信息和事实的机会。总之，出国之后，我得到了更清楚的看中国的机会，也学到了更全面客观思考问题的方式，最重要的是重新找回了思考的习惯。中国的问题很多，不是靠几个小愤青没事骂几句就能解决的。太多的东西需要面对，需要思考。如果以后最终终老于校园，我想我会研究与中国相关的问题。

被挫败感打击之后，我已经慢慢适应了快节奏和开放的学习环境，陌生和孤独也慢慢退去，交了新的朋友，也渐渐融入新的环境，开始享受生活的美好了。最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自然环境也好到没话说。多伦多大学之内就有个巨大的公园，我几乎天天经过。在校园里松鼠和各种小鸟随处可见，而且它们一点儿都不怕行人，似乎已经完全适应了和人类共处的生活；我曾经在一个朋友家从28楼往外看，这个城市的植被覆盖率让我震撼，一眼望去除了城市必然会有的高楼林立，便是满眼的葱翠。除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外，最明显的感觉是这边的物价水平对于本地人（赚加币生活的人）来说实在是太sweet了。相对于收入而言，这里的生活成本之低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最简单的例子——这里的最低时薪是10



加币，4升牛奶的价格在6加币左右；中国人的最低时薪肯定不到RMB10，但是在中国买4升牛奶大概需要30块。对于这种差异我不想多做评价，但是确实给了我足够的动力让我好好努力尽量留下来。

回头看看，这四个多月是我人生中最丰富的一段时光，前途仍然未知，生活仍要奋斗。所以思绪翻滚，啰里啰嗦写了这么多，不过真心希望这些对打算出国的朋友有所助益。最后，我要说的是我想家，爱我的国家，也爱这个大学、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我有点纠结。说到这里，已经2011年了，所以送给朋友们，也送给自己一句话：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a new year. Maybe everything will just stay the same, but I know I will change, definitely.

[责任编辑：陈永]



## 此间的少女\*

2015年11月26日 文/蒋芳菲\*\* 阅读/64 点赞/0

**【编者按】**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在南开的四年，相信是众多南开学子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因为这里有汗水、有朋友，更有梦想。2011年的夏天，即将毕业的蒋芳菲学姐，写下了这篇文章，分享自己的心路与经验，与南开国关学子共勉。在这个寒冷的感恩节夜晚，《新视界》与你一起重读此文，感受那份追梦赤子心。

在这个躁动的毕业季，我似乎已经沉浸在即将离开母校的感伤中，而完全将申请保研时的紧张和折腾抛在脑后了。我舍不得每天朝夕相处的室友和热情善良的五宿阿姨们，离不开西南村各种物美价廉的小吃；我忘不了曾经悉心教导过我的老师们，忘不了曾经一起熬夜备考的同窗们，忘不了社团中曾经一起为了工作而废寝忘食的同事们，更忘不了那些总是有事没事就疯在一起的好朋友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南开在我心里不仅仅是我梦想起飞的地方，更成了我心中的另一个家。似乎这一切都与那个我曾经与之擦肩而过、却一直梦寐以求的北大无关，等我风雨兼程地走过来以后，才不禁感叹，时间果然和天使是一国的，真的都长了翅膀……咱们系刊希望我写一篇介绍保研经验的文章给学弟学妹们分享，接到任务后，我在心里翻江倒海，却实在不知道从何说起。其实真要说我的经验，不过是对这四年生活的一个总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前段时间看了北大拍的电影《此间的少年》，颇为感慨。经过数日的自我折磨，我决定将本文题目定为《此间的少女》，毕竟我也把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南开，自称少女应该并不过分，姑且在我变成昨日黄花之前，表达一下对这段“奋斗史”的缅怀，再夹杂些一个过来人的自我吹嘘吧，希望能对学弟学妹们有所帮助。

### 一、目标

保研以来，我不知不觉成了“知心姐姐”，有很多同学和师弟师妹遇到问题都会找我谈心。而我发现这些人其实都是很有想法有抱负的人，比起那些还在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人真的快了已经一大步。但是他们最大的共性就是没有明确的自我定位和一个明确可行的奋斗目标。

我认为，只有清楚自己适合什么发展道路(学术型或者学生工作型)，知道自己想要追求哪种生活方式，才能进一步规划该如何做。自我定位清晰以后，一定要给自己定好目标。这个目标可以是暂时的、短期的，也可以是一个大致的、长远的方向性目标，但是必须要有这个意识。如果只有一个大的方向，也一定要把它细化成一些阶段性的目标，这样才不至于空有抱负，却不知从何下手。有了定位和目标以后，我们会充满斗志，甚至往往会获得一些目标之外的收获；而没有目标的生活很容易就混过去了，最后回过头来可能什么也没得到。我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1年第2期。

\*\* 蒋芳菲，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07级本科生，2011年保送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研。





相信你们来到南开，肯定是为了更高的梦想，南开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舞台，但是如何表演下去，必须靠我们自己去规划。

直到现在，我似乎还能记得初来南开时的自卑，但我认为这种感觉也是支撑我在南开不断努力，不断突破自己的原动力。因为高考失误，我在父母与老师的信任和期盼中，无奈与北大擦肩而过。看着那些曾经不如我的同学都考进了北大清华，我心里很不服气。刚来南开时，心高气傲的我，看到身边同学一个个都“有两把刷子”，并不输北大清华的学生，我昔日的自信顿时被自卑和迷茫打败。加上对北方生活的不适应，我大一第一个学期一直处于迷茫期。但是，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开始跳出高考的思维，学会独立规划自己的未来，心态上也有了很大的转变。我认识到自己虽然也很外向，也参加了一些社团活动，但是重圆北大梦仍是我最大的梦想。所以要完成这个梦想，我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考研。于是，我从大一下学期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学习专业知识中，并尽早将学分修完，这样我在大三的时候才能专心备考。

## 二、坚持

“坚持”二字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难。光有目标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有所行动，并坚持下来。我也有很多事情因为坚持不下来而懊恼不已，比如练琴、减肥，每次都是坚持一段时间便放弃了。但是有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坚持的，比如梦想，因为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人生。我们有了梦想而不行动，那只是空想家；有了行动却不坚持，那是半途而废，同样是失败。

我在大一结束时就已经基本上修完了大学所有的学分(除了一门大二的专业必修课)。仅仅大一下学期，我期末就有 22 门考试，17 篇论文，这似乎都赶超了双修的“童鞋”们。我甚至还记得曾经自己是如何以连熬 4 天 4 夜复习 8 门功课，连续每天连考 3 门考试，每天写 2 万字以上的方式生活，在我考完最后一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时候，大拇指握笔的地方已经长出了一个好大的水泡，甚至疲劳得差点晕在二主楼门口。中途我也很多次想放弃：比如每天早上都要起早上第一节课，对我这个爱睡懒觉的懒虫来说真的太纠结了；又比如大一时我提前把大二、大四的课都选了，但是水平有限，有的课程很是棘手，张光教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我听了一个月还不知所云……但是每次想偷懒、想逃课、想放弃，或是随便应付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个未完成的北大梦，想起高考带给我的痛苦，我又会重新充满动力。就这样，从大一下学期到大一下学期，我终于坚持完成了任务。至于平均学分绩竟然在 90 分以上，甚至排名全班第一，这完全在我意料之外。当时并没有对学分绩有所期待，也不知道保研这回事。但是，这两年的奋斗岁月，留给我的不是漂亮的分数，而是那种精神。到现在，爸妈和我聊起来的时候，还在感叹那段所有人都觉得神奇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也的确佩服那个曾经像打了鸡血一样的自己，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我。虽然现在我已经如愿以偿了，但是希望这种精神还能够常驻心中。



当然，我并不推荐学弟学妹们像我这么高强度地学习，爱惜身体同样也很重要，但是我希望你们也能有这种奋斗和坚持的精神，为自己的梦想坚持下去，即使最终没有如愿，在奋斗中我们也能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即使最终以失败收场，我们也能问心无愧。所以我一直很敬佩那些为了考研每天早起去老图占座的同学们，我也亲眼目睹了身边很多这样的“神人”是如何百天如一日地坚持。当然，最终结果必然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但是我觉得一次考试不能代表一切，就像高考不是我们的终结者一样，其中既有实力的问题，也有运气的成分。我一直相信，不管结果是喜是悲，能够这么坚持过来的人一定是内心很强大的牛人，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而我相信这种精神，也会助他们走上成功之路。

### 三、勇敢

我们在时刻准备的同时，还需要有足够的胆量去迎接机遇和挑战，勇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多时候，机遇来临的时候是存在风险的，理性的行为人都选择规避风险。但是，当其他人都在规避风险的时候，如果我们能把握住机遇，勇于迎接挑战，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回想大学四年，我好像是很多只螃蟹的初尝者，味道也都还不错。的确，我很幸运，因为我碰上的都是味鲜肉嫩的螃蟹，没有碰上有毒的，否则我现在也没法坐在这里长篇大论了。

大一时，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早点修完所有课程，我不顾师兄师姐的劝告，拉着另外两个同学一起硬着头皮提前选了张光教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门连大二学生都很头疼的课。后来张老师告诉我，这还是第一次有低年级的学生提前选他的课。的确，他的课很难，第一节课看到 SPSS 这词和一堆必读文献就让我后悔当时不该逞一时之勇。但既然已经上了“贼船”了，就只好转型做“海盗”。一个月的云里雾里以后，我开始每次下课都“缠着”张老师问问题，直到弄懂才肯罢手。刚开始，张老师对我超长的反射弧表示很无奈，但是慢慢地他被我的执着和好学感动了，对我欣赏不已。所以当美国华盛本大学(Washburn University)准备和我院签约交流项目时，张老师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我。

然而，华盛本大学在中国人眼中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我们又是第一批交换生，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们提供经验。所以亲人和身边的同学都表示很怀疑，反对我参加这个项目。毕竟出国交流的成本对于我们这种一般家庭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究竟这个钱是否值得花确实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去了，那我准备考研的时间就大大缩短了，这与我的初衷确实是相违背的。但是出于对张老师的信任和对美国的向往，我还是在父母的鼓励下报了名。我当时就想，没人去过只能说明大家对这个项目不了解，不代表它就一定是不好的、没有任何含金量，至少我能好好学英语，说不定在美国还能遇到更好的机会。最后，我以综合成绩排名第一，和另外两个学姐一起成为了南开大学赴美国华盛本大学的第一批交换生，也是我们专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这也是我大学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可以说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就这样，我在美国度过了难忘的 20 岁。堪萨斯是个民风淳朴的地方，华盛本也是个很温馨的大家庭。我永远不会忘记 20 岁生日的时候，Living Learning Center 里所有的外国学生给我的惊喜。那时我初到美国，除了我的室友和楼长，我与其中大部分人都不熟，甚至都没见过。但是当我看到一张张白的黑的黄的笑脸时，当我尝到他们亲手做的冰激凌蛋糕时，当我听到那正宗美语版的生日快乐歌时，当我收到一张张生日卡片和一声声祝福时，我的眼泪就不争气地哗啦啦往下掉，所有思乡的加苦和路途的奔波劳累都被感动覆盖了。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得知我的生日，又是何时串通好精心设计这个局的，就连南开的两个学姐也是后来才得知的。那时我就告诉我自己，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我都不后悔来这一趟！

而接下来在美国的一年，让我不断地尝试着吃更多的螃蟹，也让我尝尽了甜头。我第一次认识了我的友好家庭和我的美国朋友们，体会到友情是真的可以超越国界、种族、性别和年龄限制的；我第一次尝到了地道的美国菜和墨西哥菜，发现没有中国的美食好吃；第一次去了教堂，感叹了装修的华丽，也知道了耶稣的故事，弄清楚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区别；第一次站在美国大学的讲台上介绍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第一次一边演讲一边教美国人做中国菜、写中国字，发现原来美国人对这个东方大国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却又不可避免地存在误解；第一次见到了堪萨斯州的州长、州秘书长、参众议会议员等上层领导人，发现原来美国的领导人都如此平易近人；第一次和美国人一起庆祝万圣节、感恩节、圣诞节等传统节日，让我有种想冲回家过春节的冲动；第一次打败美国学生，取得全班最高分而让老师赞不绝口；第一次因为论文的语法错误和拼写错误比美国学生少而被表扬；第一次因为各科全 A 而被校长授予“学术成就奖”……这些都让我体会到了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的自豪感。

2009 年 11 月，一次偶然的的机会，我有幸见到了 11 在竞选堪萨斯州长的美国前任参议员 Sam Brownback。他还答应让我成为了他竞选委员会中的成员，帮他做一些宣传工作，工作照片甚至都上传到了他的官方竞选网站。虽然为他工作的时间很短，但是他让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美国领导人，让我对美国政治也充满了好奇，更为我后来得到千载难逢的实习机会做了铺垫。

2010 年 1 月，堪萨斯州的立法会期开始，议员们都进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期。在 Sam, 华盛本大学教授 Dr. Bob Beatty 和我的友好家庭 Doug Hencle 的共同推荐下，我终于成功地得到堪萨斯州议会的实习机会，担任众议院多数党副领袖 Rep. Peggy Mast 的助理。这是堪萨斯州议会第一次接收中国留学生作为实习生，也是第一个在议院核心人物身边工作的外国人。在实习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同时也解除了一些议员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误解。我回国之前，Rep. Mast 主动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她说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对我表示感谢，也希望能对我有所帮助。她说我改变了她对中国的印象，而且以后还会继续接收中国人做她的助理。当我拿到那份沉甸甸的推荐信时，热泪盈眶，我想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中国人的肯定。我只是一个开始，我相信还有更多更优秀的中国人能够获得这个机会，也希望他们能够在那里更好地展现自己，展现我们中国人的能力。



回国后，当我知道有资格申请保送北大研究生以后，其实也有很多人劝阻。有的人觉得以我的条件，可以申请国外更好的学校，去北大可惜了；有的人说以往我们专业没有成功的先例，竞争太激烈，我如果孤注一掷，只申请北大太冒险了；也有的人说我申请得太迟了，又没有和导师联系，比起那些早就“有备而去”的人，我就这么冒失地申请，成功率几乎为0……我一直觉得，很多事情都像小马过河，我们自己不尝试一下，永远不知道结果。当时我就想，如果我努力了却失败了，我也没什么好遗憾的，因为我尽力了，毕竟我已经为这个梦奋斗二年了。而目虽然我没有申请保送其他学校，但我并不是孤注一掷，等保研结束，如果没有录取，再准备申请香港或者国外的研究生也是来得及的。但是如果我现在选择放弃，那我一定会遗憾一辈了。所以我还是决定再次做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递交了申请。从网上申请到递交材料到通过初试，再到笔试和面试，最后到公布结果，总共经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当我得知自己以面试排名第一，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被录取时，我再次庆幸自己当初决定吃了这个螃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实力，更是勇气。别人没做过的或者没做到的，不一定我们就做不到。就算我们没做到，至少我们试过了，不会遗憾。如果连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那就连成功的希望都没有了。往往打败我们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我坚信，机会永远只给有准备的人，机遇永远只给有勇气接受挑战的人。

#### 四、心态

一个好的心态其实包括很多方面，如果我们想取得成功，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内心。我不敢说自己已经成功，只不过圆了一个梦而已。但是这四年来，我觉得自己最大的转变就是心态的转变，这也是助我重圆北大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我有的时候不禁感慨，当我们一心一意去做某件事情而不计较得失的时候，结果往往会比想象中要好，甚至会得到意外的收获。但是，关键是我们必须把心态放平，如果总是患得患失，不仅自己活得很累，结果也往往只是差强人意。

有的时候我也会感谢高考时摔的跟头，它带给我的其实并不仅是负面影响，它不仅对我进行了挫折教育，更让我学会改变过去那种患得患失的心态。患得患失，从某个角度来看，其实也是不够自信的表现。

我试着分析为什么当初会出现失误，抛开身体不适等客观因素，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我的心态不够好。但是经过四年的反省，我学会了试着把眼界打开，把心放开。客观地说，南开也是闻名世界的高校，并不比北大差多少，很多方面甚至比北大好，我这个“失误”在许多人眼里可能已经很好了。去不了北大，不代表我不优秀，也不代表我以后都不能成功。过去的我并不知道这么想，好像去不了北大天就要塌了一样。四年后，虽然重圆北大梦仍是我的目标，但是我不再患得患失，即使失败我也不再有那么大的心理波动了，因为我清楚并不是每个目标都能实现，只要我一直在努力就不后悔。



这次申请保研能成功，并不是我比那些竞争者实力强多少，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的心态比较好。说实话，一十几名进入复试的学生中，基本上都是各个学校的第一第一，我觉得实力没有太大差异。记得我们当时复试的要求是，必须笔试和面试都在及格线以上，然后再根据总分排名，取前五名。但是当天上午几考完笔试，可谓哀鸿遍野，很多人都空了好多题。我也发挥得不是很好，50道填空题，一分一题，我至少有一半不确定答案。但是我想着我不会的别人也许也不会，尽力了就好，所以心态也没有多少波动。但是下厂！几面试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状态都不好，甚至很多人觉得自己笔试肯定及不了格，干脆连面试都想放弃。

我想借此重新回顾一下面试的过程，或许这对将来想申请保研的同学会有一定的帮助。下午面试的形式是单独抽签答题的形式，每人大概有10分钟的答题时间，然后5位考官再针对考生的回答进一步提问，直到考官满意为止。每个人有两次抽签机会，第一次抽到的题目如果没有思路，可以选择放弃，但是这就意味着不管第一次抽到什么题目都要回答。所以很多人在对第一题有一些不完全的想法时，都会选择坚持回答第一题，因为这样可以降低风险，至少可以边回答边思考，万一第一次抽到的题完全不会，那就注定失败。

我第一次抽到的题目大概是要求用国际关系理论解释《三国演义》中的某次战争（具体的战争我不记得了，但是肯定不是赤壁之战这类耳熟能详的战争）。一看到这道题我就傻了，因为我对《三国演义》完全不感兴趣，只对大概的史实有所了解，也不知道那个战役的具体细节，所以更没办法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解释（虽然有找借口的嫌疑，但是好像女生对这种打打杀杀的故事确实都不是很感兴趣。后来听说北大的一个女生也抽到了这题，更痛苦的是这是她的第二题，所以她很悲催地被淘汰了……可能换个对三国有研究的男生抽到这题会很开心吧）。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道题。不过，当时真的挺紧张的，万一再抽一道这种完全不知道的，那我就可以直接收拾行李回天津了。重新抽的题目是：在当今社会，中国是否应该继续韬光养晦？其实这道题不是很难，虽然短时间内没有很完整的思路，但相信学过国际政治的同学都能胡诌几句。看到题以后我也算轻松了一些，但是考官连一秒钟的准备时间都没给我，读完题目就让我作答。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开口就说：“我觉得是，主要有二点原因。”（其实当时还只想好了一点原因）然后边说边想，边想边说，好不容易凑齐了二点。然后又说：“但是我们也不能一味隐忍，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强硬。”（一般这种问题都不适合绝对性的回答，容易让考官钻空了）接着又举了一些例了，还引出了当天刚刚发生的钓鱼岛事件，发表了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好不容易答完以后，考官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狂轰乱炸”，特别是中间的主考官一直皱着眉头，不依不饶地和我展开辩论。我也毫不示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直到我看到她被我说得阴雨转晴，最后满意地点点头，笑着目送我离开考场的时候，我才终于松了口气。那一刻，我的第六感告诉我，应该有希望。整个面试持续了15分钟，虽然也有危机的时刻，但总算是有惊无险，加上我心态一直比较平稳，后来慢慢也不那么紧张了，所以发挥得也还算不错。



最后分数出来以后，我发现结果充满了戏剧性：我总分排名第一，而这全得益于我的面试成绩。我的面试成绩以 87 分遥遥领先，而笔试成绩其实是前五名里面最低的，甚至后面还有几个同学笔试成绩也比我高，只是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笔试发挥得不好，心态出现了很大的波动，下午的面试都没有发挥好。如果我当时考完笔试，也像他们那样没有了信心，或者遇到考官的刁难就慌张失措，很有可能现在被录取的就不是我。因此，有时候我们需要用一点阿 Q 精神来自我麻醉，这不是自目自恋，而是在关键时刻给自己鼓劲加油的一种方式。只有我们自己相信自己，别人才有可能相信我们。

### 后记

保研已经告一段落，幸福的大学四年也马上要画下句点。虽然我终于重圆了北大梦，但是保研过程中也反映了我的很多不足，我也一直在自我反省，自我改进。对于我来说，这还只是个逗号，前方的路还很长。四年来所有的奋斗和光环将停在昨天，明天还有更多的挑战等着我。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曾经关心、鼓励、支持和帮助过我的亲人、老师和朋友们，献给正奋斗于南开各个角落的师弟师妹们，也献给此间奋斗过的自己。希望大家都能梦想成真，一切顺利！

[责任编辑：董柞壮]



## 伯克利旅读\*

2015年11月29日 文/王萌\*\* 阅读/36 点赞/0

**【编者按】**一场异国的旅读会带给你怎样的惊喜与挑战？本期《新视界》与你一同回顾王萌学姐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暑期班的夏日之旅，分享她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

2010年底，我偶然在BBS上看到国际学术交流处发出的伯克利暑期课程的通知，觉得大学三年生活甚是平淡，也希望出去见识一下天地，于是，2011年的暑假就跑到了加州伯克利，度过了非常难忘的一段日子。说是旅读，其实不太确切，课程安排得紧，考试又极为繁多，若想玩得尽兴，非逃课不可。选了两门专业课的我，第一节课上就被教学计划吓细了胆子，于是我拔掉了原来插在加州各景点上的小旗，果断改成旧金山深度游。

伯克利是一个小城市，在地图上看到要比旧金山的字号小上两圈，可是小城市丝毫不妨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一所国际一流大学，伯克利的“死对头”斯坦福大学，则更是建在一个幽静的小镇上，静谧、祥和，也许这是能够安心做学术的要素。

暑期课程是将平时15周左右的课程集中安排在6周中上完，内容、考试以及作业与实验完全15周制的学期相同，建议以后来学习的同学选一门专业课加一门通识课（E类课），这样才会游刃有余。我当时选了两门专业课，导致后来我的日历上每天都是DUE DUE DUE，终于有一次记错了考试时间，收获了一个非常杯具的分数。

不得不说，美国大学的教育的确与众不同。首先从最终成绩的组成来看，伯克利的成分非常复杂，拿我选的组织行为学来说，课上参与（10%，课堂测试投票，用的是一种IClicker，可以即刻看出全班选择的分布），两次考试（50%），调查并研究感兴趣的企业任何一方面特质最后写出报告的小组作业（20%），自我评价报告（15%），实验参与（5%，共4分，大概要参加8个实验）。看了教学计划，就知道在这里学分可真不是好混的。我所在的小组共五人，除我一人是中国人外，还有3个美国人和1个荷兰人，他们个个雄心勃勃要拿到A，小组作业尤其认真，前前后后我们讨论了6次以上，并且全体出动特意赶到旧金山，在鼎鼎有名的Jones day律师事务所做采访，最后每个人按照分工完成自己部分的写作，又一起讨论、修改，才交上了一份最终的报告。虽然任务看起来并不难，但是小组中每个人都丝毫没有因为这是暑期课程而混学分搭便车的意识，虽然小组有5个人，但每个人都一丝不苟地去共同完成这份小组报告，所以任务虽小，但是收获颇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次，考试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我两门专业课，6周内考了5次试，还不包括各种报告，文章还有实验，在国内文科生的生活比较“安逸”，很多人一个学期不上课，考前痛苦一周搞定唯一的一次期末考试，学分就已到手，可是在伯克利平均下来2周一次考试（几门课还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1年第3期。

\*\* 王萌，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08级本科生，于2011年暑期参加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UCB）的暑期班项目。



会叠加在一起），两周一篇报告，再加上其他实验，每周都没有办法闲下来，被逼无奈天天看书，课课复习，老师也不怎么按 PPT 考试，所以国内的投机取巧的办法全都废掉。老师也真算得上是孜孜不倦，一门课三次考试，每次考试卷子就要出上一沓，订起来每人一份，即使是偏文科的科目，也全然不是国内的两道论述题题干每题一行的简单样子。我老是和同学笑说，大三下学期省下的考试，这 6 周全补回来了。

第三，这边有专门的学习中心，写论文或写作方面有困难的同学可以预约写作教师（是写作能力较强的学生，算是勤工助学，但是费用学校埋单），有不懂的知识点还可以预约时间请教。图书馆里有很多独立的小自习室，一张桌子，一个小黑板，可以小组讨论的，这个提前预约也可以得到，每周定时的 OFFICE HOUR，也可以直接向老师请教。总的来看，虽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公立大学，资金一直很紧张，但是学校却丝毫不吝惜这些教育资源的投资，对学生相当贴心。很多图书馆可以开到晚上九点多，地上几层加上地下几层，藏书甚多，自习的位子也甚多，很多次在图书馆复习到关门，离开的时候发现虽然是假期，但是依然有很多人苦读。

当然，除了大学教育之外，伯克利校园里还是有很多道奇异风景的，在 SATHER GATE 前（有点类似学校的大门）总是有一位虔诚的基督教老人，每天支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世界末日倒计时（82days, 81days, 80days）。据当地的学生说，老人在这里好几年了，于是我就好奇天数记完了他怎么解释呢，老人非常热情，在亚裔众多的加州竟一眼看出我是中国人，用结巴的中文朝天喊了一句：“耶稣，爸爸！”再远一点的地方，每天会有各种派别的支持者发传单，比如支持巴勒斯坦一派就和支持以色列一派的民众对立而站，你要是接了其中一边的传单，马上另一边定会塞给你他们的宣传卡片，甚是认真地讲述着巴以的血泪史，到现在这些传单我还留着，每每看到，就会觉得任重而道远。要是赶上周末，还能看到家族乐队的演出，黑人爸爸妈妈和几个孩子，带着非洲特有的那种热情和奔放，在路口支上简陋的架子鼓，妈妈唱歌，爸爸打鼓，孩子们吹着各种乐器，那种热情一下能够将路人从头到脚都“点燃”，如果旁边卖三明治的巴西大叔出摊儿，那就更欢乐了，大叔的车画得都是一副热带雨林的樣子。

在伯克利，校园里，人人都喜欢穿伯克利的校衫，这边的伯克利周边产品从来不愁卖，各种各样，在校园里觉得心里暖暖的。校园外，人们过得都很悠闲自得，虽然并不一定富裕（乞丐遍地都是，但是有人还养了两条狗，有人就静静地坐在地上看书），咖啡店总是爆满，但是很安静，学生喝咖啡做作业，老人们聊着天下着棋，更多的人坐下来聊家常，但是却一点不聒噪，让我非常喜欢。

我一直认为，人在年轻的时候要有一段异域的生活经历，至少也要在国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一次学习，都是一次旅行，每一次旅行，也都是一个学习。

[责任编辑：李金潼]





## 踏上环球之旅\*

2015年12月5日 文/冯彦翔\*\* 阅读/47 点赞/0

**【编者按】**世界上有这样一所“大学”，它的校园不在陆地上，而是浮动在茫茫大海之中，在一艘环游世界的游轮上；它的学生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其中不乏牙牙学语的小孩和耄耋之年的长者。2012年1月20日，美国船舶教育学院(Institute for Shipboard Education)和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组织的第108届“海上大学”(Semester At Sea)从巴哈马首都拿骚起航，在105天的时间里，这艘名为MV Explorer的游轮搭载了570位本科生，79位终身学习者和38位教授环绕地球一周，并访问12个国家和地区。今天，《新视界》与大家分享一篇来自第108届“海上大学”学员冯彦翔的文章，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神秘的“海上大学”。

当我刚进入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接受新生训练时，我的辅导员为我的专业学习设计了一个学期的“海外学习”计划。由于我是会计专业，我相信未来我会旅行到许多国家，因此我特别想要在大学期间进行一次环球旅行，去了解各地的风俗民情，品尝当地的美味佳肴，这也是我从小梦想，就像麦哲伦等伟大的航海家那样，去探索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环游世界不光可以拓展眼界，也能学习到许多新的东西。当我提出自己的想法时，我的辅导员就推荐我去咨询“海外学习处”(Study Abroad Office)的人。由于查普曼大学是“海上大学”(Semester At Sea)这个项目的赞助方之一，我得到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其中最让我喜爱的是一个关于海上大学的光盘。通过它，我看到了世界各地最具代表性的事物，我因此深受感动，并下定决心一定要申请这个将会影响我一生的航行。

由于海上大学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海外学习项目，我必须提前一年就开始填写各种申请表，并完成数篇论文。在2011年春天，我提交了所有的申请材料，并开始每日祈祷神佛耶稣阿拉能显灵。或许至少一位听到了我的祷告，在6月中旬时，我终于收到了肯定的答复。当时我简直兴奋不已。数个月来辛苦写的论文及填写的数据终于有了回报，很快查普曼大学的海外学习处又给了我更多关于海上大学奖学金及工作的机会。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在船上行政处的工作。我想，在行政处工作应该可以认识到各种各样的人，与他们闲聊并了解他们的生活故事会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啊，我提交了履历表后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其间参加了许多查普曼大学举办的座谈会，从学长学姐的经验当中，我少走了许多弯路。未来我一定会将我的经验讲述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2年第1期。

\*\* 冯彦翔，男，出生于台湾，美国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会计学专业2009级本科生，2012年春季海上大学学生。



给学弟妹们。终于在10月中旬，幸运女神再次眷顾了我，我收到了肯定的回复，并将提前一天上船熟悉各项工作以及帮助其他学生的登船作业。

终于，是时候展开崭新的一页，我在巴哈马登上了MV EXPLORER(我们的大船)，近距离观看这艘船时才感觉到它的雄伟。600多尺长，7层楼高，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踏上如此巨大的船，以致于我永远都记得行政主任的一个笑话：“这不是一只舟，这是一艘船(it's not a boat, it's a ship)”。第一天在船上遇见了我未来二个半月的“领导”Kelly，她是一个很风趣的人，我那时想未来工作时不可能会无趣了，她带着我与我未来的同事参观了行政处。办公室虽然小，倒也错落有致。傍晚，许多家长来船上关心子女们的未来生活，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满意的笑容，我也趁机吃了一顿特制的晚餐，果然美味。临睡前，我满怀期待第二天的到来。

一大早，所有的工读生(work-study student)都集合在Union并分配工作，我分配到了维持队伍秩序的项目。数着长长的队伍并与学生们天南地北的闲聊，有的二五成群，有的独自一人，每人脸上都写着期待、紧张、快乐等等各类情绪。我又何尝不是如此？认识的人数增多后，才惊觉原来学生们来自于世界各地，有来自于中国、香港、越南、法国、墨西哥、巴西等等各个国家和地区，如此的多元化，我想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在第一天就感受到文化上的冲击。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一大半的航程，我仍然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即将到达的城市感到兴奋。在每趟旅程当中，我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感受到不同的文化，吃到当地美味的特色食物，这趟环球之旅让我眼界大开。现在，我正在越南搭游览车返回船上，二天后，我将到达香港，这个传说中美食的都市，并踏上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大陆。

海上大学官方网站：<http://www.semesteratsea.org/>

[责任编辑：孙迪、陈冲]



## 那些年，一起上过的国关\*

2015年12月6日 文/陈冲\*\* 阅读/467 点赞/9

**【编者按】**新视界创始人首次公开披露南开求学岁月及新视界“创业”往事：大三了，如何快速提高学分绩？如何“正确地”学习国际关系学科？学分绩足够，该保研北大还是留学美帝？新视界是怎么创立的？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和许多当下正在纠结填报志愿的2012级弟弟妹妹一样，我高考志愿也是填的“经济学”、“金融学”等所谓热门专业，“国际关系”这四个字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我的志愿书上。那时对于突然闯进生活的这个专业，我没有任何的概念，没有任何的准备。直到进入南开后的前半年，我还在想，“也许应该想办法转到经济学去”。这倒不是因为有多热爱经济学，或者多么讨厌国际政治，事实上，那时对经济学的无知远不下于国际政治。只是因为对于高考录取的“阴差阳错”不甘心，而且那时同样不甘心的还有南开这个最终归宿，毕竟当年心中也有一个“P大”梦。我大学的第一学期都在这两种不甘心的纠缠下郁闷度过的，也在想着有朝一日要变这个“阴差阳错”为“得偿所愿”。那一年，是2006年。三年之后，当我一次走进张老师办公室，他老人家问我“为什么想要继续念国际关系研究生”时，我还记得自己是多么激动地告诉他，“多么庆幸，当年‘阴差阳错’地进入到‘国际关系’而不是‘经济学’；多么幸运，进的是南开而不是‘P大’。”那一刻，我觉得南开国关人这个标签是多么骄傲和自豪。那一年，是2009年。又过了三年，在船上一位美国教授问我，毕业以后想要（在国外）念什么专业时，我还记得自己说出“**There are many ways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but Political Scie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de the most sense to me**”这句话时，内心的那种崇敬和颤抖。

### 一、阴差阳错的美丽

大一入学之初，尽管对这个专业（乃至这个学校）有着诸多的不甘心，但自己骨子里那种“安于现状”和“得过且过”的思想终于还是说服了自己。那时，虽然觉得迎水道校区比不上高中母校漂亮，虽然觉得学国际关系以后可能“赚”不了大钱，成不了“富二代”或“官二代”他爹，但自己开始慢慢地被南开国关所独有的气质所吸引，尤其是把校区图书馆里关于周恩来学长的传记和南开校史的书都看完之后，觉得身在这样的学府，真的很幸运，也开始心安理得地接受命运所给的这样一种阴差阳错的安排。南开的精神和品格开始慢慢渗入自己的血液，并融为一体。也正是这种感觉，在2009年保研时，即使得知自己有机会申请去“P大”时，我依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继续留在南开。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2年第2期。

\*\* 陈冲，男，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2012届硕士毕业生，《新视界》创始人，现Ph.D就读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



那时，对国关知之甚少，只是觉得，既然是自己的专业，就应该尽量学好，哪怕没有太多的热情；只是觉得，作为国关学生的“本职工作”，应该尽量做好。也许就是这种想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信念才是我自己走到今天的最大动力吧。直到最近，当有师长听我说不打算念博，还满怀“遗憾”地劝我，“你做得不错，也发了那么多核心，圈子里也开始熟了，不念博可惜了”。我还是这么回应，没有什么可惜的，如果说在南开这几年学到了什么东西，有点“成果”的话，那全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如今看来，就连这些本职工作做得也还不够），如果我当初念的是其他专业，我想也一样会去尽力做好。既然命运给了你这样的选择，不管喜不喜欢，先善待这个选择吧，这样才有资格去言谈改变。

在被南开吸引的同时，开始慢慢地学会了如何更好地接受属于自己的真实。而人一旦接受了属于自己的真实，就真正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了。抛弃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再浪费时间去YY，而是变成了脚踏实地。于是，从第二学期开始，开始关注国关圈子里那些大师，名人传记也被达尔、摩根索、沃尔兹、卡尔等的著作所取代。那一学期开始了在图书馆里的“蜗居”，热心起国关圈子里的各种“八卦”。那时，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里。慢慢地，开始了解了这个学科，了解学术的庄严。

还记得，当时为了写好王老师《中国对外政策》的期末论文，每天下课后就直奔本部老图，去“扫荡”期刊（因为那时根本就不知道还有电子期刊这回事，这大概也是我们2006级的悲哀吧，说真的，我们那一届是上缺学长学姐的关爱，下缺学弟学妹的关心，很凄惨）。足足花了2个月时间在老图里翻阅期刊，基本上把自己所选主题的国内近10年发表的文章都仔细看了（那时还没有外文的概念，直到上了大二），然后用先手写的方式把初稿写出来（我们那时大一不允许用电脑），反复修改，是真正的“手稿”，而且2万字的好几稿。那应该是大学里最认真的一次对待论文吧（之后写作的那些论文，肯定比不上那一篇论文认真和严肃）。也正是那一次经历，开始慢慢地打开视野。我也清楚地记得，韩老师说：在以后遇到一个问题时，你们要有一个视野，知道南开是什么样的，知道天津是什么样的，全国是什么样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上了大二，知道了学校的外文数据库，也开始明白国内外的差距。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丢”掉了几乎所有的中文文献，并“固执地”认为，CNKI上80%的中文文献都是“垃圾”，同样花那么多时间阅读，为何要看一些垃圾呢。在那以后，阅读的文章基本上都变成了英文。虽然那个时候，真的很痛苦，但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而且还养成了收藏期刊文献的习惯。用刘丰师兄的话说，就是把自己的电脑“变成”一个图书馆——用了将近2年的时间，把我们国际关系的20余种主流期刊1980年以来的文献全部不落地“荡”了下来，如今这项工程已经成为我们《新视界》编辑部的一项重要课题了。因为每一篇文章都是自己亲手下载的，在那以后不管谁聊起什么研究话题时，基本上都可以说点，“哦，那个杂志，大概什么时候发表过类似主题的研究”。而且，慢慢地，也找到了自己的“领域”，开始觉得国关还是有一点意思的。

## 二、未完成的路



大二结束之后，花了一个暑假在学校里规划自己的未来，当时下定决心要把自己“奉献”给这个行业了。既是如此，就应该开始为自己寻找独属的“研究”（学习）领域。我们有句古话，“求其上者，方得其中”，既然要选一个领域（如果必须的话），那这个领域就应该是国际上的前沿领域，并且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那时，在阅读外文文章的时候，我发现许多文章都与数学有关。正好由于自己历史的积淀太浅，又有点想走捷径的懒惰，渐渐地开始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定量研究方法上，而那也是中国国关界薄弱的地方。由于国际关系里定量研究方法使用最多的是“国际冲突”领域，所以很自然，自己对这一领域也特别的“感冒”。

不过，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对于如何学习国际关系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说实话，我们学国关的孩子真是伤不起啊。要学好国际关系，首先要有一种十分淡定的心态——在浩如烟海的外文文献（由于质量原因，中文基本可以忽视）面前，要有一种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坦然。要告诉自己：不就浩如烟海的文献么，**just do it!**当然这只是第一步。要赶上西方，首先就要把别人的东西都学好学透，而这基本上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至少，我觉得国内至今很少有人“通”了）。然后，还要广泛阅读，不仅仅是国际关系专业的文献。要懂政治学理论、历史、政治地理、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数学……当然外语就更不用说了，你要是只会一两门外语（还得流利），都不好意思跟人说你是学国关的。（看国外那些教授的 CV，大多都写了懂 6-7 门外语啊，你就明白了）。回过来一看，任何一个领域精通了，放在社会上至少也算是“专家”了吧。所以说，学国关的上辈子都是折翼的天使。

也是在大二结束的那个暑假，终于彻底放下高中时就怀揣的“P大”梦，开始思考是否应该到国外去接受更系统严格的训练。很快，给自己下定了决心，从此走上了一条“飞跃重洋”的道路。只是，没有预想到的是，这条路走得异常艰难和曲折，如今四年过去了，眼见当初与自己一同奋战的飞友们一个个都出去了，有的都拿完学位回来了，而我还在这一条路上艰苦地爬着。不过，我至今没有后悔过这个决定，因为在我看来，这条路的要求要远远高于保研到“P大”之类的选择，而结果自然也是最诱人的吧。还是那句话，求其上者，方得其中。一旦做出了这个决定，弄清楚出国的要求，我知道，一切都要做得完美才行。比如，大二结束时的 GPA 并不太高，于是大三那一年额外多修了 20 多个 D 类课学分以求弥补。那一年的 GPA 到了 94+，整个本科的绩点一下子也都提高了。如果不是有出国这个目标，我是不会这么疯狂地去在乎 GPA，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高的 GPA 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是多余的。又如，开始准备 GRE 和 TOEFL 考试，那一年（一直到现在），英语的学习（和考试）占据了大学的核心，尽管做得也不算好，但至少，如果没有这个机会，英语肯定会比现在烂很多。又如，为了使得简历看上去更加漂亮，开始专注于学术“研究”，开始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上各种培训班，尝试发表论文，开始慢慢熟悉这个圈子。又如，开始搜寻学校的时候，也有机会对美国大学的政治学系（国际关系）做一番细致的考察，并因此更加明白了这个学科的现状。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结识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战友，看



到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见识到了比自己想象的更宽广的世界、更高的平台。如果没有当初的那个决定，也不会走到今天。至少，如果没有那么强烈的出国之念，在去年张老师告诉我 SAS 时，我就不会那么强烈地去争取，想出去看看这个世界，圆一下当初的那个梦想。昨天看到复旦大学的唐世平老师对陈永师兄的忠告里一段话，觉得正好表达了出国之于我的心境，我擅自引用一段：

当然，你还应该去看看世界：你不看到发达国家的发达以及它们发达背后的原因（尽管它们现在好像很痛苦），你便不容易懂得中国离发达国家的距离有多大（我个人觉得：东部 20-30 年，中部稍好的地方 30-50 年，西部也许 80-100 年），便容易自我膨胀（尤其是做国际关系的人）。你如果没有去过不发达的国家，又容易对中国失去信心和希望：中国在过去 的 30 年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过，经历过 20-30 年高速增长的国家事实上很多，但不是每一个这样的国家都已经成了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的路还很长、很难。]

出国这条路，我走得很曲折，如今一切又回到“原点”，但这 4 年路上我看到了许多很难轻易看到的风景，也更加学会了如何去保护自己的梦想，开始越来越相信很多简单的道理，懂得了坚持不懈的重要，也会发现自己拥有无穷的潜力，每天都在被激发出来。有一天，回过头来一看，自己都不敢相信能够坚持下来。即使前路依然艰苦和漫长，但是身边还有那么多跟我一样在这条路上前行的人，还有那么多给我依靠的肩膀，给我祝福的笑靥，没有丝毫的孤军奋战之感，并相信，老天最后肯定会给自己一个最好的安排，最好的结局。用一位飞友的话，“因为当你启程的时候，你便知道这条路也许只有艰辛，也只有艰辛，才证明了你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只有艰辛，才证明了你向上天索取了一个拥有很高价码的梦想，而老天正在向你收回为了这个梦想你需要付出的努力。”在国关这条路上，我乐于这样的曲折，乐于停下来欣赏沿途的风景，时不时停下来问问自己，“我今天的努力是否配得上我那一个美丽的梦想”。

### 三、我的“新视界”

在南开的这些年，感觉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和大伙办起了这份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新视界》。以前在南开的时候，常常感慨她资源稀缺，她的各种不好。但既然这是自己的母校，除了抱怨之外，更多的还是想想应该怎么把她建设得更好——而南开的真正好，还是在于她的学生，也就是我们自己。还是那种本职工作之念使然，当时觉得，只要每个人把自己的本职工作都做好了，南开国关自然也就好了，我们也更自豪了。当时王翠文老师将我们几个人叫到一块，商量着怎么把一份班刊升级为系刊。说实话，我们当时几个对于系刊也完全没有概念，唯一有的就是一个共识：我们要借助这个机会把这份杂志变成我们自己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我们相互交流思想，共同鼓励进步，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将它变成一份人人引颈期盼的杂志，把我们在编辑部的合作变成大家大学期间最引以为豪的共事经历，让我们的编辑部成为优秀和进步的代名词。也正是有了这个共识，我们大家真正去努力做到严谨、认真和精诚合作。当时的我们也不见得比现在“闲”，但大家在系刊投入



上表现出的那种 commitment 让我至今觉得那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团队。其实，在编辑部里做事，学到的如何编辑文档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锻炼自己如何专注于某一件事。我从来就觉得，做系刊是一件互惠的事，不要去想它会给你什么东西，除非你对它真正地付出了，那么它自然会让你收获到超出自己预期的东西。这两年来，可以说系刊伴随着我成长，和两年前的自己相比现在完全判若两人。通过系刊，我所得到的远比我在课堂上学到的多得多。也正是这样，我开始将系刊的工作内化到自己平时的生活中。这两年几次出外开会“打酱油”，遇到许多外校的老师 and 同学，他们都知道我们学生自己办了份杂志，说做得还不错，都羡慕我们南开有这样一份刊物，有这样一个团队。这些感觉可能身在南开不会觉察，等走出去以后，从别人羡慕的眼神中也许一下子就体会到了。在中国大学的国关系里面，还没有一个像我们这样可以把本科生和研究生如此凝聚在一起的平台呢。

在南开六年深有体会，我们的学生视野太窄了。如今有了这个系刊，我们就要通过它去打开另外一个世界，通过它去弥补我们在南开本身存在的不足。这既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也是对系刊的要求——因为我们要不断地往前看，向前走，这也是我们进步的一种动力。系刊这个平台究竟有多大，它究竟可以打开怎样的一个世界，这需要我们自己用行动来回答。这两年，通过《新视界》，我们也在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关系——我们的老师无私、鼎力支持、引导让我们倍感温馨；《新视界》也深刻地打上了我们南开国关特有的印记，不肆张扬，稳重厚实。通过它，外界也在重新认识我们南开国关。现在她开始兴旺发达起来了，而我也马上就要离开她了。不过正如王老师曾说的那样，她就像大家的孩子一样，不管以后身在何方，都会始终关注着她，为她的任何进步而高兴，为她出现的问题而担忧。编辑部这个团队，他们是我见过的最有活力、最有希望的团队，一起共事的那些日子将注定是我人生中最愉快的合作经历之一。

#### 四、再别南开

如今，就要毕业了，回首这些年，在南开的日子，突然觉得是那么的庆幸。在这里，我接受了不亚于国内任何学校的专业训练，它给了我充分的自信；在这里，我遇到了令人崇敬的师长，他们言传身教，教给了我为人之道，治学之方，教给了我如何去寻找、保护自己的梦想；在这里，我找到了一个走向世界的平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骄傲，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和坚定；在这里，我遇到了那么多的“化石级”兄弟姐妹朋友，这一生的情谊，大概就是6年最大的收获吧。

这6年的南开岁月，给了我太多的收获，给了我太多值得铭记于心的感动。这几年来，这句话一直激励着自己：“to whom much is given, much is expected”。是的，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都是为了让其他人的生活过得更好，更快乐和更幸福。这大概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所在吧。那天，一位学长告诉我，“你是南开人，你毕业了，离开了南开，就要不顾一切地防止自己滑向平庸”。可以想见，这也将是一生的课题，这是我们南开国关人应该有的骄傲吧。



之前一位外国老太太给我说，你们中国人可能是由于文化的原因，似乎不太喜欢当面表达自己的感情，太含蓄、太矜持了。不管是不是如此，最后，我也一定要借着这方寸之地，向这6年来给予知识、教育人生的师长和朋友表示一下感谢：谢谢你们让我在南开有了一个精彩的国关，谢谢你们这些年一路相伴。

首先，我想感谢我的导师张睿壮教授。我从2009年开始在张老师门下学习国际关系。三年多来，张老师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和关心，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了更好地帮助我成长，张老师还竭尽全力为我争取到2012年春季“海上大学”的环球游学项目，让我有机会陪同他一起环游世界，在异国文化中不断磨练、提升自己。在海上“漂流”的那些日子，张老师不仅经常鼓励我积极参加船上的各种活动，努力抓住一切机会锻炼英语，他还在繁重的教学之余对我的生活方方面面给予关心。只是，不争气的我常常“师门辱教”，每每想起，羞愧难当，自觉愧对恩师教诲。谢谢张老师给我一个改变终生的航行，为我打开了一个无尽宽阔的世界。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我将时刻怀揣着对恩师的感激，继续无畏地探索未来的世界。

其次，我要感谢南开国际关系系诸位老师多年来的悉心培养。他们用自己渊博的知识，严谨踏实的作风，言传身教，在我身上深深镌刻上了南开特有的风格，让我在南开的六年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最无悔的时光。对吴志成老师、韩召颖老师、赵龙跃老师、王翠文老师、黄海涛老师、刘兴华老师、徐振伟老师给予的帮助和关心，我时刻铭记于心。诸位老师为人谦和，而且对我们晚辈非常提携，为了我们“南开国关”这块金字招牌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身在其中的我们却常常意识不到，走出南开的时候，才从清华、北大、复旦等校兄弟专业学生羡慕的眼神中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的国关系是多么让我们引以为豪！母校诸位老师的栽培之恩，将是我以后不断前行的动力。

在南开的六年，我遇到了诸多学长学姐和同窗好友，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是我大学最美好的记忆，我也因此常常忘记千里之外求学的孤独，并乐不思蜀。我要特别感谢我亦师亦友刘丰师兄，他不仅亲手为我打开了国际关系研究这扇大门，而且在我的生活学习等方方面面提供了最大程度的帮助，令我感动之余常常心存愧疚；谢谢刘若楠师姐、陈永师兄、左希迎师兄、毛维准师兄、高婉妮师姐、周舟师姐等在生活和学习上的关心；谢谢我的室友鹿献策、云曙明、李志亮，他们这三个“化石级”的好男人在我人生的各种关头都坚定不移地支持我，让我倍感幸运和温馨；谢谢我本科的同窗好友杨林、李沛、柳俊楨、张飞扬多年来的照顾和支持；谢谢我硕士班的各位同学，天涯海角聚在一起就是我们最大的缘分；谢谢我的师弟师妹，王芳琳、王何欣、李金潼、吕海、董柞壮、孙迪、曹滢、任娟、权贤美、贺莉莉等一直给予我的无条件的支持和关心，看到如此年轻、充满期待的他们，我会倍加珍惜自己拥有的每一天，倍加感恩活着的每一天。

最后，我要感谢我远在西南的父母。求学在外的我不能常伴他们于膝前，常常令我不安，六年来陪伴父母的时间又屈指可数，更加重了我的歉疚。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父母





总是坚定不移地支持着我，鼓励着我，给我信心，给我力量和勇气。出生在这个家庭，是我今生最幸福和最荣耀的事。在我飘洋过海的旅途中，我更加庆幸地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无论自己想离开多远，想飞多高，始终有一根无限长的线拴着自己，保护着自己，那根线就是父母的爱和牵挂，也是自己无论走到哪儿，遇到什么困难都始终勇敢坚强的源泉。谢谢爸爸妈妈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宽容和理解，谢谢你们给了我这个世界！

[责任编辑：陈冲、李金潼、孙迪]

## 拿什么致你的青春\*

2015年12月16日 文/汤明磊\*\* 阅读/274 点赞/5

**【编者按】**有人说，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一样也创不了业。某投资人甚至直言“白手起家就是梦，创业比就业更讲究出身”。言外之意即是没能力就业的，也没能力创业。又是一年求职季，在这个人才市场万马奔腾的时刻，新视界给大家送上南开创业“牛人”汤明磊博士的硕士毕业感言，看创业者如何观就业，如何致青春。

时光荏苒，刚进入大学校园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转眼已经辗转津杭，度过了六年时光。实事求是地说，我在大学的六年生活属于平平淡淡、一事无成的那一类。常常跟同学开玩笑说，大学向社会输出三类人，第一类叫人才，是社会的珍贵资源；第二类叫人力，是社会的潜在资源；第三类叫人口，就是像我这样的，只是在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才有点意义。然而这又是我个人生涯中不平凡的六年，这期间历经了四个专业的坎坷，完成了太多角色的转换，面临过各种机会的抉择，个中的纠结、失落、领悟、感慨应该也不会比各位学弟学妹少，想借着新视界这个平台和师弟师妹们聊聊自己心里的想法，就当是走上博士这条“不归路”前的最后一次真情告白。

### 一、求职经验分享

由于是毕业生经验分享，所以我向大家汇报内容的第一部分是关于求职经验的，而我更在意的是第二部分，也就是个人对大学期间出现的一些困扰的肤浅理解。第一部分是关于求职的，我从去年9月开始投入求职大军，到去年12月确定被保博，当中三个月参加了几十场面试，也拿到了一些 offer，想从简历关、笔试关和面试关三方面介绍一下我收获到的小经验。

#### （一）简历关

首先，你必须准备不止一种简历，以突出你简历中的不同模块，**外企私企可能更注重实习经历，国企可能更注重学生工作，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更注重科研能力**，随时在包中备份多张简历，向不同的用人单位发放不同的简历，这一点不要怕麻烦；其次，可以对包括头像在内的简历的一些内容做适当的优化，我找工作的时候也对自己进行了明显的瘦脸瘦身、智能磨皮加工。为了获得 HR 筛选简历时 0.01 秒的那种心电感应，对奖励荣誉、实习经历、学生工作、科研成果等都可以做适当优化，这无可厚非。大家都想找一个好工作，但必须要拿捏好度，不要把突破优化蜕变为造假。把优化部分的功课做足，比如一项实习的时间可以不到两个月，但要确保你至少参加过，这样 HR 问你的时候你至少可以做到胸有成竹、面不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3年第2期。

\*\* 汤明磊，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2014年，汤明磊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放弃哈佛交流机会，创办大学生创业孵化器“闯先生”。2015年，汤明磊被评为“第十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现任天津闯先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洪泰基金（天津）创始合伙人。



露怯；再次，对申请的那个公司要做一定的了解，比如关注一下公司架构、运行机制甚至是它近几年的报表，然后在一些通过邮件的网申求职信上体现出来，这会让 HR 感到一种被尊重感，可能对求职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最后，简历一定要海投，不要怕麻烦。政府学院的专业大多属于基础类学科，找工作会比应用类学科的同学多付出一些努力和代价，大概的比例是每投 10 个获得一个笔试机会，每投 20 个获得一个面试机会，每投 50 个获得一个 offer。

### （二）笔试关

笔试分行测、英语和专业测试几种，行测大体相当于国家公务员考试的难度，英语一般在六级考试的水平，这些都是大家可以提前准备的。一些做题过程中的小技巧需要大家慢慢摸索，比如行测训练先求快后求对，当时间来不及时先完成资料分析题，因为那部分的分值比例大等等。最重要的是在做行测的时候能给自己一个高度仿真的模拟环境，而不要反复翻看答案。十一月份的国考往往是大家复习的盲点，如果提前在暑假进行准备，或许能收到令人惊喜的结果。专业测试需要大家多花一点时间准备，比如我当时报考新华社，就提前一个多月开始浏览新华网、人民网、半月谈等相关网络里面的新华时评、人民时评和半月时评，上网除了刷微博人人，还会抽出一定时间看一下那里面的最新评论员文章，不用死记硬背，那样出来的文章没用，经常看才能慢慢找到感觉。或许写这类文章的诀窍就一个字“分”，或者从时间上分为即时效应、长期效应；或者从趋势上分为整体趋势和局部趋势；或者从层次上分为制度、政策和文化等，只要能做到深化细化具体化，就能保证有东西写。当时我笔试完新华社两个星期后接到新华社电话，说参考笔试内容和简历，决定免去面试，我相信“分”字诀应该是其中起到作用最大的。

### （三）面试关

这是求职阶段的重中之重，大公司有时甚至能持续到五面、六面。面试一般分为结构化、无领导和现场演讲三种。结构化面试方面，我因为做过公务员面试班的讲师，所以和很多面试老师有过交流，在他们看来，一个人从推门进入到坐下发声的 15-20 秒时间里，大概百分之 60% 以上的分数已经被打出，在回答中如果在 2 分钟之内仍没有任何亮点，分数基本就确定了，因此虽然不鼓励大家改变长相和声音，但是也希望大家注重自己形体、仪态方面的训练，第一印象下的气质气场培养绝对会有助于提高你面试的成功率；另外，近年来结构化面试的新形式是 free talk，在保利第三面的时候，广州公司的 HR 正好有事来天津，我们就在 90 咖啡馆进行了一次面试。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前半个小时他一直在貌似愉快的谈话中给我压力面，但又装得很轻松，比如他开头第一句就是“一直听说浙大是个很水的学校，你怎么看”，这时候不卑不亢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态度，如果还能继续加点风趣幽默就更完美了。比如我是这么回答他的，紫金港、西溪、玉泉、之江、华家池，浙大的每一个校区都带着水字，浙江两字的一半都是水，所以浙大肯定是中国最水的大学，但是我争取出来的时候不做水货。结构化面试最重要的就是自我介绍，它是第一个能给面试官直观印象的东西，



切忌给自己准备一份呆板空洞的自我介绍，把自己变成复读机重新读一遍简历，那样非但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甚至会让面试官觉得你空洞无物，起到减分的效果，不说点什么新鲜的是刺激不了一个长时间处于面试环境里的面试官的。什么是新鲜出彩的呢？给大家举我和我两个好朋友的例子，比如**我准备的是四化：全面化的教育背景、均衡化的文理发展、高效化的工作模式和旺盛化的适应能力**，虽然听着很矫情，但是面试官至少记住了“四化”这个点，给他留下了一点印象；**我的一个好朋友准备的是三手：实习工作是新手，学生工作是好手，科研工作是能手**；**我另一个好朋友准备的是一二三四五，一篇期刊论文，两个专业学位，三次实习经历，四次一等奖学金，五年学生工作经历等**。以上三个例子虽然都不是自我介绍中的经典出彩案例，但是至少会给面试官与众不同且逻辑清晰的感觉，希望师弟师妹在准备自我介绍时有这个意识。至于无领导小组面试方面，想跟大家分享我在格力面试的经历。当时要我们用五个词构想一篇文章，当时抽风的我说了一个星球大战的故事，毫无悬念地被有个哥们编的人生抉择最后还联系到格力发展高度的故事给 PK 下去，我后面的选择是支持那个又红又专的故事，并由此丧失了话语权，但结果竟然我们那一组就我进到了下一面，所以无领导不一定要抢 leader 和 timer，亮点、风度甚至与坐在一旁面试官的眼神交流都有可能帮助你晋级。关于即兴演讲，我送给大家四个字：**点破解承，先点题，次而分析原因，然后说一下对策，最后拔一下主题，百试不爽，说一个部分的时候心里快速准备下一个部分，增加了你的逻辑感之外也消除了你的紧张。**

## 二、校园生活感悟

我关于求职部分的粗浅经验已介绍完毕，下面是真情告白部分。

从哪儿开始说呢？我想了很久，就从这段时间很火的电影《致青春》开始说起。不知道大家对青春的定义是什么？**个人对青春的定义是当你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并且努力去追赶、争取的时间。**

我硕士期间的专业政治学有两大主题，一为选择，一为平衡。细细想来，这与我们人生的主题其实是重合的。现在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大家往往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为什么读书、为什么深造、为什么工作、为什么成家，迷迷糊糊恍恍惚惚就走过了半生，只是在夜深人静或者酩酊大醉时才突然发现内心的空虚；第二种是大家觉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一直在为自己想要的坚持不懈地努力，比如很多同学会说想要的就是比以前过得好，但这个“好”是什么？是想让别人觉得你“好”还是自己得“好”？这一点是他们没有关注到或者是不想关注到的，所以这类情况下他们只不过是知道自己需要追求什么。

现在很多人的人生选择不知从何时起被划成苍白无力的公务员、出国、国企、外企、民企等几类，大家提到考研就是跨考金融，提到工作就是进央企或者五百强，**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去，仅仅只是因为显得似乎很体面并能保证经济能力吗？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我以前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一个人求职的过程是心理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博弈过程，心理人代表喜不喜欢，自然人代表适不适合，社会人代表体不体面。最好的职位当



然是三者的完美统一，然而如果不能保证三者的完美统一的话，完全屏蔽掉第一个和第二个，个人感觉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一个人一生一般都在不由自主地寻找并收获四种感觉：祥和感、美感、优越感和快感，当意识不再占据你大脑的主导地位时，一般人常见的生理反应是跟着感觉走。希望大家不要做感觉的奴隶，尤其是优越感的奴隶。我再举个真人真事。我在本科的时候认识一个很优秀的同学，他是浙大经院平均学分绩点第二名，当时毕业季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年薪 30 万的贝恩咨询，一个是清华经管的研究生。他最后选择了第二个，但是他跟我的聊天让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他说：“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理想了，也没有任何判断标准了，钱已经成为了我唯一的标准，如果我从清华经管出来找不到 30 万以上的工作，我就判断当初这个选择是失败的。”希望大家能够在求职道路上也多考虑考虑这样的选择问题。

冯唐曾经说过，世界是一棵倒着生长的树，下面是多个分岔的入口，上面是同一个根，在这个根上面坐着的，就是佛。这句话我很赞同，在我看来，无论是工作、读研、出国甚至是待业，我们都在找一个和世界呼吸吐纳的入口，而问题是现在大家都特别在意这个入口的选择，这其实不应该是最重要的，最应该引起关注的是从入口到“根”的道路应该怎么走，走得好不好，走得远不远，这都比从哪开始走重要。

最后，完全不官方和客套地与大家分享四句话吧，谈不上期望和经验，都是我教训的总结：

第一，希望大家有**概率意识**，不要在买保险的时候觉得这万分之一的概率肯定轮不到我，而在卖彩票的时候经常想这万分之一的概率怎么就不可能是我？拥有了概率意识不仅仅会对你在买保险和彩票上有用。

第二，希望大家有**独立意识**，独立思考、独立做事、独立为人，不要为了太多的迎合表演你自己，表演出来的你必然是光鲜的，但也必然不是真实的。

第三，希望大家有**团队意识**，你的班级同学、你的协会好友、你的同门师兄都是你踏入社会的宝贵资源，抱团会增加你们成功的概率。

第四，希望大家有**长期意识**。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不是一句虚话，不要为了短暂的求职大潮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当年国企那么好，这其中有几个人能想到，没等他们到五十，那么多国企竟然会倒闭。

最后还是回到致青春上，用什么去致你的青春？不是别人如何欣赏你，而是自己如何认可自己！

[整理：郭晓琼、程康、李安琪]

[责任编辑：郭晓琼]



## 关于赴美留学申请几个主要文件的一些观点\*

2015年12月23日 文/胡悦\*\* 阅读/40 点赞/0

**【编者按】**赴美留学深造一直是许多国关学子心中的梦想。留美申请需要哪些基本的文件，如何能够通过这些文件脱颖而出？本期海外国关人，留学数载的胡悦学长将就留美申请中的几个文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供大家参考。

基于我本人和身边一些朋友的申请美国学校的成功经验，以及与一些参与过学生录取评审的交流，本文对赴美留学申请中的几个主要文件如何准备提出一些看法。希望对有意于赴美攻读研究生及以上学位的朋友们有所借鉴。

**起先有两点说明：**其一，由于我本人专业是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我的朋友也多在社会科学类，所以文中观点主要针对这一方向（虽然我不否认这些观点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类学生申请赴美留学）。其二，如下观点基于两个前提：第一，美国大学社科类研究生项目的录取评价关注点是基本一致的。至少美国 USNews 政治科学类研究生排名前 5 至 70 的项目是如此。这些学校对申请者的主要关注点大体有二：学科发展潜力（Potential）和与本项目的契合度（Matching）。当然，不排除某些 5 名以前或 70 名以后的项目会有不同于以上两点的考察点，但这些就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中了。第二，申请者有能力通过“第一轮”筛选，进入申请委员会审核挑选阶段。美国大学录取过程通常包括两轮筛选过程，第一轮由研究生院根据学分绩（GPA）、英语考试成绩、材料递交是否及时全面等条件淘汰不符合硬性标准的申请者；第二轮在各专业内组成评审委员会，对申请人发展潜力、契合度等进行评估并最终决定录取人选，交研究生院复批。因此，下文中提到的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简历（CV）、研究样品（Writing Sample）及推荐信（Recommendation Letters）只有在申请人进入第二轮筛选时才能产生效果。

当进入第二轮，尤其对于在国内（无法通过电话或者面试等手段与评委会进行直接沟通）的申请者，以上述四种为核心的申请材料将是其展示潜力和契合度的唯一途径。由此，这些材料是否组织得当、内容是否全面系统、可信度是否高将成为申请是否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以下拟就各个材料的写法提一些简要的看法，但需要注意的是，申请者在准备过程中要将四者视为一个整体，对各个文件的内容进行妥善布置，争取做到不重不漏。一般而言，简历需要展示申请人“已经做了什么”；个人陈述在于显示主观上“还想做什么”；研究样品在于体现已有的学术素养；而推荐信从客观角度反映学习和研究表现。由此即可知，如果一个申请者在个人陈述中依然花很大篇幅写自己已经有过什么研究、发表过什么文章等等简历中已显示的内容是很无效率的行为。相反，一篇好的个人陈述去掉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4年第1期。

\*\* 胡悦，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 2009 届毕业生，后在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和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获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现 Ph.D 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政治学系。



首先，尤为重要的是要体现能不能提出“有意思”的问题。对于一个尚未进行过专业研究培训的学生，评审们或不期望他能够进行多么复杂高深的研究，但他们会注意一个学生提问题的能力，因为这是对其学术有无敏感性和创造性的集中反映——这两点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此人是否能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即该人的学术潜力。其次，个人陈述也要展现为什么要选择申请这个特定项目，是因为该系的某个教授能为你解答那个“有意思”的问题提供什么帮助和指导，还是这个项目提供什么特别培训是对你今后研究至关重要的——换言之，申请者和这个项目有多契合。

这样一篇个人陈述就能对自己的申请理由和资质做一个系统全面的介绍。而对于学术潜力的另一个主要考察方面则是该申请者“已经做过什么”。这一方面体现在成绩单上所修的专业课程及成绩，另一方面则集中体现在简历上。而由于简历往往更为简洁、结构更为清晰，所以往往是评审人员的关注重点。做好一份简历其实并不难。要知道博士项目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出具有一定专业素养的研究人员，那么能体现这种专业素养的简历就是合格的简历。唯一难点是作为一个“尚未专业”者，我们怎么知道如何组织简历才能体现这种素质呢？幸运的是，在数字化普及的时代，那些“已专业”者——即教授们——的简历是很容易从学校网站上找到的。这些无疑是最为专业的范例。我们剩下要做的只是在格式和内容上依葫芦画瓢而已了。当然教授简历也有优劣，建议多下载几篇，去粗取精。

**最后再说说推荐信和研究样本。**推荐信一般是由能直接观察申请者研究过程和结果且已具备一定专业水平和评判能力者给出的对于申请者的第三方评价。故首先要保证推荐人与申请人的关系是密切而明确的，比如论文导师、任课老师等，没有课业接触的老师或者非专业选修课老师就不大合适作为推荐人了。其次，虽然推荐信是第三方提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申请人就无可为了。其实，往往推荐人是不抵触申请人在写推荐信之前先给出一份参考提要的。其中可能包含了申请人希望推荐人能在信中着重反映的内容。这样一份纲要能为推荐人在撰写推荐信上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但他依旧掌握着在其中写什么、不写什么和怎么写的权威，无碍于其公正客观的立场。需要注意的是，提要必须在推荐人撰写之前交付；在寄出推荐信前，申请人最好不要提出查看推荐信内容，因为申请人对推荐信内容无所知是该信有效性和客观性的重要保证。这一点大多数美国院校都很重视。

至于研究样本，无需赘言，惟早下手多加修改，只是格式一定要规范。建议参考美国学科内的顶级期刊格式选择字体、板式和引用格式。以上就是对几个重要申请材料的几点观点。希望能对后来者有所帮助。

[责任编辑：沈琳]

[校对编辑：王芳琳]

## 赴美留学经验分享\*

2015年12月27日 文/刘奇峰\*\* 阅读/51 点赞/0

**【编者按】**在美国做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中国学生应如何适应美国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趋势、迅速进入状态？在美留学又有哪些文化和生活事项需要注意？本期海外国关人，来自台湾的刘奇峰博士将就上述问题分享他的经验与看法。

我是刘奇峰，现在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政治系的博士候选人，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国际和国内武装冲突、量化政治学、政治地理学和中美关系。2014年有个珍贵的机缘，让我得以前来天津南开大学风景秀丽的校园，和南开国际关系系的师长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国关人做进一步的交流，收获良多。

南开的新科优秀博士生迟永很热情，要我给《新视界》写个稿，和南开的师弟师妹分享留学的经验。承蒙他的错爱，在此就不揣固陋，希望自己的经验能为来者省去一些在学术曲径上摸索的时间。

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在台湾成长、求学，在赴美之前从事媒体工作。当时能有机会访问到许多台湾和大陆的国关学者，因此兴起了一种“有为者、亦若是”的豪情，于是着手准备申请美国大学博士班，之后经过种种考虑，选择了位于美国东南部的南卡罗莱纳大学政治系就读。

**南卡大的政治系，在国关这门子学科上有悠久的传统。**起初作为南卡大的主流大系，它的研究途径主要以区域研究为主，以国际组织、国际合作与自由主义为专长，网罗了一批名师如研究欧洲整合的普查拉（Donald Puchala）、雷格利（Charles Rigley）和研究美国外交体系和决策过程的罗赛蒂（Jerel Rosati）等学者。90年代末，本系网罗了专研国际冲突与联盟理论的名师史塔（Harvey Starr），也赶上了美国政治系量化的大潮，全系的研究方向开始向主流转向。

我进入南卡就读的时间点，刚好处于本系转型期的末段。**台湾的国关研究生教育和大陆很近似，以文本与历史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注重个案与区域研究。**我的硕士在台湾淡江大学的美国研究所，论文研究的是朝鲜战争时期美国杜鲁门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袖手旁观（Hands-off）”政策。当时写论文的时候，完全沉浸于第一手的历史文献当中，引用最多的档案除了美国国务院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FRUS）”档案集，还包括蒋介石的“大溪档案”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档案等。

赴美之后，面对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美国的主流政治学开始走向定量及科学化，就算是所谓的“质性”研究方法，也不同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法，而非常注重背后逻**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4年第3期。

\*\* 刘奇峰，男，来自台湾，现 Ph.D 就读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政治学系。





辑的推演，以及多重案例的比较。原本打算延续中美关系研究的方向，但是导师史塔鼓励我，应该把视界扩大，跳脱两国间互动的框架，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各个强权（great powers）。

很多师弟师妹在国内可能跟我一样，以比较传统的方式从事研究工作，有的师妹可能会自己苦苦摸索定量研究方法，这些都不要紧，重要的是要先做好思想准备。目前国内和许多美国大学在寒暑假都会举办定量方法研习营，如果有时间不妨报名参加，一方面可以熟悉定量方法的逻辑，二方面通过了解定量方法，在撰写申请文件和写作范本的时候，能够增加自己被入学评审委员垂青的机会。但是不用过分担心自己的研究方法学的不够。定量分析在美国推陈出新的速度很快，几年前流行的方法，很快就不再流行，这种情况所在多有。所以不用拘泥于某种方法，重要的是了解方法背后的逻辑。

美国的国关和政治学研究视角的另一个特点是注重研究价值和方法的普世化（universal）和通用化（generalizable）。研究方法注重定义的清晰性、结构的完整性与结果的实证性及可证伪性。学者们特别反对那种“咱们美国就是怎么样怎么样……”那种“特殊国情”的说法。他们主张社会科学研究法注重条件、结构和诱因：如果条件趋同，任何行为体发生某种行为的可能性都会上升。这也是目前科学化研究法背后的理路。纯粹的区域研究目前已经不再被主流重视及认可，除非该研究在理论层面能做出贡献。美国的国关也早已由先前的“三大学派式”的大型理论，转向所谓的“中层理论”，最近甚至有定量学者提倡以“模型”取代理论的说法。

除了课堂的学习以外，另一个能够更了解不同研究途径和主题的渠道就是各个学术会议。国关的学术会议除了全国性的ISA（国际研究学会）、APSA（美国政治学学会）年会之外，还有分科更为细致的专业组织年会。比如在我研究的国际/国内武装冲突这一块儿，就有Peace Studies Society（和平研究学会）的年会，还有在定量政治这块儿，The Society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政治学方法论学会）每年夏季面向年轻学者和研究生们举办的研究发表会，也是赫赫有名。类似这种专业会议，论文被录取的难度更高，但是通过参加会议，却能认识许多志同道合、研究方法近似的同志们。我有幸参加过上述两个组织的年会，不但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也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知识视角。

在美国留学，对聪慧的中国学生来说，最难的并不是学科，而是文化和生活层面。英语当然是第一个可能的阻碍。但是在语言的障碍之下，更多的可能是生活方式不同所导致的问题。有个流传在老一辈留学生之间的笑话说，不管你英语学得再好，到了美国第一次去采买生活用品在柜台结账时，肯定会被一句话雷到，这句话就是“Debit or credit?（用借记卡还是信用卡付账？）”当然随着国内的发展和与世界接轨，生活差距也许会缩小，但是国内外社会、文化、生活形态的不同，对留学生来说还是一个相当大的冲击。如果师弟师妹们有机会到美国来留学，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走出教室和图书馆，多多接触、观察当地社会。毕竟专业的知识能通过书本和网络获取，但是与外国社会第一手接触的机会，却只有留学的时候才有。



很高兴能通过南开《新视界》与师弟师妹交流。如果对于美国留学有进一步的问题，请通过以下的电邮和我联系：[roger.cf.liu@gmail.com](mailto:roger.cf.liu@gmail.com)。祝各位在学术的旅程中一路顺风，收获满满！

## 一碗给出国党的鸡杂汤\*

2016年1月2日 文/吕海\*\* 阅读/466 点赞/11

**【编者按】**据说，每一个学妹的心中都有一个“谜”一样的学长。他（脑补ing）？！或是英俊潇洒，或是才华横溢，或是温柔体贴，或是幽默风趣…而具备其中一点，就足教人少女心大爆发。若是“四位一体”，就简直要令人“crazy”了。本期新视界，就将为广大学妹安利这样一位“高颜值、高情商、高学历”的“crazy”学长。

我叫吕海，是南开2010级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生，现在是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以下简称CMU)公共政策与管理全球项目的硕士生(Master of Science in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 Global Track，以下简称PPM)。由于是全球项目，所以我第一年是在CMU的澳洲校区度过的，今年八月会在CMU的本部匹兹堡校区继续学习。这次正好借“海外南开人”这个栏目，梳理一下我这近一年的留学旅程。由于现在已经不再继续学习国际关系方面的内容，所以本文更侧重讲讲自己出国的心路历程和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希望对想要出国留学的同学有一些帮助。



▲袋鼠，是澳洲特有的一种动物，它们体格健硕、行动敏捷，精力充沛，而又性情温驯。初到澳洲的学长，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忍不住与袋鼠来了个亲密接触。

出国党比较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心态问题，面对陌生的环境容易产生很多消极的心态。以我自己为例，就在出国初期对自己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首先就是对新的课程内容的不熟悉而产生的挫败感。由于本科念的是国际关系，所以对公共政策方面的内容不太熟悉，在学习公共政策相关课程时面对每周动辄几百页的阅读也就更觉吃力。加上PPM项目综合性较强，还包含经济、金融、管理相关的课程，更别提CMU引以为豪的IT相关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5年第2期。

\*\* 吕海，男，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2014届本科毕业生，新视界前主编，现M.A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卡内基·梅隆大学(CMU)。

的课程了，虽然每天都能让我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即使都只是入门类的课程，从未接触过的学科知识也让我感觉难度骤然上升。此外，作为母语非英语的国际生，对于老师们各式各样的口音（尤其是**粗犷浓郁的澳洲口音**）也是倍感无奈，而没口音的老师讲的内容又显得那么陌生。这些困难都让我产生了很强烈的挫败感，感觉就好像西西弗斯一样，每天好不容易将大石头推上高山，第二天发现了新的大石头静静躺在山脚。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这点在我所在的学院(Heinz College)尤其明显。因为虽然我们学院的公共政策与管理项目名声不错(在 U.S. News 的 Public Affairs 中排名第 9)，但完全不能跟学院内的另一个项目——信息管理系统硕士(Master of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以下简称 MISM)——相比，因为 MISM 的 U.S. News 的专业排名中位列第一。由于名声在外，MISM 项目的总人数也远远多于 PPM。而且，程序员们在就业市场中相对更容易找到工作。这一点在找实习的过程中也已经被事实证明：当我们 PPM 的同学们每天都在焦虑地等待回应的时候，MISM 的同学们已经在发愁到底该选哪个实习了。于是，每次在 MISM 同学问我“你说学你们这个专业今后能干什么”的时候，我的小玻璃心也是碎了一地的。挫败感加上同辈压力，让人非常容易自我怀疑，比如会产生“弱者为什么要战斗”这种中二而又消极的想法，动摇自己的意志和决心。



▲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学业受挫、前途迷茫，“僧活”百无聊赖。学长常常一个人来到校园外的小土丘，驻足远望，兼加思考人生，以排遣内心苦闷。

而摆脱这种消极的状态则是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经历。在某次随堂测验后，跟班里的同学们一起去喝酒，然后我操着稀烂的英语跟一位美国同学大吐苦水，告诉他自己的不适应与迷茫。听完我的话，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嘿，你个老伙计！当初不是你自己选择来这儿的么？”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我想起当初自己做出选择时的豪情壮志和无限憧憬，再想想自己现在的消沉状态，不禁羞愤难当。“自己做出的选择路，跪着也要走完啊！男人，就应

该不畏艰险，去战斗，去冒险！”我这样想着，慢慢有种振作起来的感觉。为了表示我的感谢，我给这位美国同学点了杯好酒，然后潇洒地甩甩头，没付钱就跑出了酒吧。

经过这次酒吧谈话，我开始尝试用积极的姿态去解决问题。首先是正视不懂得问题，然后厚着脸皮寻求帮助。经济学有不懂的问题，就缠着出身经济学的同学问问题；金融有不懂的地方，就对有会计工作经验的美国同学死缠烂打；IT 课程有不懂的知识点，就腆着脸问 MISM 的各位大神。同时，也更加不要脸地问老师和 TA 各种问题。在各种追问中，我也逐渐熟悉了不同学科的话语体系，开始掌握正确的学习姿势。

其次就是端正心态，制定自己的目标。我开始把隔壁颇受欢迎的 MISM 专业的羡慕嫉妒恨转换为自己前进的动力。正所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如果自己也想要在以后的职场上更有竞争力，那就多学些实用的技能。比如说我自己在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之后，发现自己在数据库管理这一课程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自己也比较感兴趣，于是就下决心向数据分析这方面发展，于是选很多相关课程。虽然难度很大，但也收获颇多，对未来的定位也越来越清晰。



▲重新找到方向的学长又开始畅快地郊游、会友与欢笑。他决心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和每一个亲人通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总而言之，如果在出国初期对新的学习生活环境不适应，也一定要记得自己出国的初心，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同时也要有自己的坚持，不要人云亦云，盲从所谓的“大潮流”，而对自己妄自菲薄。受到其他“大势所趋”学科的同学的鄙视时，不要玻璃心，而是要立足现实和自己的兴趣，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手上的资源提高自己。

此外，留学生在英文应用方面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更要抓住各种机会练习英语。正所谓用进废退，很多当初托福高分的程序员同学由于只跟中国人组队导致英语水平比出国前还要差，也让人唏嘘不已。还有很多同学可能觉得自己英语不好，所以不敢说话，我给这些同学的建议就是：“说自己的英语，让别人难受去！”反正说得不好折磨的是别

人，自己何必如此难以释怀？此外，还有一个误会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在国外留学的时候，老外很喜欢叫上大家一起在课后或者周五去酒吧喝酒，很多很乖的同学就会想：“哎呀去酒吧是不是会发生一些很糟糕的事情啊？！”这可就是天大的误会了。酒吧（pub）之于老外就如茶馆之于中国人，只是一种聊天休闲的生活方式，而且国外的 pub 基本没有大家害羞而又期待的事情发生，最多也就有几个醉汉发发酒疯唱唱歌之类的。想要看你脑中想的那种打马赛克的事情，还是要多花点钱去夜店（night club）才行的，咳咳。所以如果今后大家出国有这种社交的机会，一定要好好利用，不仅可以提高英语姿势水平（老外很喜欢纠正语法错误的），还可以扩展自己的人脉（networking），对自己今后的发展也是很有帮助的。



▲学长在卖萌。但其实，学长内心的思想活动是这样滴：呀，你们猜，和班上最漂酿的白人女孩站一块儿合影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那是鸡冻中又有一点点紧脏啊！

杂七杂八说了这么多，只希望能给大家的留学生活做出一点帮助。不管今后学习的是哪个学科，也不管今后会有多少困难，请一定不要忘记自己之前为了出国所做出的付出与努力，因为这些记忆能帮你牢记你当时的决心和豪言壮语，也能让你记住：都装过逼了，哪儿那么容易跑？

[责任编辑：刘芮宁]

[校对编辑：刘 志]

学习

希望《新视界》成为学生专业学习交流的园地，思想碰撞的舞台。

——韩召颖



## 如何写作国际关系类书评\*

2015年11月23日 文/刘丰\*\* 阅读/139 点赞/7

**【编者按】**如何写作国际关系类书评？TAN 奶奶的书评不会写？刘丰大大教你怎么写！身为本宝宝的你，再也不用因为看完书却不会写书评而抓耳挠腮啦！

有感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书评类作品不够繁荣，我在这两年的教学中一直尝试着将写作书评作为研究生课堂教学的一部分，以便促使学生们认真阅读一本英文学术专著，了解研究设计的完整步骤并锻炼写作能力。写作此文是为了让学生们在写作时有一个参照的标准。好书评的风格应该是灵活自如而非程式化的，当然，一些基本要素写作时可以参考。

### 书评的目的

写作学术书评不仅是向人们介绍这本书的内容，而且要阐述这本书是否成功地达到了其试图达到的目的。指定书评写作是为了让学生们更加仔细地、批判性地阅读一本书。国际关系领域的经典文章不乏书评类作品，它们或是对一本书的评介，或是对几本主题相近著作的综述。在一篇书评中，评论者一般需要描述书中的主要内容，分析这本书试图达到的目的，并表达自己观点。

### 读书的目的

读懂一本书是写作书评的前提。你在阅读任何一本学术书籍时可以带着下列问题：

#### 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什么？

作者们一般会明确阐述自己写作一本书的目的，尤其是在书的导论和序言部分。一本学术专著的目的一般是解决学术界的争论或现实世界的重大困惑，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 作者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书的导论部分一般会陈述这些观点，并且会就每一章的主要内容做一简介。

#### 作者用来论证或支持其主要观点的证据有哪些？这些证据是否可信？

所有的著作都是可以批评的，但是批评一定要有的放矢。从逻辑和经验两个方面思考为何一些观点可信或者不可信，并且判断作者是否对其观点作出了充分的论证。

#### 这本书与相关主题的其他书相比有何价值？

这本书是填补了空白还是增加了新的信息？哪些读者会对这本书感兴趣？

#### 作者是否具备写作这样一本书所需的专业知识？

### 书评的结构

写作并无一定之规，下面的结构仅仅作为参考：

**标题：**评论者需要构想一个概括性极强且引人注目的正标题。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1年第1期。

\*\* 刘丰，男，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引言：**与一般的学术论文一样，评论者在引言中论述写作这篇评论的背景和目的，以及评论的主要内容。引言第一段一般会告诉读者你所评论的这本书的主要信息（作者、标题）。如果篇幅允许，也可以用几句话对书的主要内容、目的以及你的评价做一概括。

**背景信息：**第一部分可以就该书所涉及的学术背景进行讨论，使读者了解这本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并且可以设定评判该书的标准。

**内容概述：**该书主要内容的综述，在说明作者的核心观点时，尽可能直接引用书中的原话，并添加注释，便于读者查找。

**评价：**一份书评的核心部分应该是评论者对该书的评价。在这个部分，评论者可以讨论一系列问题，比如作者是否实现了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否解决了试图回答的问题，书中遗漏了哪些重要内容的讨论，该书与其他相关主题著作相比有何优劣，哪些观点并未充分论证而不足为信，该书对后续研究的推进有何启示。需要注意的是，评论者的批评应该是有针对性的，而不是漫无边际的。尤其要注意的是，区分你自己的观点和作者的观点，以免读者混淆。

**结论：**评论者在可以将评论者涉及的问题或者研究的进展做一总结性评论。

#### 评判的标准

以上概括了一篇完整的学术书评的主要内容，当然，不同类型的杂志上刊载的书评侧重点是不同的，或侧重介绍，或侧重评论。通常，好的书评不应只是对书的内容的概括和梳理，因此评论可以占到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篇幅。既然评论是主要内容，那么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评判一本书的价值？下面是一些可供参考的标准：

1. 该书所涉及的议题在国际关系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如何？
2. 作者在该领域的学术积累是否全面和详尽？
3. 作者的论述是否囊括了充分的证据，或者忽视了哪些必要的证据？
4. 作者所使用的方法是否足以达到其研究目的，有何优缺点？
5. 写作风格是否清晰、明确和有趣？
6. 这本书与该领域的其他著作相比有何突破？
7. 这本书对所涉及主题有何贡献？
8. 哪些人可以从这本书中受益？

[责任编辑：姜忆楠]

# 如何写作研究论文\*

## ——政治学论文写作指南

2015年11月25日 文/阿什利·利兹\*\* 阅读/96 点赞/2

**【编者按】**如何写作研究论文？莱斯大学的阿什利·利兹老师采用庖丁解牛的方式，从政治学论文的结构，也即引言、文献回顾、理论（论证）与假设、研究设计、经验结果、结论等六部分入手，对此问题做了详细解释。透过这篇政治学论文写作指南，你将领略美帝论文写作的风格、方法与态度！

以下是一些能够帮助你写作研究论文的基本提示。这份指南分为六个部分，覆盖了你论文中的各个不同方面；你不需要以相同的格式组织你的论文，但是你需要完成所有这些目标。我找到两本与这份指南相关的实用著作，分别为：

霍华德·S·贝克尔：《写给社会科学家：怎样开始写作和完成你的学位论文、专著或者文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6年。

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西德尼·维巴：《设计社会研究》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

### 引言

引言是研究论文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尽管引言应该相对简明，但完成以下目标，你需要不止一个段落。在引言中，你应该完成以下目标：

1. 引发读者的兴趣。在这点上，你可以抛出一个我们尚不理解的疑问，或是某一当下学术研究中的论战，也可以利用你的主题在规范上的重要性来吸引读者，让别人想要了解你所要说的；
2. 清晰地陈述你的研究问题，解释为何我们应关注这个问题的答案；
3. 预览式地简介你的论点和结论，为全文提供一张“路径图”——让读者了解，你的文章会将他们引向何方，他们应对你的文章抱持什么样的期待；在这点上，提及论文中的某一或某些特殊部分或许会有帮助；
4. 阐释你研究中的附加价值，即你的工作如何推动知识发展。例如，你是否提出某个新的论点，是否扩展了某一已有论点？你是否在新的经验主义领域内评估了某个论点？你是如何将你的工作融入已有文献著作的，它的创新之处又在哪里？

\* 本文原载于《新视界》2011年第2期。

\*\* 阿什利·利兹（Ashley Leeds），女，美国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政治学系副教授。



## 文献回顾

下一步，你必须罗列研究该项目的文献，显示你的项目如何进一步推进已有的学术研究。为此，你必须展示出你对于与你的主题相关的现有理论、文献的理解，以及你拟定的计划将以何种方式改进现有的工作。换句话说，你必须回顾相关文献。

在为研究论文写文献回顾时，学生中最常见的错误即是对其目的的忽视。你的文章之所以要包含文献回顾，是因为它不仅解释了你的研究计划的基础，同时说明了你的研究计划的贡献。文献回顾应该集中关注那些与你的研究直接关联的议题，且应以一种能够唤起对你的研究的贡献的关注的方式组织起来。文献回顾的目的不是展示你读了很多材料；尽你所能地概括大量的著作和文章，而不顾它们是否与你的研究问题直接相关——这并非是一种好策略。简短、切中主题的文献回顾远比冗长、曲折迂回的文献回顾更为有效。同时，你也必须阐明对这一领域当前研究状况的理解。

创作一份仅对相互独立的书籍和文章进行概括的文献回顾，而不去探究这些文献如何融合，以及它们如何被表述成为一个连贯整体、为何能将其作为你的研究设计的出发点，是一种十分考验读者耐心、也容易使你在展开论证时脱轨的方式。而以“很多学者已经研究过 X 与 Y 的关系”开头，紧接着列举哪些学者曾研究过这个主题、各位学者的结论是什么，这种类型的文献回顾或许可以向你的教授展示你已经读过很多文章，但是不太可能对你的论文有价值。文献回顾不应仅是关于“已经做了什么”的技术性报告，而应该能够帮助你建构论证框架，同时是对已有文献的创造性的重新审视和组织。好的文献回顾应将独立的文章和书籍分组，形成能够帮助读者清晰快速了解到未解决的争论、矛盾和新问题的“分类表”。以此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已有研究能使你的读者确信，你的研究对于解决以上的争论、矛盾，或回答这些新问题至关重要。

霍华德·S·贝克尔在其著作《写给社会科学家》（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6）中对文献回顾做了如下描述：

想象你在做木工，可能是制作一张桌子。你已经设计了它，且切割出了几个部分；且幸运的是，你不必亲手制作所有的部分：一些具有标准的大小和形状，一些已经被别人设计和制作好；你要做的是，将他们融入到你为它们留出的空间，识别和认知它们的确是可用的。这正是你使用文献的最好方法，只不过你想要形成一个论证，而不是制作一张桌子。你已经首创这个论证的一部分，但你不需要创造全部；另一些人已经对你的问题或相关问题展开过研究，并写作了一些你所需要的片段；你只须在你的论证中找到它们应属的位置，并将它们对应嵌入即可。

设计一份成效显著的文献综述有很多可能的方式，而组织和报告某一领域的前沿发展状况的方式也并不唯一。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选择一份（适合的）组织计划，有意识地从一点观点推进至另一点，并最终引导读者得出结论。你的文献综述应能够引导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你所做的研究是人们理解那些尚存争论的现象的下一重要步骤。



设计文献综述的一种方法是将其设计成为围绕某一现象的两种或更多种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的辩论：如果你的研究能够区分不同的理论，并得出一种理论比另一种更适宜的结论；或者你能够很好整合不同的理论，启示大家它们之间完全不存在竞争关系——这都会成为架构你的研究的有效方式。另一种途径是将你的论文作为对现有理论的挑战：这种情况下，你仅仅将现有文献作为“陪衬”，以解释为什么你所使用的研究该问题的方法更好。第三种方法则是论证现存的理论是如何引导我们逐步完善对某一现象的理解；如果你的研究是某一完善进程中的“下一步”，此种方法就尤其有效。而所有这些方法都包含同一个目的，即说明你的工作是如何促进知识的持续积累——不管你是否使这种积累实现量的增加。

总之，好的文献综述能够使读者相信：你的研究方案对应于一系列既定的研究工作，并能够回应学界关注的某一问题；同时，你的研究通过提出一些新东西，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于这一话题的理解。

### 理论（论证）与假设

在你的文献综述后，你必须清晰而充分地向读者展示你的论证。这要求你：1.界定你所做出的假定；2.显示你如何从这些假定中合乎逻辑地获取对因果关系和因果效应机制的预期。理论必须：1.提供对因果关系的讨论；2.推进推理的目标——即从你的研究中概括而来，但能超越你的研究而泛化和普遍适用于其他一系列事件；3.可证伪，换言之，你必须能找到证据，证明一旦这些证据在实证研究中被发现，就可以证明你的理论是错误的。更好的理论能产生远比问题本身更多更大的杠杆效应——就是说，它们用更少的材料解释了更多的现象。可演绎性、可证伪性和杠杆效应都会随着你找到的、你的论证引起的可观察性影响的增多而得以增强；因此，尽你所能地去寻找尽可能多的、针对你的理论的可观察性影响，即使你不能在一篇论文里把它们全部测试一遍。同时，也要尝试界定理论的适用范围。要明确，在哪种情况下理论是适用的，而在哪种情况下我们预测理论会失效。

要特别注意对重要术语的定义。如果你在研究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国际合作的“成就”和“效力”，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术语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在讨论国际关系中“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对于结果的作用，我们需要知道你所说的“议价能力”的概念意指什么。如果你在研究国际调停，你必须能够解释，根据你的定义哪些行为构成调停，而哪些则不能。在定义你的术语和厘清你的因果时，要尽可能地做到具体、明确。切记概念定义不同于操作定义——你应该抛开你在实证研究中使用的测量结果，独立定义你的概念。

你的论证应该引导你得出一条或更多你试图在文中评论的假说。记住：假设必须具体指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预期关系；清晰、准确地陈述你想要评价的假说；注意不要合并多个想法，并且在论证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使之具体化；将你的假说编号并在文中突出它们，使它们对读者而言显而易见。

## 研究设计

在这一部分，你要向读者解释你打算怎样经验性地评估你的假设。你必须解释：

1. 假设适用于何种总体？你将研究什么样本，你是为何又是如何选择这些样本的？务必解释由于因变量中的截断变异（truncated variation）引起的任何不可避免的偏见（bias）。
2. 你的分析单位是什么，你是如何测量因变量和自变量的？你必须解释你从何处获取信息，以及你如何为变量赋值——你的编码规则是怎样的。切记这个步骤很有必要，即使你只是在评估数个案例，且在评估中使用的是文字而非数字。而在判定诸如一国拥有的议价能力是大是小，或是一项合作协议是否高度制度化等方面，你仍必须解释你所使用的标准是什么，以及你如何获取案例的相关信息。
3. 你的分析中包含了哪些必要的控制变量（如果有的话）？你为何要包含这些控制变量？你如何获取这些变量的相关信息，你的编码规则是怎样的？
4. 你使用何种分析方法（例如事件史分析法、结构化焦点比较法（structured-focused comparison）、布尔代数法（boolean algebra）、logit 模型等）做出推论？为什么？务必解释数据分析中任一需特别注意的特定方面。

## 经验结果

在此你应呈现你对结果的分析 and 讨论，以及所进行的任何鲁棒性检验（robustness checks）。在构造表格或图形时，请确保你提供了清晰的标签和标题，以使读者一看到该图或表就能毫不费力地明白你想要阐明的关系和检验的案例总体。然而，你不仅要用图表展示数据，还要用文字来解释，这一点至关重要。通过阅读文本，读者应该能够理解你的关键结果。

你不仅应该展示数据，还应该评估你的分析。基于这些数据，你能就假设得出什么结论？假设检验中是否存在不足，是否存在由于与预期模式不符而造成的突出特例？为什么会这样？尽量对研究结果保持质疑，并思考其他可能的解释大有裨益。你应该思考，基于这项研究，你对于所得出的结论有几分把握（换言之，有多少不确定性）。

## 结论

在结论部分，你应该完成下列目标：

1. 总结读者了解到了什么。你的论点是什么，论据又说明了什么？
2. 讨论将来的研究方向。这个项目使得你相信在未来，哪些方面应该继续被研究？你的分析是否提出了新的问题？是否存在你本希望能够评估但却未能实现的方面？
3. 解释你的工作为什么重要。它怎样促进了学术和规范的发展？



## 几点注意

你的研究文章应该：

1. 打印出来。
2. 双倍行距。
3. 合理的字号和页边距。
4. 依次装订成册。
5. 在之前加一个有意义的标题页。
6. 用恰当的副标题把文章分成若干章节。
7. 谨慎引用规范。
8. 以出色的语法、拼写和文风写作。

## 注释

我并不要求一种特定的格式，但我要求一篇论文中所使用的格式须贯穿始终，且应该是在普遍为学界所接受的学术论文格式的行列中（参见现今的政治科学期刊）。我更偏爱插句式的注释，在参考文献中的著作通常须按字母顺序排列。行文中所有被引用的文献资料都应在参考文献中出现，但不应包含行文中未引用的文献资料。

任何不是常识的信息都有必要注释。当你报告他人的观点时，你必须给予原作者适当的致谢。不仅仅是在直接引用中（你需要注释），无论何时你讨论那些源自另一作者的作品时，你都需要注释。剽窃是一种犯罪，也是对莱斯大学有关学术诚信 校规的违背；请确认你熟悉莱斯荣誉理事会的出版物《学术欺骗及其荣誉理事会》。通常，若你有关乎某一注释是否必要的任何存疑，我都鼓励你标注出处。

在每一直接引证处，必须紧随其后标注出处和相应页码，尽量避免直接引证，除非它们能显著增强你的论证。例如，在讨论时下的政策，尤其当有一简明的陈述能定义这一当下的政策时，直接引述某一国家领导人的原话就意义非凡。在引证一个已被广泛接受的概念性定义时，直接引用也具有同样的意义。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用你自己的表述阐释观点，并辅以对观点来源的适当致谢，能够增强你的观点。

当你转述其他研究成果的某一论点时，通常也有必要给予其适当的致谢。其他人的观点通常需要注释。那些一目了然的事实，譬如珍珠港遭受日本袭击的日期等，则无须加注。而那些不是那么无可争议的事实，例如调查结果、经济影响评估等，都须加以注释。此外，那些随时间变动，或从文献资料中得到的事实信息等也须加注。例如美国在国防方面的开销占国民预算的百分比是随时间变化的，而你从何种资料中得到此类信息影响重大。你应该持有审慎和保守的态度，奉行“少一注不如多一注”的原则。



若你从单一的文献资料中引用了若干句子或是整个段的观点,则在该段的尾部或句子群的最后标注一次即可,而不必在每一句末逐一标注。然而在行文中,不允许在一段的观点没有引证完全时继续开始另一个新的段落,这样才能很好的保证注释涵盖每一含有需要文献注释的段落。

[责任编辑:姜忆楠]



读编往来

我震惊于《新视界》背后学生团队的高水平。

——郭道久



## 我学物理但我爱国关\*

2015年12月14日 文/魏翔\*\* 阅读/134 点赞/3

**【编者按】**转眼间,《新视界》上线一月有余了。在这段时间里,《新视界》的小伙伴们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秉持“为读者服务”的理念,始终坚持为读者朋友们献上“有味、有料、有劲”的“精神食粮”。当然,我们也欣慰地看到「新视界」的粉丝数较上线之初获得了1200%+的增长。一些读者还给我们发来消息、邮件,更令我们感到欣喜万分。今天,「新视界」将为大家刊载天津理工大学魏翔同学的来信,希望通过我们的回答,能够帮助那些非国关专业但又“爱国关”的同学们。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的同学,你们好!

这封冒昧的邮件来自一个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有很大兴趣的大三学生,怎么说呢,殊途同归,方见域中之大吧。

我先作个自我介绍吧,我来自天津理工大学,目前大三,从大二开始,逐渐对国际关系这个专业产生兴趣,所以现在打算考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本科专业学的是材料物理,属于理学,和政治学专业相去甚远,跨度太大,很多方面不知如何准备,在搜集信息的过程中了解到了你们《新视界》期刊,于是决定发邮件和你们交流咨询一下国际关系专业的相关情况,有点冒昧,还希望同学能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我先把自己的思考过程概述一下吧。对国际关系开始产生兴趣是在大二上学期,受我们一位老师的影响,他给我们教《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在此之前,对于人生价值的思考,有点模糊,大概是以后走公务员这条路,那时觉得这是一份可以给人带来很强的使命感和归属感的职业,在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的时候,也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当然,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在这个价值观多元的时代,任何人都拥有权利选择深刻或者肤浅,但我觉得,大学生应当有去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意识,正如宋代大儒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想法也是在平时的一些阅读和思考中慢慢产生的,特别是《商鞅变法》这个历史事件,让我感触很深。大学之前只知道有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并没有深入思考过。大一时看了一个影视,感触很深,之后又阅读了相关的一些书籍,如,《中国文明正源新论》等,有过一些关于政治,文明,人性善恶的思考,但是很模糊:一种思想,一种理论,竟然会让一个国家产生如此巨大深刻的变化,虽然商鞅变法也存在一些弊端,(如轻罪重罚,缺少道德感化,短期内可以让整个国家处于高速运转的状态,收到战时变法的效果,但也会激化社会矛盾,埋下动荡的种子),但它确实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新视界》2015年12月14日出品。

\*\* 魏翔,天津理工大学材料物理专业大三学生,联系邮箱:1020688463@qq.com。



大二上学期上了我们那位老师的课，他是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的，在课堂上，他给我们拓展讲了很多关于国际关系，中国外交，世界文明冲突方面的知识（中国南海问题之类的），我慢慢开始对这方面产生了兴趣。之后又让他给我推荐了几本国际政治的书，我看了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很有感触，那本书广泛论述了1500—2000年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总结了1500年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并对今后世界政治的格局作了预言。后来我关注了一个微信公众号--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上面推送的文章质量很高，我看了很多，慢慢了解了一些国际关系方面的学者（如阎学通，时殷弘，基辛格，王逸舟等）以及他们的一些著作，思想和文章，还有最近的一些国际动态和中国外交的相关信息。

现在，我对这方面只是有一个泛泛的了解，感觉国际关系是一门美丽的学科，正如王首伟在《国际关系学概要》那本书中所说，这门科学从一诞生就蕴含着一种庄严的气质与美丽，它是对如何能避免国家间战争等人类灾难和痛苦，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这个庄严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理性的思考，研究和探索而产生的学科。我现在想考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生，但是感觉跨度很大，难度不小，因为很多方面不太了解，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定下来。这学期来，买了一本《国际关系实用手册》，大概看了一下，对这个专业了解了一下。也看过国际关系考研的一些信息，国际关系专业的几个老牌院校（北大，人大，复旦之类的）不敢想，关注了一下南开大学的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近两年它的国际关系专业的报考人数都是三十几个，最后录取十七八个，我知道这很难，但是不知道它的难度有多大，想努力一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今后中国肯定会广泛的参与到许多国际事务中，也许会在世界秩序的重建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吧。

电影《盗梦空间》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一个想法就像病毒一样，非常顽强，具有高度的感染性；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念头，也会像种子一样生根成形。（An idea is like a virus, resilient, highly contagious; The smallest seed of an idea can grow.）

我知道兴趣可能只是一种引导，当真正准备做一件事的时候得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现在只是有这么一个想法，打算以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很多地方感觉找不到方向，还希望能和诸位同学交流咨询一下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考研的相关情况。

2015年12月13日（星期天）凌晨 2:18

### 新视界：

魏翔同学，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同时也感到些许惊讶——一位学材料物理的同学居然一发不可收地“爱上了”国际关系学科。这样一种跨越学科鸿沟的“爱”有如周总理所言“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其实在国关圈，跨界发展的案例还是不少见的，典型的如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的创立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亚历山大·温特，他的本科专业正是物理，以及中国著名国关学者、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唐世平，他



的本科专业是古生物学。所以说，文理跨界的不只你一人啊，应该是大有人在。关键是你的跨界究竟是你真实的兴趣所在，还是说只是“三分钟热情”，而这需要时间来检验、经历来打磨。从你的文字可以看出，你有强烈的国家、社会责任感，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已经具备了学习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所需要的价值态度基础；并且，你已经多多少少接触到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基础知识，对国关有了相对直观的认识。在此，要祝贺你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也欢迎你走进国际关系的新世界。希望你能不改素志，在国际关系的广阔世界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至于如何跨考南开国关的研究生，由于你没有这方面的基础，建议首先通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官网了解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的师资，下载国际政治专业的课程表，旁听标C的国际政治专业必修课，向相关老师提问、咨询等；然后，借助网络资源查找介绍考研南开国关的经验帖（没有考研经历，没法深入解释，呵呵~），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考研计划；最后，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些意志力了，坚持到底的勇气、百折不挠的毅力应该都是必需的。南开国关的研究生相对还是比较好考的，有不少学长学姐也是像你这样“一张白纸”考来南开的，但是也不能就此掉以轻心。加油！祝你成功！

#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